

2021年
第2期

总第3期



IIAS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田野观察

清华地区研究学人的田野故事



IIAS 清华大学 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IAS 清华大学 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IAS 清华大学 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IAS 清华大学 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IAS 清华大学 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IAS 清华大学 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IAS 清华大学 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IAS 清华大学 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目录

引 言	I
唐永艳 古巴的“传呼机”与“土豆”大叔	1
高良敏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坦桑艾滋病故事的另一面	12
朱方方 马尔代夫群岛的时间、现实与恐惧	19
肖齐家 商业与情怀之间：坦桑尼亚旅游业的中国身影	30
梅华龙 一个希伯来语学生和家人在东耶路撒冷的九个月	53
刘博宇 漆黑星空下的游牧民 ——两位巴西年轻人的故事	78
李加方 疫情面前，马拉维人为何拒绝佩戴口罩	88
周 游 基辅田野印象：俄罗斯和西方之间	98
王令齐 西孟加拉问路故事	106
李乖琼 新冠疫情中的达累斯萨拉姆	116
段九州 从开罗到亚的斯亚贝巴： 多元视角下的埃塞俄比亚复兴梦	144

引言

清华大学地区研究学人足行全球南方已近十载。“田野”的磨砺推进着自我的成长和对他者认知的历程；同时，自我与他者也共同参与、共同见证着学人的成长。对于地区研究学人而言，“田野研究”不仅是一个学术意义上的“工作程序”，更是一个生活上、情感上的“修行”，历史镜像、客观事实、主观意志等等并行其中，相互渗入、相互形塑。

简单而言，我们长期的田野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强烈的文化冲击、不适感、逐步适应等一系列生活化的洗礼。在这一过程中，他者与我们相互嵌入对方的生活、学习、研究之中，相互活化。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自我外部世界他者的认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往往受制于“西方因素”或自我臆想的建构，尽管这种困扰不可避免，也并非不“真实”，但它确实是一个萦绕于田野的幽灵，影响着我们对于“他者”的认知。同样，在学理上，各个学科、各个学者对“他者”都有着不同理解和定义。

那么，研究者自身所拥有的背景知识、研究视角以及价值取向等因素是如何影响所谓“他者”的客观真实的？当我们以研究者的身份自居时，是否就已经预判了田野工作的主观性和局限性？庄子有云：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无论在进入田野前研读过多少对象国文本，在语言上进行过多少准备，我们又是否能在田野工作中真正捕捉和论证“他者”的真实？汇聚众多学科对于“他者”的反思以解开上述种种迷思，才能为我们理解自身的田野经历提供更多的帮助。

在田野中，我们会遭遇或者邂逅形形色色的图景和元素：人——我们的老师、朋友、同事、同学、访谈对象、房东、警察等。事——喜怒哀乐之事、七情六欲之事、芝麻般的生活琐事等。物——食物、礼物、交通工具、文化之物或意义之物；动物——鸟、狗、猫、猪、牛、羊、鱼等。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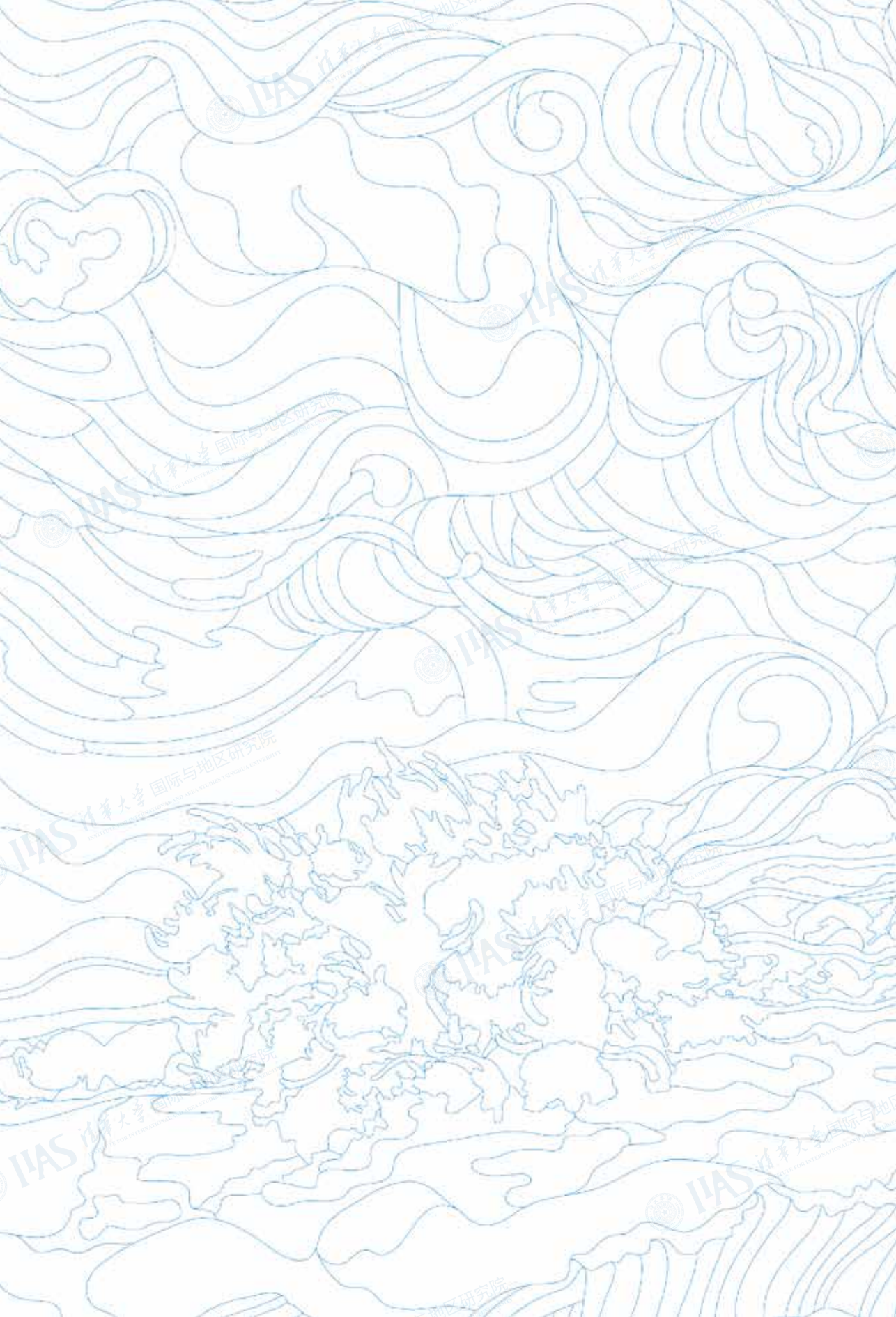
城市、农村、社区、学校、研究所、医院、警察局、移民局、图书馆，甚至卫生间、厨房等生活空间等。情感——特殊的社交礼仪场景，令人感动、令人深思或有特殊意义的情感场景或空间等。自我——了解他者的过程，也是一个了解自我，甚至发现自我、批判自我的过程。换言之，田野之“他者”，不再抽象、神秘或充斥着臆想，而是真实、可触摸及灵动之“他者”，其真实的另外一面也在于回望自我。

在田野中，我们还会经历步步深入的认知转变与学术成长：起初，我们懵懂、模糊，带着想象，甚至是臆想，它们困扰着我们对于研究问题的提出与思考。而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田野工作后，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拥有微观或日常生活层面的细腻感触，乃至宏观层面的整体把握，从而使得我们对“他者”的认知逐步清晰化，对他国的理解、自我的了解也进一步提高，甚至可能推动对既有学理研究的反思和批判。

基于此，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成立《田野观察》责编组，组织院里有长期发展中国家田野调研经历、发达国家访问学习经历的研究员、博士生及部分优秀的外院外校地区研究人员来共同讲述我们的田野故事，以供地区研究学人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感兴趣的大众阅读。从地区研究学人的视角出发，以一种夹叙夹议、有温度的方式，再现田野生活的各色图景，思考“他者”与“我自”的关系，进而彰显田野调研与地区研究之间的张力，重塑其重要性并探讨其意义之可能。责编组拟推出《田野观察》系列，呈现真实、鲜活的田野故事。第一期(2020年12月)16篇、第二期(2021年3月)14篇已刊印成册，第三期11篇稿件亦于2021年4-5月在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微信公众号《田野观察》栏目完成推送。

《田野观察》编辑部

2021年6月1日



古巴的“传呼机”与“土豆”大叔

唐永艳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拟录取 2021 级博士研究生，研究地区为古巴及拉丁美洲

一、“传呼机式”电话

2020 年 6 月 19 日，哈瓦那市中哈瓦那区，天气炎热。我从新找的住处回到家中正洗着澡，一阵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大概五秒钟之后就挂断了。我在浴室里满头泡泡，但脑子片刻闯入的想法是“先不管是谁打的，但能肯定来电者一定是一个古巴朋友”。

这个判断主要是基于我在当地八个月的生活经验使然，在古巴这个特殊的社会场域内，这种“传呼机式”电话是当地社会文化环境下的一种产物，确切地说，是绝大部分古巴当地人与外国人长期相处之后的一种习以为常。

由于美国的经济封锁以及古巴政府对于国内外信息传播的控制，在 2013 年前，手机和互联网的使用在古巴一直处于被限制的状态。到此旅游的游客通常只能通过按小时收费的网卡到公园或者酒店中连上不到 3G 网速的无线网（WIFI）才能够与外界进行沟通联系，高额的网络费用使得绝大部分古巴当地人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网络，因而在绝大多数外界人的认识中古巴仍然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球之外的国家”。

然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截至目前为止，古巴的手机普及以及用户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自 2003 年古巴电信公司 (ETECSA) 开通手机服务以来至今，古巴手机用户已经超过 600 万 (古巴总人口约为 1100 万)，与之相应的上网服务也一直在缓慢推进中。2013 年后，陆续有 155 家付费网吧在全国建成，每小时收费 4.5 红¹ (约人民币 32 元)；2016 年 7 月古巴政府在全国范围开通运营 35 个公共无线上网点，上网费用减半；2018 年 6 月，古巴电信公司 (ETECSA) 正式宣布全面开通手机上网服务，并向民众提供 3G 网络；2019 年 5 月，古巴允许私人无线网络 (WIFI) 合法化；同年 10 月中旬开通了 LTE 网络 (接近于中国 4G 网络)，在不断地调整中当前已经可提供 2 种形式的 8 种套餐包服务。

1 - 400MB x 5 CUC	Seleccione la opcion deseada
2 - 600MB x 7 CUC	1 - 1 GB LTE x 4 CUC
3 - 1 GB x 10 CUC	2 - 2.5 GB LTE x 8 CUC
4 - 2.5GB x 20 CUC	3 - 14 GB (10GB LTE) x 45 CUC
5 - 4 GB x 30 CUC	0 Menu
0 Menu	

图 1 流量用于普通网络与用于 LET 网络图

图片来源: etecsa.cu

古巴的电话费用缴费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手机直接网上缴费，购买由电信公司提供的“包” (Paguetes)，或者是到电信公司分部的小店中购买充值卡进行充值。古巴国内通话一分钟合 2.5 元人民币左右，国际通话一分钟 7 元人民币左右，均为呼出方付款；虽然 2019 年年底古巴政府再次上调工资，全国的月平均收入上升到 44 红 (约合人民

1 红币是近几年到古巴的华人对于古巴可兑换比索的普遍叫法。古巴可兑换比索 (CUC, peso convertible)，与美元汇率大致相同，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取消。

币 310 元)，但对于国内的高额消费水平来说仍旧是杯水车薪。通话费用的价格显然超出了大部分当地人的经济承受能力，于是乎，在默认外国人收入于当地人较高的观念之下，绝大部分当地人渐渐养成了这种“传呼机式”的“惯习”：在使用移动电话给国内的外国人打电话时，当地人一般都是在提示音响了几秒钟就会挂断，然后等着对方打过来，由对方付款；另一种方式是在拨打对方电话时加上“*99”，这种方式无论呼叫提示音响多长时间，只要接起电话都是对方付款。虽然其收费价格也是每分钟 2.5 元人民币，然而由于这种拨通方式会在对方手机上有相应显示，“*99”所蕴含的意味已被众所周知地解读为“要求对方付款”，“体面”的古巴人通常更愿意采用隐晦的“传呼机”方式，让对方“主动”回拨电话。



图 2 古巴的话费充值卡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刚到古巴时我不太清楚这样的情况，很多古巴朋友都以这样的方式跟我联系曾让我一度误解为这是当地的一种习俗。出于尊重异文化的心态，我起初也以同样的方式跟他们

联系，响铃几秒之后就挂断电话等对方打过来，不过这样的等待通常都是没有回音的，反复几次之后我隐约察觉到古巴朋友们态度的异常，一直到多次乌龙事件之后才终于知晓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

再后来每次接到古巴朋友打过来的“传呼机”电话，我都把这种场景潜藏意思表述为“朕有话跟你讲，请你速回”。在“外国人”这种身份标签下，我虽然心中常有被强行置于道德制高点的不平衡情绪，但也只能在当地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面前一次次感到无奈和妥协。

二、土豆大叔

未接来电显示的备注是“土豆大叔”，然而面对他时，即使是“传呼机式”电话，我却从未有过别样的念头，随即给他回了电话过去。

土豆大叔跟我说他的菜市场窗口进来了一批新菜。他知道最近因为疫情外国人被禁止随意出门，买菜一定很不方便，因此执意要给我送过来。异乡的温柔总能让人很感动，他的关心使我内心一阵温暖，但想到第二天我就搬家了，多了的行李只会增加我的负担，于是我委婉拒绝了他。

大叔听到我要搬家之后，坚持第二天要来给我送行，他说他专门给我留了我最喜欢的墨西哥辣椒，现在在古巴很难买到，一定要给我送一些来。

“你几点走呢？”

“下午三点左右走，但我早上有点事情需要出门。”

“那我早上7点钟左右给你送过来可以吗？”

“行的。”

土豆大叔是我在古巴认识的一个菜市场业主，根据古巴对于黑市和白市的划分，他应该是兼具白贩和黑贩两重身份，但对于我来说他却是“白市”里最白的“白贩”，人好，心善，真诚。认识土豆大叔可以说是我在古巴的一点小幸运，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帮助，我才以较为便宜的价格在古巴吃上了土豆，并且在古巴因疫情而粮食短缺的情形下帮我解决了很多食物和物资上的困难。

你可能不相信，在中国随处可见、四季不缺的土豆，在古巴竟是难得的稀缺之物，是外国人有钱也买不到的食材之一。

跟几位古巴朋友聊天之后才了解了一些关于古巴土豆的知识：作为纳入粮本（Libreta）计划分发的食物，土豆在古巴有着一个特殊的身份——战用储备粮。朋友告诉我，古巴很多食物的种植、分发和销售都受到政府的管控，而土豆因其可储藏性被纳入到国家战用储备粮之中，因此受到更为严格的控制。每年土豆成熟之后，政府都会先统一收集，然后“以旧换新”，用新鲜的土豆将粮仓里的旧土豆换出来分发到市面上，多余出来的新鲜土豆才会加入到市场销售中。每到土豆产出的季节，当地百姓依靠粮本到粮油店用极低的价格可以领到10磅土豆，而后政府会根据当年土豆的收成相应地调整收缩或放宽分发政策，若是遇上土豆丰收的年份，有时候在一些小商店内甚至不用粮本也可以买到。古巴的土豆一般是在三月份上市，而今年（2020年）之所以在2月份就能够吃上土豆，主要得益于去年12月底经过古巴的寒流

维持了将近一个月的低温，该过程促进了土豆的生长；也正因如此，今年丰收的土豆为缓解疫情之下古巴的粮食危机提供了有力支持。

对食物的分发的管控是古巴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其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与古巴两国之间的博弈。随着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以及改革进程的推行，1962年2月3日，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正式宣布对古巴实施包括经济、金融封锁以及贸易禁运等在内的全面制裁法令，试图通过切断其他国家对古巴的食品供给以及物资供应等项目，在古巴国内制造不满和冲突，达到瓦解卡斯特罗政权的的目的。古巴政府迎难而上，开始调动全国资源，以家庭为单位向民众分发了《供应手册》(Libreta de abastecimiento)，并于1963年7月12日正式建立“古巴粮食管制和分配办事处”(las Oficinas de Control y Distribución de Alimentos, 简称OFICODA)，确立将其作为一项粮食补贴和配给制度，以此来保证国内所有民众都能获得基本产品。



图3 当地人领取食物时使用的粮本（供应手册）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在该制度创立之初，当地民众可以通过粮本领到政府发放的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甚至包括衣服和鞋子等物品。拥有粮本的当地人通常只需支付产品实际价格的 10% 就能获得大米、鸡肉、糖、牛奶、鸡蛋、油、豆类、意大利面条和煤气等供给物，约为每人每月 1 美元。此外，在这项供给中，所有古巴儿童出生后第一年每天可以免费得到一瓶牛奶，7 岁后每天每升牛奶 0.10 美元。对于那些必须依据处方饮食的人，政府还通过《供应手册》为其提供了特殊的食物配额，其中可能包括肉、奶和蔬菜等。据古巴财政部门 2017 年统计，国家通过向外进口以及向内征集两方面的措施，每年在食品补贴上的支出约为 7-10 亿美元。

几十年来这项措施一直在国内引起广泛争议，近几年来古巴不稳定的经济形势使得该项政策的推行越发举步维艰。劳尔·卡斯特罗在 2011 年出任第一书记时即提出取缔该政策的决议，他说国家的经济不能继续承受这样的开支，然而很多民众纷纷抗议，认为全国还有很大一部分人依赖于该政策才能过上最基本的生活。在几番争议之下，政府最终只能通过减少粮本中供应产品的种类和数量来减少这笔开支。



图 4 负责分发土豆的小菜市场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国家通过“粮本”在本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建立的区隔使得他们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逐渐建立起了更多复杂的关系。黑市里的小贩知晓了外国人没有粮本，无法购买国内很多紧缺的食材和物资，他们会将家中通过粮本领到的食材省下来，或者通过别的非正规途径将得到的物资拿到黑市进行售卖。我的一个中国留学生朋友曾跟我说，在古巴黑市中倒卖的土豆价格常常比肉价都贵，1磅土豆将近20块左右的价格也是常见的现象。“黑市倒卖”在古巴属于违法行为，如若被古巴民间组织或者警察机构等发现会受到严重的惩罚。然而由于物资匮乏、经济水平低下以及利润的可观性等诸多因素，黑市交易在古巴十分盛行。我的古巴朋友曾这样跟我说：“古巴处处都是黑市，人人都是黑市的参与者”。



图5 疫情期间当地人到粮店领取食物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二月中旬的一天，我结束当天田野工作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一个坐在街边乘凉的古巴男人突然冲着我大声地喊到“Chinita, Papas”（中国女孩，土豆）。我已经习惯了古巴黑市小贩类似的叫卖，但与往常“Aceite（油），Huevos（鸡蛋），

Pollo（鸡肉），Pescado（鱼）”不同，这是我进入古巴5个月以来第一次在古巴听到“土豆”，我兴奋不已，惊觉古巴竟然有土豆这样的食物。

黑市倒卖犯法，于是小贩们只敢悄悄进行。那个小贩把我带到街角处一家门前停了下来，他敲了敲门，门后一个古巴女人开着门缝看了我一眼，男人轻声对她说了一句“Papas”（土豆），女人转身便从门背后递出来了一个袋子。袋子共有6个中小号土豆，沾着泥土，小贩叫价4红，合28元人民币，我还价无果但又十分想吃，于是就以这样的高价开心地买下了。

回来的路上我第一次遇到了正下班回家的“土豆大叔”，他看到我拎着土豆开心地蹦蹦哒哒，走过来跟我问好并询问了我买土豆的价格和地点，我如实相告。土豆大叔突然十分生气地跟我说，这些古巴人真是太坏了，竟然卖这么高的价格。他跟我说他那里也有新鲜的土豆，只要8土²（约人民币2.4元）一磅。我听到之后开心不已，在当地养成的屯物资习惯第一时间冲上脑海：看到就买，能买多少就买多少，因为你不知道错过了这次机会，下一次什么时候能买到。我立马跟土豆大叔下单买了20磅，留下了地址并交换了电话。第二天，他骑着自行车准时送货上门。

一来二往，除了“生意”上的交谈，土豆大叔每次给我送东西过来的时候，也会关注我的生活和学习上的情况。疫情之下，古巴粮食物资越发短缺，粮本政策的供应无疑为当地人的基本生活提供了最低的保障，而没有粮本的外国人日

1 土币是近几年到古巴的华人对于古巴比索的普遍叫法。古巴比索（CUP, peso cubano），2021年正式成为古巴唯一法定货币，与美元汇率为1美元兑24比索。

常购物则日益陷入窘境。土豆大叔主动发短信联系我，让我有什么需求一定要跟他说，他说他是古巴人，获取食物的方法肯定要比我多，让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感激不已，疫情以来，从大米、食用油、面粉到基本的蔬菜和一些生活用品，他一直都在尽己所能地为我提供帮助。

搬家的日子转眼就到了。清晨6点58分，电话铃声将我从睡梦中吵醒，我看了备注是“土豆大叔”之后就挂断了电话重新拨打了过去。“Benita（我的西语名），我还有三分钟就到你楼下了，你可以准备下来了”。

如同往常一样，我睡眠迷蒙地刚下楼时，土豆大叔已经在楼下等待了。

通过委婉的方式赞美别人使得他人开心，是古巴人乐此不疲的事情，他们将之视为一种能力，称为“恭维”（Piropo）。

见面的第一句话，土豆大叔就笑着说道：“早上好呀，Benita，你今天真好看，如同往常一样。”

我也回应道：“早上好呀土豆大叔，您也很帅，如同往常一样。”

干净整洁的大叔哈哈地笑了，蓬头垢面的我也哈哈地笑了，莫名就有了一天的好心情。

打开鼓鼓的挎包，除了辣椒之外，他还给我带来了芒果、菠萝、生菜、生姜和大蒜等古巴屈指可数的基本食材。他跟我说，芒果是应季水果很甜，菠萝错过这个季节马上就要买不到了，生菜很新鲜……一番推攘之后，他坚持只收了辣椒

的钱，其余的食物说是送给我的。

“你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刚过去对地方不熟悉，买东西肯定不方便，这些东西可以让你先吃一两天，等适应了就好了。”

“要好好照顾自己呀，有什么需要就给我打电话，我会尽己所能的帮助你的。”

“谢谢叔叔您一直以来的帮助，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的。”

“Chinita，遇到你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希望你一切都好，一切顺利，要照顾好自己。”

“叔叔，遇到您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同样的祝福也给您，望照顾好自己，希望您的家人一切都好。”



图6 临别前跟土豆大叔的合照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责任编辑：郑楠 文字审校：董慧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坦桑艾滋病故事的另一面

高良敏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地区为坦桑尼亚及周边国家

“有一个病人叫萨利姆，你还记得吗？昨天他儿子
搀扶他进来领药的那位？”

我一愣，回答说：“有点印象，怎么啦？”

“他现在病的很重，好像是PCP，现在正住在医院
里呢，一会要去看他！你想去吗？”

“好啊，只是我去适合吗？不会打扰他吧？”

“可以啊，昨天他应该见过你，去看看没事的，一
会我叫你。”

“好的，到时候一定要叫我啊！”

2016年2月19日中午12点，在忙碌了一个早上后，当
海滨省巴加莫约郡医院艾滋病关怀诊疗中心的大部分工作快
结束时，护士莫希坐到我的身边，提到了病人萨利姆（非真
名）。萨利姆来自坦桑尼亚北部的乞力马扎罗省，与护士莫希、
巴图莉是老乡。虽然他们此前彼此不认识，但萨利姆从很远
的地方来到巴加莫约郡看病，在诊疗中心碰到并认识了同样
来自乞力马扎罗省的莫希和巴图莉。

按照护士莫希所说：“这里不是乞力马扎罗（省），但碰到了，我们就是朋友，因为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据莫希介绍，萨利姆来巴加莫约是因为儿子正在此处上大学，而且这里医疗条件比乞力马扎罗好得多。另外，他的病已经严重，并发卡氏肺孢子虫肺炎（Pneumocystis Carinii Pneumonia, PCP，为艾滋病病人较为严重的机会性感染），表明疾病状态已经进入较为严重的艾滋病期。因此，对于并发PCP的萨利姆来说，由于在乞力马扎罗省省立医院已无法治疗，来到巴加莫约其实也只是试试运气。



图1 巴加莫约郡医院艾滋病关怀诊疗中心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过了1个小时左右，在我即将整理完病例档案时，莫希说现在去看萨利姆。我们三人便走出诊疗中心大门，右转直走10米左右，然后左转10米，先到医院的儿科病区，然后到男性病区。进入男性病区大门之后，首先穿越准备区，才是病人所在区域。在坦桑尼亚，郡一级医院里有按专科划分的门诊，但住院区的划分与中国医院科室划分不同，一般仅

划分为男病区、女病区、儿童病区。在每个病区中，通常有医生和护士的准备区，还有相关设备所在及操作的准备区。

从准备区继续往前走为病床区，又被分为重病区（大床位区）、普通病区（小床位区），两病区之间被一堵墙隔离开来。在郡医院重病区走道两边各有四张床，从病床上病人表情来看，应为病情较重的病人。我见到一个资历较深的医生正在带领实习医生逐一对病人检查。我们的突然到来并未引起他们的注意。继续往里走，来到大床位区，在最里面见到了萨利姆。他瘫躺在病床上，身体极度瘦弱，看似全身乏力。我们的到来除了只见他的眼球不时转动外，并未发现更多表情反应。他儿子正在床边守候，在简单地和萨利姆打招呼后，莫希和巴图莉便开始对萨利姆进行各种问候。

她们的问候从基本病情、饮食开始，之后是给出各种建议。比如，如何保持营养，去哪里可以买到食物？这些内容交流最多。她们还建议萨利姆要多吃鸡肉、鸡蛋、鱼和蔬菜，同时要多喝牛奶加强营养，等等。躺在病床上的萨利姆，听到这些来自老乡护士的关心话语，甚是感动，低声轻语地说着“*Asante! Asante!*”（感谢！感谢！）。期间，他几次想从床上坐起来说话，然而因身体过于虚弱，不得已继续躺在床上。谈话间，莫希看到萨利姆的一只脚露在被子外面，她先用手整理了凌乱的被子，然后用被子盖住了他裸露的脚。

在整个医患或老乡间的互动中，温馨备至，充满老乡情怀。我们常说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也不过如此。由于病区还有很多病人，大多病情较重，加上室内的闷热，为了不过多惊扰他们，整个过程我除了几句关心、问候和鼓

励的话外，并未多说，只是时常向他伸出大拇指，以示加油。

在坦桑尼亚等东非地区，轻举拳头，竖起大拇指，表示一种友好的问候方式，一般用于说话不便或两人距离较远等情境；如果近距离，则握起拳头，相互对碰，或者手臂碰手臂等等，都是常用的友好问候或打招呼的方式。这样的方式表达情义的深度胜于绅士般的、正式场合或一般友谊的“握手”。除了上述，更为深情的方式则为“拉手”，那更是好友或亲友之间的情感互动的重要方式之一，无关性别和宗教。

萨利姆看到我伸出大拇指，也微笑着伸出了大拇指向我回应。期间，我环视了整个病区，大概 12 张床位左右，10 个病人，大多上身赤裸地躺在床上。看到我的到来，首先他们感到好奇，还和我打出友好的手势，有的微笑着招手……由于正值炎热天的中午，整个屋子犹如小蒸笼，通风也不是很好。或许莫希和巴图莉也有类似的感受，最后跟萨利姆寒暄几句之后，她们起身准备离开。在临走时，我见到她们各自在萨利姆的病床上塞了 5000 先令（约人民币 15 元），随即我也掏出 5000 先令放到病床上。虽然整个慰问过程时间很短，仅 10 分钟左右，但犹如一股清新的风吹进小小的病房，充满温馨。

2016 年 2 月 24 日下午 1 点半，莫希正在整理 2 月 15 日的 CD4 检测报告单，我和巴图莉正在进行后期随访登记，同时统计 CD4 的检测结果。如同往常一样，整个诊疗中心的工作人员从早上 9 点一直忙到中午。此时，大多数病人已经离开，中心大厅恢复了平静。



图2 作者在巴加英约郡医院艾滋病关怀诊疗中心工作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高，你还记得前天去看的那个病人吗？萨利姆。我一会要和巴图莉去看看他是否好了点？”在这时，莫希突然对我说。

“哦，对啊，他好点了吗？”

“我们正要去，如果来病人了，你记得把她们的病历卡要来登记。我们去一会就回。”

“好的，没问题，你们去吧！”。

大约 20 分钟后，看到她们返回诊疗中心时，一副满不高兴的样子。

莫希对我说：“萨利姆昨天就去世了！”

我吃惊地问：“前天看上去不是还好吗？为什么就死了呢？”

莫希回答：“他昨天就非常非常严重了！”。

此时，旁边正在闲聊的护士吕赫玛和彤噶听到后，不约

而同地说：“oooo, Pole sana! Pole sana!”（太遗憾了，太遗憾了！）另外几个正在门诊高兴聊天的护士听到后，也瞬间停止，有的叹气，有的惋惜。整个诊疗中心顿时进入悲悯情境，时常的欢声笑语突然转入死寂般的宁静。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不仅仅属于中国语境，在坦桑尼亚这种乡间邻里的认同感和情感，也自然地连接起来。在诊疗中心这样一个曾经充斥着排除和歧视的空间中，乡邻情感依然呈现，淳朴厚实的人间情怀无处不在。尽管诊疗中心很多医生、护士都不是萨利姆的同乡，但在听到了病人死亡的消息后，大都连说“Pole sana!”，甚至停止了交流。这个瞬间如同死寂一般的空间，在我看来却充斥着人间悲悯、人间温存。



图3 巴加莫约郡医院艾滋病关怀诊疗中心内院一角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印度洋边上这个每天看似充斥着炙热的“社会苦难”的空间，苦难却在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悲悯情怀中一一消解。在对抗病患苦楚的道路上，显人性之光芒。此情此景，对于“死

亡”的敬畏，无不凸显人性之本能——悲悯犹在。尽管莫希、巴图莉和萨利姆之前并不认识，也非亲人，看似医患却超越医患。这种“乡邻”之情源于最为自然的、最为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动，是一种地方社会交往之常情。尽管在艾滋病之医患情境下，但这种人间悲悯冲破了“艾滋病”曾经或仍然背负的排斥与歧视，其至少说明人间悲悯犹在，希望犹在。如果一定要塞进“医患”之脉络，坦桑尼亚艾滋病防治实践之图景无疑在向我们诉说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悲悯之朴实道理。

长期以来，“艾滋病”叙事常常围绕着社会苦难、病患苦楚、排斥和歧视展开，被赋予了太多阴暗之面向。然而，一个普适的道理是，阴暗之于阳光，或许阴暗之处更需要阳光。在坦桑尼亚这个艾滋病高度流行的地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都市的魔力及其欲望也使人心趋向浮躁。然而在此之余，诊疗中心微小的“乡邻”之情，其互助互尊，无疑弥足珍贵，是希望之所在。

责任编辑：李宇晴 文字审校：许 帅

马尔代夫群岛的时间、现实与恐惧

朱方方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马尔代夫

几乎所有人听到我的研究对象国是马尔代夫时，都会露出愉悦的笑容。马尔代夫是一个居于北印度洋中心的双链状群岛国家，由约 1200 个珊瑚岛组成，其中仅有 200 余个岛屿有人居住。马尔代夫的岛屿十分狭小，平均面积不足 1 平方公里。半个世纪来，马尔代夫的风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享誉全球，椰林树影，遗世独立，简单而松弛。这种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世外桃源的想象，如翠绿色的海水般包裹着马尔代夫。2019 年我来到马尔代夫的首都马累，在大学以及政府开设的文化学院学习。在岛上生活的日子里，我意识到对马尔代夫的均质化想象并不适用于这座现代岛屿都市。



图 1 中马友谊大桥入口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一、缓慢的时间

在马累，时间的延缓似乎变得现实可感。马累居民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放松，甚至是懒散昏沉的。他们会坐在咖啡店、海边、秋千上一发呆就是几个小时，海面让人感到平静，公共场所里零星的对话偶尔发生，但不会持续太久。热带岛屿的每一日均匀地拥有 12 个钟头的白昼，清晨 5 点钟祈祷开启了一天。然而夜幕降临以后，仿佛才是马累居民真正生活的开始。街道上摩托车流飞驰而过，商店和餐馆顾客盈门，直到凌晨才会安静。马累人喜爱夜晚胜过白天，婚礼等重要活动也习惯于入夜以后举行。

对茶和咖啡的钟爱是整个南亚地区所共有的。马尔代夫的红茶文化来自它与印度和斯里兰卡紧密贸易联系的影响，而对咖啡的痴迷则源于半个世纪以来大量欧洲游客的涌入。穆斯林国家禁止酒精，娱乐项目贫乏，年轻人喜欢在咖啡店闲坐度过一天。在马尔代夫，“喝茶”一词可能意味着一杯茶 / 咖啡和一些“短食”（short eats），也可能意味着一餐饭。在国立大学上课的课间，同学带着我去遍了周边所有的咖啡店和小餐馆，红茶搭配金枪鱼松馅儿的炸肉卷是我念念不忘的美味。

我和当地人的大部分交谈都发生在茶水间。我的老师 Waheed 已年过七旬，如今仍在学院负责语言教学，是当地最著名的小说家，总是写一些结局凄美的故事。Waheed 有作家天生的敏锐，我们无话不谈，他总是用一种略带遗憾的骄傲语气谈论马尔代夫。他说，在表面的混乱之下，这里隐藏着一种不易被识别出的完美秩序。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谈

论琐事，他关心我的吃住起居，总是买大块的巧克力给我——马尔代夫人最热爱的零食。迪维希语中许多重要的小词意义丰富，刚去上课时我说话断断续续表达困难，Waheed 经常听不懂我的造句，他沉默半晌问我“要不要去喝茶？”。去喝茶成了我最熟悉的句子。

我的住处就在海边，我常醉心于不同颜色的落日。傍晚船只悉数回港，我沿着堤岸跑步，有时会看到垂钓者。马尔代夫钓鱼的独特之处在于常常是不放诱饵的，仅凭鱼钩的抖动吸引鱼儿上钩。归港渔船满载着金枪鱼、鲷鱼和鲷鱼，人们在城市中仍保留了最传统的营生。在岛上的时间显得异常漫长，有时我感到生活是在另一个平面中被展开的静止的宇宙，而我在这份无限静止中加速了自己的衰老，我有些理解马尔代夫人常有的百无聊赖的心情。我靠近海边时总会感到异常平静，Waheed 说，这是因为身体内占多数的水分正在和巨大的水体产生共鸣。望向海平面时，你是很难感受到时间的流逝的。



图 2 和 Waheed 的课堂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二、割裂的生活

岛，指的是被水体环绕的陆地。英语中“insularity”一词意为岛屿的性质或状态，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生活状态，同时也有偏狭和局限的含义。在海洋形成的天然阻隔下，岛屿上的人类活动受到限制，过着一种相对静止的生活。“岛”不管是在日常用语还是在学术领域都是一个强有力的隐喻。在生物学中，岛作为隐喻用于描述孤立的基因库、不同的进化模式和封闭的生态系统。岛屿对人类学领域更是有着强烈的影响力，岛屿的概念被视为孤立的社会文化现象的隐喻。

马尔代夫的岛屿分为截然不同的三种类型：首都、居民岛、度假岛。

度假岛通常是“一岛一酒店”模式，度假岛的风光是展示给外国游客最为常见的一面。马尔代夫官方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为了保护本土居民信仰的纯洁性，采取了“旅游隔离政策”。游客抵达机场后，随即被快艇或水上飞机接到各度假岛，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游客和本土居民的直接接触。度假岛上奢侈和精美的酒店与本土居民岛是完全不同的图景，最少 200 美金一晚的度假酒店营造出高级设施和自然风光的完美结合。这也是为何外国游客很难接触到真实的马尔代夫居民生活。在度假岛，人们可以随意吃猪肉、饮酒、穿着暴露，而本土居民岛上这些都是严格禁止的行为。

有本国人居的岛屿被划分为居民岛，马尔代夫的居民岛是严格的穆斯林社群。居民岛面积小，生活方式非常传统。近几十年由于首都基础设施的发展，大部分居民岛上的年轻人都选择离开家乡前往马累岛工作或接受教育，因此岛

上居民往往以老人和孩子为主。



图3 马累的宣传塔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首都马累被视为都市而非岛屿，有作家用“claustrophobic”（导致幽闭恐惧症的）一词形容马累——高楼鳞次栉比，生活成本高昂，街道拥挤。首都马累岛占地面积仅9平方公里，却居住了13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这座城市并非有先天的建设规划，而是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不断在原先的基础上增补修建而成，因此街道狭窄得惊人。马累地区的生活方式和家庭关系已经与传统群岛的习俗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岛屿城市化改变了家庭经济收入的分工和方式。在马累，女性就业的比例相当高，这在穆斯林国家并不常见。

我在首都马累读书时经常被问到“有没有去过岛上？”这里的岛就是指的本土居民岛。在马尔代夫人眼中，本土居民岛上才是真正的生活，在首都马累仅仅是生存。我怀揣着好奇心前往北部的一个普通居民岛，事实证明这是我最震撼

的一次出行。我拜访的 Manadhoo 岛仅有一百多人居住，全岛面积仅如同一个小村子。宁静的白沙路，整齐的矮房子，高大茂密的热带植物，简朴沉静的美丽景象如同 14 世纪伊本·白图泰笔下记录的群岛。居民岛仍保持着最为古朴的风貌，男性每日出海捕鱼，女性则擅长精美的编织艺术。

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马尔代夫停驻了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其间他就曾到访一个奇迹般微小的居民岛：

至一小岛，岛上只有一户人家。男子从事织布，他有妻子儿女、枣椰和椰子以及一只捕鱼的小舟，乘舟可去群岛各处。岛上还有香蕉树，所见到的飞禽只有两只乌鸦，那是我们抵达时在我们船上飞翔的。真的，对这个人我十分羡慕，这样一个岛子若归我所有，我便摒弃一切终生在此居住了。（《伊本白图泰游记》，1985）



图 4 Manadhoo 岛上清理家门前尘土的妇女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殖民考古学家 HCP·贝尔将马尔代夫的生活态度概括为拉丁语短语“noli me tangere”（不要碰我）。在他眼里，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马尔代夫人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尽可能地遗世独立，孤单地、不受干扰地生活在他们被海洋包围的幸福之中。然而，不管是历史上还是如今，没有任何一座岛是

真正的孤岛，没有贸易，环礁上的生命几乎不可能存在。历史上，马尔代夫是一个有着伟大航海传统的国家，与印度洋地区其他国家进行了密切的贸易往来。马尔代夫是印度洋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在近代更受到了全球化的强烈冲击。近几十年，马尔代夫政局发生了巨大变革，国内各方势力盘踞交错。马尔代夫盛行“大人物政治”，政治家个人的影响力巨大，社会关系紧密而复杂。马尔代夫的对外政策和文化倾向往往会根据掌权者的个人意志而发生变化。不同的大人物背后往往代表着更深层的外来意识形态，牵线木偶般影响了马尔代夫的未来。



图5 作者与马尔代夫总统索利赫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三、信仰与恐惧

不管是从语言学还是考古学角度都得到了论证，马尔代夫的南北差异较大，尽管政治中心居于中北部，南部岛屿被认为与斯里兰卡关联更紧密，大多数佛教遗迹从南部岛屿被发掘出来。早期马尔代夫人信仰佛教，到了12世纪随着阿拉伯人主导的印度洋海上贸易的兴盛，马尔代夫全境转为信

仰伊斯兰教。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两种强大宗教主导地方信仰的时期，马尔代夫都有古老的本土信仰与之并存：即对于邪灵、鬼神、符咒一类的信仰。并且即便到了今日，任何一个现代马尔代夫人对于鬼神崇拜和自然崇拜的虔信与古代都并无二异。他们的血脉中深深地相信鬼神精灵和超自然的存在，当面对特殊现象、灾难和重大活动之前，他们都会相信人类的事物由鬼神主宰。

岛屿生活总是充满了恐惧。海洋渗透进整个国家，支离破碎的群岛被幽深的未知所包围。恐惧教育是马尔代夫神话和故事的永恒主题，每个讲述都充满警醒意味地强化着对掌权者，对自然、疾病、黑暗和鬼魂的恐惧。在马尔代夫最令我惊奇的一件事是：书店里最常见的童书往往是恐怖故事系列，封面上画着可怖的鬼怪或者掉了眼珠子的女人。恐怖故事是马尔代夫小朋友最钟爱的主题。在马尔代夫，年轻的男人会公开承认他们的害怕。这是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很少见的情况，因为通常其他国家习惯于教育孩子：勇敢是美德。



图 6 *Maldiviana* 一书中的插图，来自马尔代夫神话传说
图片来源：A.D. Naseem, *Maldiviana: History of Maldivian Women*

一次我和几位马尔代夫女士外出旅行，深夜在房间听到房顶被连续敲击的声音，另外两位立刻缩作一团瑟瑟发抖，开始用手机最大音量播放古兰经。我困得几乎睁不开眼，耐心劝她们只是椰子砸到了房顶而已。但她们坚持认为是鬼魂在作祟。很快她们就决定搬到其他人的房间里过夜，并邀我跟她们一起过去。我大为迷惑，坚持在这个“被鬼魂缠住”的房间睡。第二天所有人竟对我肃然起敬，同行人在讨论那个中国女孩根本不害怕鬼的奇事。除了鬼魂，我同样发觉很多马尔代夫女性畏惧海洋，在这个被海洋环绕的岛国，有相当一部分人完全不会游泳，我想或许是因为宗教对女性的限制。在马尔代夫神话故事中，有很多妖怪来自海上：巨型吃人水母，像船一样的海怪等等。据称，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马尔代夫人还不知道鲸鱼是无害的动物，当他们的船周围盘桓着一头鲸鱼时，他们无比惊恐而颤抖，大声诵读古兰经祷词。围绕他们四周的未知海洋是畏惧最深刻的来源。

如今的马尔代夫人仍坚信“黑魔法”（Black Magic）确实存在，具体做法通常是在椰子壳内撰写符咒或经文埋在某地，甚至坊间盛传某位前总统当年选举时就是通过黑魔法的加持获得选举成功。马尔代夫人对鬼神、巫术和伊斯兰教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态度，体现了官方宗教崇拜和家庭宗教表达之间的二元性，两者在不同的时刻是互相转化的。有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细碎的、紧迫的需求并不能完全从“严肃的宗教”中获得解决，而需要求助于当地的鬼神与巫师，这是南亚地区所共享的特点。

对马尔代夫人而言，恐惧是一种提醒，植根于对自然和海洋的敬畏。恐惧正如《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那只猛虎一

般，在宿命般的海洋面前激发勇敢。马尔代夫男子逆风破浪驶入大海，赤着脚爬上高大的椰子树，展现出惊人的勇气。他们爱好和平、温顺善良的性格中潜藏着最古老的抗争自然的能量。



图7 海边堤岸上奔跑的孩子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四、结语

当带着先前的浪漫想象真正抵达马尔代夫的时候，我期待着清晰而明确地勾画一个社会的构造，渴望从一切纠缠不清的表象中把文化现象的规则和系统梳理出来。事实证明这很难达成。我确实看到了令我感兴趣的东西：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他们的世界观，他们呼吸的空气和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他们如何被海洋指引走向艰难的冒险，受到理想主义的诱惑而乘风破浪，又是如何在神话中叙述深层的精神世界。但我也必须承认，真正的理解仍有漫长的路途要走，如同隔着千万层磨砂玻璃的距离，当你以为自己已足够洞悉这个社会，

更近一步后你会发现之前的视线仍在迷雾中。在尝试体察这些于我而言非同寻常的生活时，我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切感情，通过不断理解陌生的世界，我也在认清自己。

我和马尔代夫人一样热爱黄昏时刻。有时我们聚在一起，安静地、充满崇敬地观望海上的落日余晖。这是我们共同摆脱日常生活经验的时刻，我们会停止一切正在做的事情，严肃而庄重地面对这份宇宙力量。海岸是海洋与陆地的交界，黄昏是昼与夜的中介，如同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的长长的甬道。我想自己这样的外来者也正处于两种身份的边缘地带。落日时分是温柔的断裂，是暂时的自我失落感的根源。

责任编辑：熊星翰 文字审校：董 慧

商业与情怀之间：坦桑尼亚旅游业的 中国身影

肖齐家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坦桑尼亚

前言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稀树草原是游猎（Safari）者的天堂。每年5月，随着旱季的降临，数以百万计的角马、斑马和羚羊等食草动物为了追逐生存所需的水草，会成群结队地从坦桑尼亚塞伦盖蒂保护区的西线北上，前往位于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一路上，迁徙的队伍要面临极为严峻的考验。除了干旱和食物不足之外，路上还埋伏着狮子、猎豹和鳄鱼等饥饿的食肉动物。对于游客来说，整个迁徙过程当属7月至8月动物穿过马拉河的部分最为壮观。

到了9月，迁徙逐渐接近尾声，动物们陆续抵达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由于它的面积仅有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的十分之一左右，不足以供所有动物栖息繁衍，因此，当一个月后塞伦盖蒂的雨季来临时，动物们会再次踏上行程，沿东线南下返回坦桑尼亚。

除了这些食草动物以外，在草原上还有五种动物因其战斗力极为强悍，难以被猎人徒手捕捉，而被冠以“非洲五霸”（The Big Five）的称号。它们便是狮子、非洲象、非洲水牛、猎豹和黑犀牛。尽管随着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兴起，保护区

内荷枪实弹的猎人逐渐被扛着长枪短炮的游客所取代，但人们对这五种动物的兴趣从未消退。

不过，在一趟行程中将五霸“一网打尽”可并不容易。如果你还想同时观赏到动物迁徙和角马渡河的奇景，也许只有坦桑尼亚才能够满足你的愿望。到了景区里你就会发现，野生动物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而人只是看客而已。

坦桑尼亚的旅游资源之所以会这么丰富，是因为它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少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旅游业是这个国家重要的外汇来源，但为了保护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它并没有为了招揽更多的游客而拼命地建造酒店，或是发放经营许可。结果就是即便是那些最高端、最昂贵的酒店，也从不会缺客人。

每年旺季，保护区内的高端酒店总会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再有钱的客人，在预定行程时，也要看酒店的“脸色”——“我们某月某日有空房，人民币5位数一晚，你要订吗？”

不要的话，很抱歉，可能得等到明年。有的“网红酒店”甚至需要提前两三年预定才行。



图1 2018年12月，与塞伦盖蒂草原狮王擦肩而过

图片来源：Nico 提供

2008年前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游客开始关注坦桑尼亚的旅游资源，当地的旅游市场中陆续出现了几家华人旅行社。第一批旅行社几乎都瞄准了当地华人市场。在当时，由于坦桑的中国企业还比较多，而华人旅行社本身数量有限，所以同行间的竞争不是很激烈。通过和国企合作，承接企业员工和家属的旅游订单，旅行社便可以经营下去。

然而，自2015年底新总统上台以来，情况发生了改变。因为营商环境发生变化，不少中国企业撤出，坦桑尼亚的华人数量锐减，单纯依靠当地市场的经营模式变得不那么有效了。

这就像是一次重新洗牌的过程，机遇与挑战并存。老牌的旅行社需要迅速调整业务，初来乍到的公司则要克服创业的困难，所有人都被拉回了同一起跑线。在新的市场环境下，旧有的经验未必适用。谁能尽快开发国内旅游市场，谁就能占据主动。

就在这时，一个来自福建的家族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商机。尽管此前从未涉足过旅游业，但凭借对市场前景的精准把握，其名下“非洲五霸”的旅行社迅速在坦桑尼亚站稳了脚跟。

为探究坦桑尼亚旅游业的发展情况，我联系到了旅行社的经营者之一，东北女生郎瑞琦（Nico）。

郎瑞琦 Nico 的夫家是旅行社背后的福建家族企业的所有者。在旅游业务开始之前，他们的商业活动主要以建筑业

和贸易为主。新总统上任后，随着坦桑的经济环境和政治走向发生变化，整个家族企业也面临着转型的压力。

与此同时，虽然政治格局的变化给许多产业的发展前景带来了变数，但作为当地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旅游业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为了使家族企业得到更加长远和稳定的发展，他们便在 2016 年创办了旅行社，主营旅游和机票预定业务。

Nico 笑称，夫妻二人在旅游业中是如假包换的外行。但一个由“外行”创办的旅行社，能够在强敌环伺的市场中做出口碑，靠的绝不仅仅是运气。

事实上，多年来在非洲的打拼不仅给 Nico 带来了资本的积累，更让她对经商本身有了独到的见解。在 Nico 看来，无论在非洲从事何种行业，只有对当地的经济政治走向和人民生活具备比较敏锐的感知力，才能在自己的行业里生存下去，而不至于陷入被动。

所谓感知力，大抵是对营商局势作出清晰判断的能力。在做旅行社之前，他们也做过其他许多行业。凭借敏锐的判断能力，“大概 80% 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在行业发展相对顶峰的时候，预测到它开始下坡了。然后我们要么把产业转手，要么直接结束掉，然后转入新的行业。”

二

除了商业上的判断力外，要想把旅游业做好，还需要有一种对非洲的情怀。

在非洲开展旅游业，对 Nico 有着特殊的意义。“这可能和我们的背景有关。我在非洲待了大概八九年，我老公也来了接近十年了。在非洲呆久的人一定是对这里有一些热爱的，当然可能也有恨。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热爱，很难坚持下来。因为我们是外行转来的，说白了，我们没有靠旅游业去生存。就算旅行社不赚钱，我们不会影响到当下的生计。做着梦想着的事情，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这份情怀也许是“非洲五霸”和其他华人旅行社最大的不同。Nico 在实现梦想的同时，也在回馈着坦桑尼亚的旅游行业。

“我们在做旅游的过程中，没有拘泥于追求短期的利润和投资回报。和其他旅行社比起来，我们可能就比较‘佛系’了。有的人赚了钱会揣在兜儿里，或者准备买房买车，或者用于其他的投资，但我们会把收入中的一部分投入到新的旅游线路和产品的开发中。从这个意义上讲，非洲五霸虽然不是坦桑第一家这样做的旅行社，但在整个线路引领方面或许可以排在第一位。”

坦桑尼亚境内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光是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和桑给巴尔岛等常规路线，就足以满足绝大多数国内游客的需要。如果只是为了赚钱，商业化的旅行社只需要批量销售常规路线就可以达到目的，因为只有极少数的资深“驴友”才有深入探索的需求。而这些小众线路往往位置偏僻，人际罕至。单纯从经济上考虑，开发它们显然是不划算的。就连 Nico 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我也跟你说实话，即使是开发出来，这样的线路也属

于小众的产品。你说我能大面积地向国内推广，做出个所谓的爆款，把这条线路卖给成千上万人吗？显然这样的线路它卖不了。它们受众就只能局限在某些高端小众的群体。”

旅游资源的开发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不仅需要旅行社在前期投入大量资源亲赴当地采访，拍摄图片，考察线路的可行性与安全性；还需要回到中国去宣传，跑展会，跟国内同行对接。虽然很辛苦，但线路成功开发之后，Nico 从中获得的成就与满足感，以及对人生的感悟，又是商业行为无法提供的。

“说实话，在非洲要想靠旅游业发财，估计会特别累。可能你一年赚的钱，都没人家走几个集装箱货柜赚的钱多，或是没有人家工厂一个月的产值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得到的东西非常多。”

Nico 接着说道，“我们做贸易的时候，看起来每天都很忙，但和当地人的接触并不是很深入。大家无非聊一聊产品和价格，比如摩托车的批发价多少，今天要 10 台，明天要 20 台，等等。旅游业的节奏就会慢一些，也需要我们这些做老板的人自己付出时间和精力，去和其他从业人员聊一下家长里短，倾听他们的故事，记住他们每一个孩子的名字和年龄。和他们交流，你会了解到很多的东西，这也是我做旅游这几年来最大的收获。”

三

就在 2018 年夏天，一位当地司机的出现，再次颠覆了

Nico 对这个行业的印象。

“当时，我们接了一个很大的旅行团，大概有 130 多人，我们就安排了二十几名司机陪同，其中有一位已经接近 60 岁了。一开始我也没注意，以为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儿。没想到，作为一名坦桑当地的司机，他不仅英语说得好，法语也很不错。我就问他，你怎么会这么多语言的呢？他说，自己曾在英国留学，专业是酒店管理。”

更让 Nico 惊讶的是，有这样文化背景的人在坦桑的旅游业中也许并不在少数。

“在保护区里，我们经常会有两车交会的时候。对面车上的游客可能来自世界各地，说什么语言的都有，但有时候我就发现，我们这边的当地司机一个人就能应对得过来，用各种语言和大家打个招呼，甚至聊上几句。其实，掌握一门语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是要付出一定时间的。可以想象，坦桑旅游业的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还是很不错的。有很多人来非洲之前会抱怨，说来非洲旅游怎么这么贵，比去欧洲、美国还贵。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但当我逐渐深入地接触这个行业之后，我才理解它贵的道理。因为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真的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在很多岗位上，都是专业的人在做专业的事。而且你在和他交流时会发现，他们都是真正热爱这个行业的人。”

除了同行之外，从旅行社接待的游客那里，Nico 也学到了不少新的东西。2019 年，非洲五霸旅行社独家开发了一条新的游览路线，涵盖了坦桑境内的许多重要历史文化景点。虽然其中的大部分世界遗产都广为人知，但将这些它们全部

串联起来的路线，在坦桑尼亚旅游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条。

2019年7月，这条线路迎来了一位重要的游客——谢田。谢田是我国著名的环球旅行家和美食家，曾造访过600余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在旅行社的安排下，谢田成功将孔多阿岩画遗址列在了自己的造访名单里。

“谢田是中国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探访量最多的人，他的能量又吸引了一群人参与到我们这条路线中。接完这个团后，给我感觉最深的，不是说我赚了多少钱，而是通过旅行社的平台，将合适的产品提供给了合适的人，这种成就是远远多于金钱所能带来的。这也是我做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四



图2 小剧场演讲后，Nico与珍·古道尔博士的合影

图片来源：Nico提供

不过，最令Nico印象深刻的，是她改行做旅游业后，结识珍·古道尔博士的经历。

珍·古道尔博士是享誉世界的动物行为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她生于英国伦敦，长于英格兰南部，却把大半生的光阴都留给了坦桑尼亚。

1960年7月14日，在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教授的支持下，年仅26岁的古道尔来到了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大陆地区）的贡贝溪流保护区，开始从动物行为学的视角对当地野生黑猩猩种群的社会生活进行研究。一开始，她的研究并不为大众看好。除了质疑她缺乏相应的科研训练以外，人们也难以相信，这样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年轻女子能够适应东非丛林中的艰苦生活。

没想到，古道尔不仅在保护区待了下来，还取得了震惊世界的研究成果。当时，人类学和动物学界普遍认为，只有人类才有选择和制造工具的能力。但她发现，黑猩猩具有制定行动计划的智力水平，同时也懂得加工和制造工具，从而为两个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视角。凭借这一发现，1965年，古道尔在剑桥大学获得了动物行为学博士学位。

完成了学业的古道尔并没有流连于英国都市的舒适生活，而是选择回到贡贝溪流保护区，并在那里筹办了专门的研究中心，继续对保护区内的黑猩猩和狒狒进行野外研究。

到了70年代，由于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和盗猎活动日益猖獗，加之人类活动的影响，黑猩猩的生存面临着严酷的考验。为此，她创立了研究和环保组织“珍·古道尔研究会”。在古道尔的努力下，环保和野生动物保护等议题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关注。而她的影响力也一直持续至今。

“我上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讲的是珍·古道尔和她研究的黑猩猩们。当时只是觉得很佩服她，但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和这位老太太有什么交集。后来开始做旅游之后，我发现她在达累斯萨拉姆还成立了一个环保组织，我就去找她交流了一下。这时我才发现，她做的事情，其实要远远多于我之前了解的。”

Nico 说的这个组织，叫做“根与芽小组”。1991 年，一群坦桑尼亚的学生来到古道尔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家，向她表示希望能够参与到环境、野生动物保护的事业当中。古道尔博士就和这些学生所在的学校合作，成立了第一批根与芽小组。如今，已有 1600 多个小组在 130 多个国家落地生根，活跃在当地的企业、学校和社区中。

为了更多地了解古道尔博士的事业，2017 年时，Nico 曾试着与她联系。幸运的是，不久之后她就收到了古道尔本人的回复。

“我当时问她，您现在还会来坦桑吗？其实我也没抱太大希望，因为你想，一个 83 岁的老太太，再去飞国际航班，我觉得也挺难的。后来她跟我说，她会过来的。我就说，到时候请一定帮我留个位子，我想见您一面。”

结果，到了 2018 年的 6 月份，古道尔博士真的回来了。

“‘根与芽’在达市的负责人联系我说，她要在达市一个叫小剧场的地方办一场演讲会，我就带着我的一位员工一起去了。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中国人，可能是因为比较明显，在演讲过后的提问环节，我还被选中了。活动结束后，我又找

到古道尔，询问她接下来的行程安排。她回答说，马上去保护区了。如果有兴趣的话，她也欢迎我过去。”

面对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Nico 当然没有放过，她当即表示 OK。在和对方对接了时间之后，Nico 终于来到了贡贝溪流保护区，见到了古道尔博士当年驻扎和做实验的地方。

“到那儿之后，感觉怎么样？”

“说实话，我还是挺震撼的。”



图 3 2018 年 6 月，在贡贝溪流保护区珍·古道尔博士的住所，Nico 与狒狒研究专家 Collin 博士和黑猩猩研究专家 Shedrack 博士的合影

图片来源：Nico 提供

也是在这一年，为了唤起公众在保护黑猩猩种群及其栖息地中的参与，同时为了纪念古道尔博士近 60 年来对科学研究和动物保护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联合国将 7 月 14 日确定为世界黑猩猩日。

Nico 和她的同事们也受到了古道尔博士的感召，结合自己在旅行社的工作中接触野生动物的经历，撰写了一系列探讨动物与自然关系的文章。

大草原上生活的这些野生动物，它们的生活背后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哲学呢？Nico 觉得，其实可以用八个字概括，那就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我们平时在中国接触到的社会里充满了竞争。生意人也好，或者是企业家也好，他们工作都非常努力，但也会很累，有时也会忘了生命本身的意义。而当他们来到非洲草原上，看到这些狮子、豹子捕猎，感受到大自然残酷的一面的时候，往往都会有一种觉醒的感觉。”

Nico 把这些文章分成四期，发表在了坦桑当地著名的华人杂志《东非瞭望》上。但当杂志改版，变成以承接广告为主的企业黄页时，Nico 反而不再投稿了。

“写这些文章对我们自己来说主要是一种回忆，宣传旅行社倒是次要的。用现在营销行业的话说，可能算是一种软文吧。读到文章的人也许会有一些感触，然后会稍带着留下一点对旅行社的印象，但不至于立刻来找你报名旅游。当然，我也不想要这么直接的效果，这就是我们家的特点。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情怀吧。”

五

听 Nico 说，在坦桑，每年都会有一些游客被当地的旅行社忽悠。有一回，一些白人游客在来坦桑之前已经将所有款项打给了当地一家有着十几年历史的老牌旅行社。但到了乞力马扎罗机场后，他们发现旅行社并没有安排接机。更过分的是，打电话没人接，发短信和邮件也没人回。无奈之下，这些游客只能选择报警。

后来警察在调查时才发现，这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根据当地旅游业的惯例，外国旅游团在出发之前，要向坦桑负责地接的旅行社支付部分团款。借着流程上的便利，在案件发生的这一年里，老板预收了很多旅行团的团款，而后携款跑路，最后在邻近肯尼亚蒙巴萨的肯坦边境地区被抓获。

和其他所有行业一样，非洲旅游业的从业人员也是鱼龙混杂。专业的工作人员比比皆是，但不讲信用的人也不在少数。就连自己经营旅行社的 Nico，也有过许多次被同行“套路”的经历。



图 4 2019 年 8 月，恩戈罗恩戈罗保护区门口的非洲五霸旅行社车队
图片来源：Nico 提供

一次，非洲五霸旅行社在姆旺扎省接了一个临时拼团的订单。但因为当地的越野车资源有限，Nico 就找到了她的一位印度裔朋友，希望对方可以帮忙找两台车，一台上路，一台备用。考虑到此前在工作上曾与他有过多合作，双方私下里也比较熟悉，所以 Nico 这次也很放心，对方也很快找来了一辆。

没想到，这辆车的车况很差，还没到目的地就坏掉了，但备用的这辆车迟迟没有来到。着急的 Nico 赶忙和这位朋友打电话，却遭到了对方的推脱。

“他就说，车不是我的，是司机的。而且他还借口说现在很忙，没法帮我和司机沟通。我就要来了备用车司机的电话，直接跟对方谈。”

“对方怎么回复的呢？”我接着问。

“对方也跟我‘踢皮球’。他说，钱是那位印度裔朋友付的，是他从这儿订的车，要谈也是和这个人谈。我要是想找车，就得再加一台车的钱。”

对方推脱责任的样子，让 Nico 很是恼火。她直接和对方摊了牌，表示如果不按合同加车，就要去警察局报案。

“我都说了要去告他了，结果对方好气人。他竟然说，你快点去，我等着你！”

但毕竟，旅行社的客人还在等着，Nico 没有时间真的去找警察。如果客人因为旅行体验不佳而投诉了旅行社，作为负责人的她便会十分被动。对方就是吃准了这一点，才敢明目张胆地违约。

在这种情况下，指望警察及时出现主持公道是没有用的。非洲五霸作为地接社，又不可能让客人去为这些不守信用的行为买单，只能自己赔上车钱，又安排了一辆车去接他们。

“这就是坦桑旅游业的经营环境。其实其他的行业也是这样的，哪怕是你的合作伙伴，哪怕有再悠久的历史，再好

的口碑，也存在突然‘反水’的风险。我们在和一些服务商合作的过程中也发现，有些时候，酒店和车辆你都交钱订好了，但是到了真正出行的时候，还是会遇到临时跳票的情况。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风险。”

六

不过说到底，这无非也只是当朋友收了钱却没交车的事，对 Nico 来说算不上多大的困难。“旅游业里最深的套路，还是来自中国人自己。”

2017 年，刚起步不久的非洲五霸旅行社接到了国内发来的一个大单子。这是一个由 80 多名国内游客组成的旅行团。根据规划，旅行团将在地接社非洲五霸的安排下乘越野车从坦桑出发，经由该国北部 Isebania 镇的边境进入肯尼亚，然后继续下一段行程。

这个旅行团中，还有一位特殊的客人：国内发包社的老板，一位六十几岁的老先生。听说，这位老先生在国内旅游界已经打拼了几十年了，也算是行业中泰斗级的人物。遇到老前辈亲自走团，初入旅游业的 Nico 自然不敢怠慢。在与对方沟通时，也一直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一度以“老师”称呼对方。

在行前的对接阶段，Nico 并没有发现任何异样。但从旅行团落地坦桑的第一天起，对方给自己的感觉就开始不一样了。

“刚到酒店，这位老师就给我打电话，并以一种非常严

厉的口气质问我，一会说房间订得不对，一会说我们别的地方有问题。我当时也有点懵，因为我们确实是按名单订的房间，而且酒店一般也不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还好现场还有我们旅行社的导游在，我就说老师您先别着急，让我和导游了解一下情况。”

过了一会，导游反馈说，酒店这边已经没问题了。毕竟对方是行业泰斗，此时的 Nico 还没敢多想，就劝自己说，没准对方因为英语不太好，有些事情没理解清楚，所以遇到了些误会。但随着老先生抱怨的事情越来越多，没在现场的她也开始感觉不对劲了。

“后来我就发现，这位老师好像一直在挑事。遇到任何一点小的问题，都想要把它的影响扩大化。”

按照行业惯例，除非地接社出现及其严重的工作失误，否则发包的旅行社必须在旅行团离开当地之前向地接社付清尾款。想到这里时，Nico 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但出于对老先生的尊重，她还是决定再多方了解一下。直到遇到了两位同行的善意提醒，她才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其中一位告诉 Nico：“这个老师的儿子也是做一行的，他们之前靠旅游业赚了几千万。你知道是赚在哪儿吗？”

“这个我不知道。但据我了解，全世界的旅游线路他几乎都在做，而且报价特别低。我做地接，也大概了解这一行的成本。这样的报价基本上就是个成本价，几乎没有利润空间。”

“我告诉你，这些钱大部分是在泰国赚的——之前去那

里旅游不是特别火嘛。但他们赚的不是利润差，而是地接的尾款！”

另一位和这位老师打了三十年交道的大叔，则直接戳穿了他的套路。

“他一直都是这样。当年和我们合作时，他就故意把行程设计得非常紧密。每个阶段都很短，看起来都可以实现，但执行起来难度特别大。为了赚钱，我们肯定咬咬牙接下来。但做旅游的都知道，没有一个团可以顺顺利利走完全程的，想找问题太容易了。稍微有一个环节没能衔接上，他就会投诉你，目的就是把尾款赖掉！”

尾款大概占总款项的 10% 到 20%，再乘上全团的费用，就是很大一笔钱。因此，同行们异口同声地建议 Nico，不论采取怎样的手段，一定要把尾款要到手。

当 Nico 下定决心时，已经是国内时间最后一天的下午。按理说，这行程快结束了，尾款应该打过来了才是，但对方迟迟没有付款。于是，Nico 就和司机们约好，请他们务必在边境前把车停下，没有她的信号，谁都不能向前。

在荒无人烟的国家公园里，没有越野车，旅行团无疑寸步难行。Nico 想用这种办法逼迫对方尽快打钱。

没想到，对方也是十足的“老油条”。一方面，因为他们将行程安排得十分紧迫，司机们最多只能停车半小时，否则将过不了边境；另一方面，这位老师十分清楚地接社的反抗手段，在从国内出发前就让领队随身带了几千美元。见越野车迟迟没有开动，他便派领队带着钱找到司机，问需要给

多少钱，才可以继续开车。

这紧张刺激的剧情，简直比电影还精彩。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司机没有拿领队的钱，而是选择把现场的情况反馈给了 Nico。

“这也和我们旅行社的风格有关。我平时一般不会亏待我的司机们，和他们之间有一种兄弟姐妹的情谊。关键时刻，他们也比较靠得住。他们就问我，这可不可以收，我说千万不能。这些人很聪明，想拿几千美元的小钱诱惑司机，等到了下一个国家，他们就可以解放了。但我们的尾款可是有几万美元呢。”

最后，在 Nico 和司机们的坚持下，这位老先生没有顶住压力，还是同意付了尾款。Nico 也是十分后怕。“可以看出来，他们是早有预谋的，整件事也是一环扣这一环。要是没有同行提醒，我肯定已经落入他们的圈套里了。”

“如果没有收到尾款，你们会怎么办呢？”

“就算是最坏的情况，他最后没有付给我们尾款，我们也会把这 80 多位客人安全送到肯尼亚的。这是职业素质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旅行社之间的矛盾而影响客人们的体验。包括司机说最多停车半小时，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后来呢？”

“后来到了肯尼亚，这个老师又想使出同样的招数，就是不给尾款。结果那边的地接社就没有我这么客气了——直接报警，把所有人带到了警察局。你想，人家千里迢迢来非

洲旅游，还没怎么玩，就又是见警察，又要做笔录的，影响十分不好。这件事之后，因为他还接了别的团，硬着头皮也得做下去，而且我这边的处理方式也没那么极端，他就又联系到我。但被我给拒绝了。说实话，我是真的不想接，这样的钱赚得实在太累了。”



图 5 2019 年 4 月中国出入境旅游交易会上，Nico 作为坦桑尼亚国家展参展代表，与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合影

图片来源：Nico 提供

随着在坦桑尼亚的年头越来越久，Nico 对于合作伙伴的这些伎俩也有了一定的了解。通过和警察局、移民局还有税务部门的接触，她发现，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结交到可靠的当地朋友。

“中国有句话，‘出门靠朋友’。你要想在一个国家扎根下来谋求发展，说白了就是想从这儿赚到钱，或者至少想要保证安全和稳定，就一定要有当地的朋友。作为外来户，你的信息储备是远不如当地人的。如果遇到什么事情，能有一两个信得过的当地朋友给你提供建议，这对你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朋友不可靠，会怎么样呢？”

Nico 没有直接告诉我，而是讲了一个自己旅行社的故事。

七

根据坦桑税务局的规定，年营业额为一亿先令以上，或半年营业额为五千万先令以上的企业，都需要申请办理增值税缴税号码及证书。另外，企业每月报税时，还有义务向税务部门提供缴税证明，也就是税票。

税务局在核查税款时，也秉持着“多退少补”的原则。如果税票的金额少于应缴的增值税，税务局便会要求企业补缴。但如果企业提供的税票金额多于税款，则多出的部分可以算作结余，可供下次报税时抵用。

出于谨慎，Nico 在旅行社刚注册成立时，便要求会计申请了增值税号。虽说高达 18% 的增值税率曾一度让她抱怨连连——“哪个行业的利润能达到 18%？”但正因为从来没有打过偷税漏税的主意，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旅行社都没有遇到过税务部门的刁难。

直到有一天，正在国内休假的 Nico 突然接到一位坦桑员工的电话。“会计让我和你说，我们这个月要补缴 1700 万先令的税款。”而这时，距离当月的报税时间只有两天了。

Nico 听了，急得差点跳起来。“这么重要的信息，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对方却无辜地答道，这是上周末听会计说的，而当时自

己已经回家了,就让会计直接跟 Nico 打电话。自己相信会计,也没有再问,便安心在家过周末了。但很显然,会计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直到事情瞒不住了,自己又担心受到批评,才告诉了 Nico。

这时,旅行社遵纪守法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每个月我都要求会计如实报税,虽然说我今年有几个月在国内,但也知道旅行社的整个运营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差这么多税款。我就让所有在坦桑的员工一起找税票核对。果然,问题不在税款,而是在税票上。”

原来,这 1700 万美元先令的税票应该由旅行社在阿鲁沙的一家合作酒店提供。但从 1 月到 8 月,旅行社没有收到过一张税票。

“因为时间只有两天了,我就告诉这位员工说,你现在立刻买机票飞到阿鲁沙,直接冲到这家酒店,哪怕不睡觉,都要把能搜集到的税票全都给我搜过来!”

经过一番波折,事情终于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但这件事也让 Nico 意识到,自己公司内部的运营管理出了大问题。

旅行社的办公室主要由一名中方经理负责统筹,一名当地会计负责每月的报税工作,另有工作人员若干。由于会计从来没有汇报过税务上的问题,Nico 和经理也觉得一切正常。但正因为大家各有各的分工,出现问题之后也就有了推诿的空间。

当时是一名叫 Irene 的当地员工负责到阿鲁沙取税票。因为旅行社的中国导游 Nancy 正好要去那里出差,Irene

就拜托她帮忙，顺便去酒店取一下。Nancy到了酒店后发现，对方还没有准备好税票，而自己马上又要去带团，就跟Irene说了一声，自己先走了，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直到报税前两天，Irene见事情瞒不下去了，才捅了出来。令Nico哭笑不得的是，事情结束后，这两人还在办公室里大吵了一架，都认为是对方的错。

气愤之余，Nico也有些无奈。“我相信，这样的事肯定不是个例，其他的公司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有些当地员工的工作态度没有那么认真仔细，做事总是会有些遗漏的地方。而当这些小疏忽最终暴露出来的时候，往往都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什么事情都经不起这样折腾。”

但转念一想，很多公司在开始营业之前，在注册公司、办理执照和申请工作签证的阶段就已经倒下了。这些证件没个一年半载的时间根本拿不下来，其实也挺打击人。相比之下，自己旅行社能够经营到今天，Nico觉得，仍是值得庆幸。

结语

人们常说，“商场如战场”。在商界中打拼，不仅需要抵御市场风浪的冲击，也要时刻应对身边大大小小的挑战。但其中的辛酸，却很难能得到其服务对象的理解与同情。食客在品尝美味佳肴时，或许很少会注意到经营者为采购、装潢与营销所付出的辛劳。同样，游客在饱览热带草原的大好风光时，通常也难以体会经营者在扩展线路、协调司乘以及配合监管等方面所投入的心血。而田野中的观察，则帮助我捕

捉到了这些细节。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消费者，与她们的对话使我对在坦桑尼亚各行各业打拼的国人满怀敬意。而作为一名研究者，尤其在国际发展这样一门较为强调实践性知识的学科之中，在难以直接参与生产性活动的情况下，对她们经营活动的田野观察，也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了我对坦桑尼亚相关产业发展的把握。在此，我谨向她们表达诚挚的谢意。

责任编辑：郑楠 文字审校：许帅

一个希伯来语学生和家人在东耶路撒冷的九个月

梅华龙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助理教授，专业为古代地中海东岸研究，曾在巴以地区居住

当我想记述自己在巴以地区的见闻和感受时，突然发觉一切已非常遥远。短短两年多，曾经鲜明的记忆已经苍白，曾经连续故事情节也只剩下了片段，甚至需要翻看电脑中的相册来唤醒记忆。而由于全球新冠疫情尚未过去，国际人员流动减缓，国与国之间的界线似乎比前几年明显了许多。之前熟悉的街道、建筑和当地人，变得再度陌生和疏远起来。

从 2010 年开始，我曾先后三次在巴以地区居住。每次的时间都不长，分别是 2010 年至 2011 年的 4 个月，2012 年的 2 个月和 2017 年到 2018 年的 9 个月，总共刚刚超过一年。与在那边的留学生、工人乃至定居的少数中国人相比，我的经历算不上丰富。除此之外，我与“田野”间的距离也比较大。我的专业原本是希伯来语，后到美国读硕士、博士期间转到古代叙利亚—巴勒斯坦、《希伯来圣经》、古代西亚北非等领域。既不是现代以色列领域的专家，又不是人类学专业的学生，我这三度赴巴以地区生活过程中都并未有意识地设计问题、调查并采访，也未曾有意识地去把握自己和他者的距离，以做出符合学科规范的观察和研究。因此，我在此只能提供一个“非专业”的过客视角，以供读者批评。

法国山——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点

我第一次和第三次在巴以地区的学习都在希伯来大学，居住地的地理范围属东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宿舍所在的法国山社区，是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后在新占领土上建设的定居点，主要为给北美犹太人移民提供落脚点。2017-2018年，我居住的老旧宿舍楼就是建给加拿大移民的。虽然是犹太定居点，但由于地处巴勒斯坦人聚居的东耶路撒冷，所以此处也有一些阿拉伯家庭。其中有些家族来自巴勒斯坦其他地区，他们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后，离开被以方占领的家园，逃到当时由约旦管理的法国山地区。而二十年后这一地区也被以色列占领。随着犹太移民的迁入，巴勒斯坦家庭逐渐变成了少数。



图1 希伯来大学学生村宿舍，位于法国山

图片来源：作者家属拍摄

应该说，至少在法国山地区，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关系并不算紧张。在法国山上有一所犹太中学，大门从不关闭。我当时经常带小孩到里面踢球，而去里面玩耍的也有不少巴勒斯坦孩子。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有位身体残疾的巴勒斯坦孩子，只能用手撑着身体在地上爬行并用手击球，但他的玩伴

仍会很开心地跟他一起玩耍。当然，偶尔也有犹太家长带孩子来踢球，只不过从没见到他们和巴勒斯坦小孩同场竞技。其实，我当时所居住的大学宿舍（Aadlson）内部就与几户巴勒斯坦家庭相连，而这也给巴勒斯坦孩子提供了到宿舍区嬉戏打闹的机会。

此外，法国山上有一家法拉费（Falafel）店。所谓“法拉费”是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一种小吃，即用磨碎的鹰嘴豆混合其他作料油炸而成的“素丸子”。一般与蔬菜、薯条和炸茄子一起夹在饼里食用。法国山上这家店水平极高，被誉为耶路撒冷最好吃的一家法拉费店。记得有次，一个开车远道而来的犹太人用希伯来语对店主啧啧称赞：“我的朋友们都说一定要来尝尝。大家都说你家的法拉费是耶路撒冷一绝！”而店主也腼腆地用希伯来语对犹太顾客表示感谢。



图2 法国山犹太中学操场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不过，除开个体因素，这种融洽背后或许只是双方对隔阂的暂时搁置。不知是宗教饮食法的区别还是其他原因，在耶路撒冷并不能经常见到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光顾彼此的店

铺。我在巴勒斯坦的村子里买了 9 个月的菜，却只有一次见到犹太顾客。在宿舍不远处的犹太超市（一家名叫 Yesh，另一家曾叫 Mister Zol，后改为 Coop Shop）里也只是偶尔才能见到巴勒斯坦人。当然，在一日三餐之外的银行、邮局和政府机关方面，巴勒斯坦人则是无法避开以色列机构的。

这种经济和消费行为上的隔阂其实比双方的文化隔阂更有趣。说起文化隔阂，主要是指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乐于关注自己语言的媒体，并因而对于很多话题（包括对华看法）都分别秉持自己的价值观。以色列人对中国的看法更接近受 BBC、CNN 影响的西方人，而巴勒斯坦人对中国的认识与我们的看法则更接近一些。当然，关注不同媒体和文化圈这一点在双语地区并不罕见。而在经济上，除了彼此大多光顾自己族群的店面之外，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比邻而居的犹太和巴勒斯坦社区也很可能有两套不同的物价体系。当 2010 年希伯来大学内的法拉费卖到 13 谢克尔（约人民币 25 元）时，法国山上的巴勒斯坦人店却只卖 10 谢克尔。直到 2018 年，耶路撒冷老城附近比较简陋的巴勒斯坦摊位还有仅售 7 谢克尔的饼夹法拉费。此外，似乎巴勒斯坦人在服务业方面的劳力——不管是餐馆还是理发店乃至租车行——总是没有犹太人的劳力值钱，即便两家店相距并不算远。



图 3 黎凡特南部名小吃烤饼夹法拉费
图片来源：作者家属拍摄

回到法国山，巴勒斯坦最负盛名的那家法拉费店旁边的一家店的招牌似乎在提醒着人们此处并不平静的过往。那家店名叫 Liftawi——表示店主的家族来自耶路撒冷郊外的 Lifta 村。而这个村子的居民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战火中被迫背井离乡，其中一些家庭迁居到法国山至今。而法国山周边的街道名称也充满了“征服者”的气息，如莱希街（Lehi St.）和不远处 Ramat Eshkol 社区的“六日战争街”（Sheshet Hayamim）。莱希是英国委任统治时期活跃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准军事组织，以暴力恐怖活动和暗杀行为著称，曾刺杀联合国巴勒斯坦事务调停官福克·伯纳多特。而六日战争则是 1967 年让以色列一举夺下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一场胜仗。因此，稍加留心，就能发现这里到处可见的民族主义和族群冲突的痕迹。

美丽的泡泡——希伯来大学本科交换生活

尽管法国山社区内仍然存在不少阿拉伯元素，但只要愿意，我完全可以做到宿舍和图书馆两点一线，完全不和阿拉伯人打交道。在 2010 年 10 月读大学四年级时，我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交换就几乎是这种状态。

希伯来大学校园和宿舍生活区的设计很巧妙。我曾经住过的希伯来大学学生村宿舍就在 Aadlson 的隔壁。宿舍区内部就有家小超市。而从大门出去则矗立着几座犹太居民楼，再往前走则是一片小型商业综合体。虽其貌不扬，但店面类型还算丰富。杂货店、餐馆、银行一应俱全，还有一家水平不高但价格昂贵的日本料理（名叫 Japan Japan）。再前面就

是超市 Coop Shop，里面蔬菜种类少、价格高，但也能对付着生活几个月。再往前走似乎还有一家犹太会堂和另一片犹太居民楼。

而我每日上课，则需从后门出去，经过一战时留下的英军公墓（见图 4）再一路上坡，路过以色列人的 Hadassah 医院和大学的若干办公楼后，很快便可走到瞭望山上的大学校门了。校区依山而建，整体呈长条状。进校门后，左手边是学校设计的一座狭长的植物园，刚好将山谷中那个拥挤的巴勒斯坦村落彻底挡上（在下文中我们还会谈谈这个村子）。在校园中一路向前，很快就会到达学校主楼。之后再穿过“Forum”，就是办公楼和教学楼。而 Forum 地下有一个公交枢纽，由此处乘公交可驶往耶路撒冷市的公共机构（如政府、博物馆）及西耶路撒冷的犹太社区。



图 4 位于希伯来大学瞭望山校区与宿舍区之间的一战英军公墓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在这种或有心或无意的安排下，作为一个外国学生，完全可能这里读上好几年书都将自己与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元

素隔绝开来。至少对于我而言，在大四交换的那个学期对东耶路撒冷几乎没有概念。与许多人一样，由于没有每日接触的机会，我那时对阿拉伯社区也有一种淡淡的抵触和恐惧。学校对我这种短期学生很是“照顾”。一方面，他们会组织一些浏览活动，带大家去参观以色列的各种锡安主义“教育基地”，如死海马萨达遗址；另一方面，工作人员还热心地告诉我们：东耶路撒冷要少去，阿拉伯村子不要去。至于约旦河西岸，如果想去伯利恒这个传说中耶稣的出生地，则可以结队前往；至于西岸其他地方，不论是巴勒斯坦政府所在地拉马拉，还是文化名城希伯伦，都尽量不要去。总之，学校要我们离阿拉伯村子远一点。

记得在学前教育时，曾有个满口美式英语戴着犹太小帽的男工作人员大手一挥指着窗外，然后连看都没看他手指的方向，就带着关心和同情的神态对我们说：“同学们，如果你们去了那个阿拉伯村子，万一——愿上帝不要允许这样的事儿发生——你们出了什么事，要知道，以色列的警察也爱莫能助，想帮也帮不上你们呀！所以，千千万万不要去那里。”



图5 从希伯来大学教学楼眺望伊萨维亚村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那时我学业繁忙，同时还在申请美国的研究生项目，所以基本上没有去过他们不建议去的地方。而逛耶路撒冷则是课程安排的一部分。后来我慢慢不太“安分”，在2011年初快离开时去了伯利恒、希伯伦，但这是后话了。在学校附近我却是未敢越雷池半步，谨遵教诲，从未进入学校边上的阿拉伯村子。大多数时候我都呆在宿舍和学校，下课后就去国际部或本部图书馆。

整个校园洋溢着西方的气息——是的，这也是很多以色列人最重要的身份认同来源。他们常常把“我们西方”这两个词挂在嘴边。后来我在美国生活了六年，欧洲一年，加在一起听到的“我们西方”也不如在以色列时听到的多。在我看来，以色列的西方气息是认真的。我们且不去提现代锡安主义与欧洲和西方思想错综复杂的关系，以色列的“西方”认同单是通过一些表面情况就一目了然了。比如，以色列早就不再参加亚洲杯和亚运会，连类似“好声音”的节目也早已脱亚入欧。而在西方气质十足的希伯来大学校园里，如果你慢慢从图书馆踱出来，在开放式的Cafe喝上一杯咖啡，和朋友们聊聊天、谈谈历史和哲学——这和在纽约、柏林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这时候，谁又会想起巴勒斯坦人？至少十年前我很少想起。每天和一群美国人、韩国人一起上古希腊语、阿卡德语、亚兰语和耶路撒冷考古等课程，那时候，对于我来说，阿拉伯人似乎只是学校里默默无闻的几个清洁工，卖法拉费的小贩，大街上看上去有点流里流气的年轻人，乃至老城里偶尔伸着手找游客要钱的小孩子。我未曾思考过他们有怎样的人生，没有好奇过他们为什么会做出某种举动。当然，去北部

或约旦河西岸时，就完全不可能忽视阿拉伯人的存在。但很大程度上，在东耶路撒冷，特别是阿拉伯人聚居的东耶路撒冷，他们只是希大留学生西方式学习和生活的背景板而已。



图 6 希伯来大学植物园及山谷中的阿拉伯村落

图片来源: wikimedia.org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好像生活在一个美丽且与世隔绝的泡泡里，百米之外就仿佛是另一个世界。这个比喻并非我的发明，2015年，当那个巴勒斯坦村落因与以方的冲突被军警围困时，参与村民抗议的一位希伯来大学知名左翼犹太人教授说过同样的话：“当我们日复一日在希伯来大学的教室和咖啡厅里谈天说地时，这个村子里刚刚有老人因为军警围困而无法被及时送到咫尺之遥的 Hadassah 医院里，最终死在了车上。”

生活在东耶路撒冷

不过，当我 2017 年再次来到耶路撒冷时，就注定不可避免地要与阿拉伯人多打交道了。首先，我这次到耶路撒冷

来，不仅是以希伯来大学访问博士生的身份，而且还在某考古研究所做访问学者。这家考古所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著名商业街萨拉丁大街上，是美国人建立并运营的。所内从装潢到人事安排都散发着殖民主义气息。里面的财务人员、厨师等都是巴勒斯坦人。而我哪怕每周只去两三次，也少不了和他们交往。此外，萨拉丁大街附近就是耶路撒冷老城的穆斯林林区，店铺林立，是买菜购物的好去处。更重要的是，这次我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一家四口。我们阴差阳错地将两个孩子送到了耶路撒冷东北部舒阿法特（Shu'afat）社区的巴勒斯坦幼儿园。这样一来，我们的“东耶归属感”就更强了。



图7 颇具殖民风情的美国考古所；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商业核心区萨拉丁大街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其实，给孩子选择幼儿园这件事颇让我们费了一番心思。2017年7月，我们一家还在波士顿，而9月份就要搬到耶路撒冷了。之前我也并没有想过要把孩子送到巴勒斯坦人的幼儿园，所以在网上找了家位于南耶路撒冷的犹太幼儿园。这家幼儿园老板是阿根廷犹太人移民，似乎对让人提前交学费这件事有着某种的执念：她无论如何要让我们在还没到以

色列的时候就提前两个月交学费。但我那时没有以色列的账户，而从美国或中国账户打钱过去的话，手续费是极高的。当时，我已经交了两个孩子一个月的学费作为定金，总额超过人民币一万元，但她还执意让我续交一个月。无论我怎么恳求她，她就是不答应我到以色列之后再继续交学费的请求。之后她开始写邮件威胁我，号称要找议员朋友吊销我的签证（但那个“议员朋友”的邮箱早已作废），让我作为外国人小心点儿云云，出言不逊。于是，我最终只得放弃这家幼儿园。因为，就算吵架吵赢了，我也不敢把孩子送到她那里。我不认为她是坏人，但在误会之下，她会如何对待我的孩子呢？至于那一万块钱，我只能自认倒霉。在那之前我已在以色列居住过两次，虽然已经知道当地服务业水平一般，但这样直接抢的情况，却是第一次遇到。

就在我焦头烂额的时候，一位学阿语的北大学弟给我介绍了一家巴勒斯坦人的幼儿园。我写邮件过去，对方回复很简单，只是让我把两个孩子的护照首页复印件发过去。我看着带有错别字的回复，想起在巴以地区华人圈里广为流传的“阿拉伯人办事没谱”的传言，心里也没抱太大期望。接下来几周我们都没联系。由于没交定金、占位费，我曾以为对方早已把这件事抛到脑后。

9月初，我们从美国飞到巴以。在租车、买SIM卡后，我就开始联系巴勒斯坦幼儿园园长。对方不紧不慢地告诉我“下午过来就行”。当我走进这栋看起来和巴勒斯坦民房差不多的幼儿园里时，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就看到三十出头的园长拿出早就打印好的护照首页跟我说：“孩子的档案我已经建好了。”

这让我很惊讶。与其说因为这位阿拉伯人“很靠谱”而惊讶（这样想也是带有成见的脸谱化看法了），倒不如说我惊讶于他对我的信任。我刚刚在以色列幼儿园那边亏了一万块学费，而这边连定金都没收，居然给小孩留了位置？



图8 我两个小孩就读的巴勒斯坦幼儿园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刚坐下，园长就热情地问我：“这是你第一次到巴勒斯坦来吗？”

“巴勒斯坦？”我一时语塞。是啊，对于他而言，耶路撒冷当然就是巴勒斯坦，特别是东耶路撒冷。我小心翼翼地说：“第三次。”

我推想他不会对我学过希伯来语很感兴趣，于是就没有提这件事。但很快他又打消了我的疑虑，他说自己在以色列开放大学学过法律，因为“想听听另一方的声音”。之后我还和他聊了两句政治，感觉他是个有知识储备且关心这些议题的耶路撒冷市民。他还告诉我自己住在西尔万村(Silwan)，这是老城外一个很大的巴勒斯坦村子。近些年以色列政府在

那里修建了“大卫城遗址”，成为了著名景点，村里也有不少从欧美过去的犹太定居者。



图9 老城门外 Silwan 村“大卫城”公园夜景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图10 大卫城所在的 Silwan 村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巴勒斯坦村落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图中离我们最近的民房上悬挂着以色列国旗，很可能表示这家是村中的犹太定居者；有犹太基金会专门联系海外犹太人移民至巴勒斯坦村落）

当然，从简单交流中我很难看出他对以色列的看法。他去以色列上过学，但另一方面，他说自己不愿从事法律工作，“用以色列的法律去压迫同胞”。但他收的是谢克尔，给我的信用卡小票也写满了希伯来语。不论他们是否愿意，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无论如何也很难在生活中摆脱以色列的痕迹。在后来的东耶生活中，虽然偶尔有巴勒斯坦人跟我说“不喜欢外国人跟他们讲希伯来语”，但也有少数英语不好的巴勒斯坦人只能用希伯来语和我交流。在萨拉丁大街上，尽管从建筑的样式和颜色到贩卖的商品，看起来都和约旦河西岸乃至约旦的城镇无异，但街道尽头以色列警察局上高悬的大卫星旗、路边的持枪军警和犹太节日时的庆祝标语，还是让人能轻易地感受到空气中的一丝不适和紧张。



图 11 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后
老城和萨拉丁大街附近时刻戒备的以色列警察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接下来 9 个月的生活，除了写博士论文、听讲座、去图书馆之外，我就是日复一日去巴勒斯坦幼儿园接孩子，隔几日到老城附近的巴勒斯坦区买菜。在幼儿园，几个老师都是

女性，其中有多位包头巾、一位不包头巾。久而久之，当我去接小孩时，他们就会跟屋里面喊一句：“Abu Zhaoxi 来了！”Zhaoxi 是我儿子的名字，Abu 是“父亲”的意思。有些阿拉伯人的名号是 Abu 加长子的名字(kunya)。有趣的是，他们似乎从没以“中国人”、“中国孩子”来指代我和我的儿女，倒是很快给我起了一个阿拉伯代号，仿佛我和他们本地人也没什么两样一般。

在这 9 个月生活中，我感到东耶路撒冷当地人其实很像我小时候的邻居们。我小时候生活在天津城乡结合部国企宿舍。有段时间我跟着姥爷姥姥，他们不在家的时候就把我交给邻居。邻里间吵架拌嘴难以避免，也没有现代社会意义上的“高素质”和“守规矩”，但彼此之间的关系很热络，也守着传统社会内部大家都懂的“规矩”。



图 12 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后，以色列军警在老城大马士革门前设立栏杆以阻拦巴勒斯坦群众聚集抗议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在东耶路撒冷也有类似的感觉，虽然有时候比较脏乱差，

车辆也会乱停，甚至大吵大闹。但人与人之间似乎多了份理解。有次去 Wadi al-Joz 村买菜，少带了现金，再加上他们没有信用卡和手机支付，一时间很是尴尬。因为差的不是三毛两毛，而是整整 60 谢克尔（人民币 120 元）。我非常为难地开口告诉摊主大爷实情时，生怕他要骂人。结果他只是看了我一眼：“下次再给我吧。”生意太忙，他没空跟我说太多。

可是他怎么知道还有下次？我是个外国人，难道我不会三天后回国吗？外国游客不会自己买菜？恐怕这位老人家还不知道“民宿”这样东西。当两三周后我又去那家店买菜时，他们已经对这件事毫无印象了。我对他们说：“我欠你们 sixty 谢克尔。”而这时，有趣的一幕发生了：巴勒斯坦人有个特点，英语的 sixteen 和 sixty 几乎无法分辨，因为重音都在第一个音节上。然后他点点头，以为我只欠他 16 谢克尔，然后据此把零钱找给了我。我说：“您错了，是 sixty, sitin（阿语），shishim（希语）！”他才恍然大悟：“啊！Shishim！好的。”然后，他对我笑了笑，把这次买的菜递到我手上。



图 13 巴勒斯坦超市中的打折鹰嘴豆酱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就是在这种点滴交往中，我慢慢把自己当成了东耶社区的一份子。在国外居住的八年中，东耶是我住得最短但最认真的一个地方。我知道去哪里可以买到便宜菜，我知道哪家的 shawarma 好吃，我帮想去中国进货的巴勒斯坦店主大叔定过机票，去老城和巴勒斯坦小伙子一起排队理发，也在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并引起轩然大波后到大马士革门附近观察当地人的态度。我还曾采访过幼儿园园长，了解了普通东耶路撒冷市民眼中的巴以问题及其前景。我发现，其实像他这样关心政治和时事的巴勒斯坦人，对局势的理解是很深刻的。比如，当时他们就明白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并不十分在意巴勒斯坦的利益，相反他们会很快与以色列建立友好关系。

现在我已回国工作，每每想起那些日子，还是深深地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想去了解其他国家的人民，在图书馆徜徉或在媒体上发声都不如在当地人当中生活一段时间来得有意义。

总之，虽然老城里的小商小贩可能会坑游客，但在景点外却是踏踏实实的街坊感。慢慢地，不管是理发还是租车，所有事务我几乎都在东耶办理。因为同样的服务，这里比西耶路撒冷要便宜、灵活，态度也要好一些。

于是，我很快又想起了希伯来大学边上那个神秘的巴勒斯坦村子——那个“千万不要去”的村子。那里会是什么样呢？

不是边界的边界——大学附近的伊萨维亚村

上文说到，2010年第一次到希伯来大学时我被学校工作人员教育“永远不要到学校旁边的村子里去”。那次是我第二次出国，没经验，所以很小心也很听话。那个村子位于希伯来大学东部的山谷中，但进入校门后的长条状植物园刚好把它挡得严严实实。不过从教室窗户向外眺望时，还是很难避开那一片拥挤、杂乱而单调的土黄色楼房。那里几乎没有像样的绿化。而如果不仔细看，大多数人都会错过更远处的景象——蜿蜒曲折的水泥高墙，将墙两边一样的黄色土丘和黄色楼房隔成了两个世界。没错，那就是著名的巴以隔离墙。



图 14 伊萨维亚村远处的巴以隔离墙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2010年时我并没有关心这些细节。记得刚去时，我对着教室窗外，满眼都是让人感到绝望的土黄色。我心想：“那里是不是快到‘边界’了？再远处，就是古代亚扪人或摩押人的地盘了吧？”（亚扪和摩押这两个王国位于今天约旦）记得当时还照了张照片发到网上，注释就是类似的话。是的，

虽然那时候地图早就记在心里了，可是在现实中我居然觉得耶路撒冷向远处眺望就已经是约旦了！和许多到这里来的外国留学生一样，不知为何，在我们眼中“巴勒斯坦”和“约旦河西岸”似乎是不存在的。

2017年时我才明白，误将这个村子的所在地当作“边界”的外国人不止我一个。一位来自国内的老教授说自己曾问守在学校大门口和村子入口处的以色列士兵：“那里就是边界吧？”对方并没有否认。他说：“看看以色列人多辛苦！一流学府就建在边界上，还需要士兵驻守！”



图 15 从希伯来大学校门处眺望山谷中的阿拉伯村落，一种边界感油然而生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当然了，我在 2010 年很快就明白了，那里根本不是什么边界地区，而只是学校毗邻的一个阿拉伯村子而已。但由于学校国际部工作人员的教导已经铭记在心，我一直没想过进村看看，甚至也没关心过村名是什么。2012 年，我已经在美国读研。暑期，随学校到亚实基伦参加考古发掘。其间，学校又组织了耶路撒冷一日游，导游是哈佛近东系考古学的学长。我们一行在耶路撒冷城墙上散步时，他突然对大家说：

“对了，希伯来大学附近有个阿拉伯村子——那里你们千万不要进去。里面的人可能有枪，据说他们手里还有毒品。”可以持枪，可能还有毒品？“那你们美国不也是这样……”我心里开着玩笑，但并没有说出来。人家毕竟是好意，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和健康着想。

到了2017年，我发现去希伯来大学国际部读书的一些中国同学也得到过类似劝诫。有趣的是，那年十月，有个国内自媒体大V团访问巴以，据随队媒体人士说，他们的以方导游也说过类似的话。只不过这次把对象放大到整个东耶路撒冷：“你们不要去东耶路撒冷，那里治安差，人很野蛮。”

而那时，因为我早已把孩子送到了东耶的幼儿园，经常去东耶村子买菜，所以再听到这种话就感到愈发诧异了。这也激发了我要看看“野蛮”村子的兴趣。当然，在去之前，我也特意询问了曾在希伯来大学学习过阿语的中国留学生，毕竟他们对巴勒斯坦人的了解往往比我们多。几位去过这个村子的同学都告诉我里面一切如常，让我不必担心。

于是，有一天，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后，我们就开车顺着加油站边上的小路进入村子。这个村子名叫Isawiya，据说这个名字可能与“耶稣”（阿拉伯语‘Īsā）有关。不过，现在村内居民基本上都是穆斯林。村中耸立着一座宣礼塔。周边的民房一般是几层小楼，有些看起来很新，而也有些则明显是后来加盖的，因而看上去有些杂乱。村中基本上都是柏油路，但十分狭窄，有的地方错车很困难。在村里，我们自然并没有看到什么危险的人物。由于天气炎热，一路上并没有看到几个人，大概村民要么外出工作，要么在家休息。

与老城外、橄榄山以及幼儿园所在的社区不同，这个村子从地势上看似乎更封闭。除了那条公路之外，想进村可能只能走大学门口的土路了。村内并不热闹，没什么商业设施。有一家肉铺，名字也不出奇，就叫“Isawiya 肉铺”，铺面招牌上的小羊面带和蔼的微笑。此外，村里还有一家卖阿拉伯三明治的小餐馆，但没有卖法拉费的店。路边的孩子告诉我，想吃法拉费得去法国山——也就是我熟悉的那两家。这种萧瑟和封闭的确给人一种身处边界之外另一个社会的错觉。



图 16 村中涂鸦：巴勒斯坦国旗及口号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真正引人注目的，除了村民在拥挤环境中还开辟出一小块养马场一事令人称奇之外，就是街道上悬挂着和墙上涂画着的标语和涂鸦了。这些在其他东耶路撒冷村落中并不常见，标语和涂鸦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巴勒斯坦国旗、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先驱画像等。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面我们并未见到什么伊斯兰宗教元素。



图 17 村中悬挂的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前领导人头像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比如，有一张画像的主角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前领导人瓦蒂耶·哈达德（Wadie Hadad）。他出生于巴勒斯坦的一个东正教家庭，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成为难民并流亡至黎巴嫩。他是个有泛阿拉伯主义和社会主义背景的政治活动家，并强调巴勒斯坦需要武装抵抗以色列的占领。1978年，哈达德在民主德国因白血病去世，但也有人声称他是被摩萨德所毒杀。除此之外，村内还能看到其他带有社会主义和武力抵抗元素的内容，比如巴勒斯坦人十分喜爱的切·格瓦拉。在一户家庭的院子里，我还瞥见了高悬的巴勒斯坦国旗。如果只看这些标语和涂鸦，这里似乎和我后来去的位于约旦河西岸的难民营有点类似，只不过此处涂鸦的形式和内容没有难民营里那么丰富而已。而这种与一墙之隔的希伯来大学全然不同的文化和政治氛围，自然也让这里更像是边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了。



图 18 村中悬挂的格瓦拉头像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我们后来又去了几次 Isawiya, 有时去买肉, 有时去散步, 我发现他们对中国人还是和其他东耶居民一样比较友好。不过, 对于以色列来讲, 这个村子似乎比较桀骜不驯。或许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 他们和以色列军警经常发生冲突, 有时还会和上文提到的一样被军警围困, 甚至造成村民伤亡。当然, 这种冲突由来已久。当以色列在 1967 年战争后建设法国山定居点的时候, 似乎从这个村子罚没了大概 540 亩土地, 难怪村子的两个入口每天晚上都有闪着警灯的警车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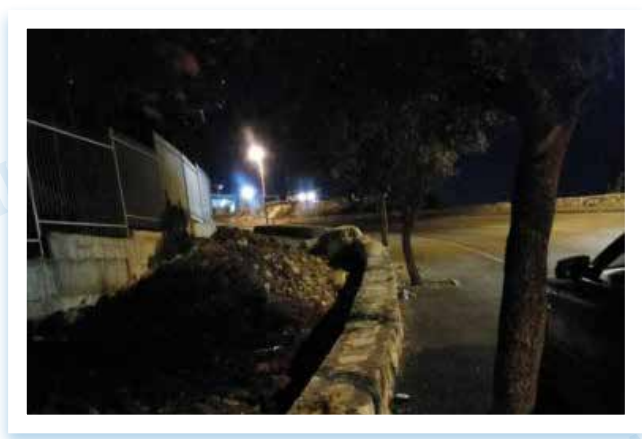


图 19 从村中向外走, 村口闪烁的是以色列警车的警灯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有天晚上，我带着当时不到三岁的儿子去村口遛弯，而那时他已经习惯了那里闪烁的警灯。此时，一位巴勒斯坦妇女也正带着儿子从村外回来，六七岁的小男孩很是淘气，偏要走马路另一侧，于是正好遇到了正往村外走的我们。他好奇地打量着我儿子，问他几岁了，他妈妈在哪儿。这几句其实是他的话里为数不多我能听懂的。这时候，正在马路对面的妈妈以为他在“骚扰”我们，于是很大声地骂了他一句。他随即朝我们做了个鬼脸，向村内跑去。

这就是“危险”的阿拉伯村落？显然，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而言谈不上危险。倒不如说，这里是比大学校园更真实的东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某些工作人员千方百计要“保护”的，与其说是外国学生的人身安全，倒不如说是大家的思想认识和自身形象吧。他们希望我们呆在那个文明、和谐且充满学术氛围的泡泡里，不要去刺破它。因为泡泡外面的世界真实而粗糙，有着不一样的面孔，不一样的颜色，不一样的言语，不一样的立场和对未来不一样的期许。

写在最后

那个学年在耶路撒冷，我不仅推进着博士论文的写作工作，而且还真正地浸入了当地的生活。由于带着两个孩子，与大四时作为本科生到此生活有很大差异，少了些游客心态，整体上更加接地气了。9个月里，还有很多其他人和瞬间也深深留在脑海中，比如，带着我们参观所谓“大卫城”遗址及周边犹太定居点的左翼犹太考古学家；在特朗普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后，在大马士革门口拦下我激动地告诉我

“这里是巴勒斯坦”的大叔；老城里握着我的手说“美国不好，中国才是我们的朋友”的老爷爷。在东耶路撒冷之外，我也在这短暂的几个月里带着孩子走访了西岸的城镇、村庄乃至难民营；还记得我们在拉马拉，当地警察得知我们是中国人后，推开车门下来就一把抱起了我的儿子，显得相当激动。

上述经历不可谓不丰富，回忆不可谓不珍贵。不过，我也深知，作为“田野”观察，我的经历是不合格的。除了开头所说的专业性不够之外，在东耶的这9个月我的看法是不完全客观中立的。作为从小受社会主义教育的中国人，作为看惯了自己祖国在西方受误解的留学生，我们在情感上的确更容易与处于弱势的东耶巴勒斯坦群众产生共鸣。因此，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观察者。不同的人，看到同一种景象，完全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希望我的经历一方面可以启发大家去了解一个群体以及一个地区的历史渊源，另一方面又不会束缚读者们自己的思路和判断。

让我们一起走出教室，走出书斋，去丈量脚下的土地！

*注：作者在耶路撒冷居住时为哈佛大学近东语言与文明系博士生、耶路撒冷奥尔布赖特考古研究所访问学者。

责任编辑：高良敏 文字审校：董 慧

漆黑星空下的游牧民 ——两位巴西年轻人的故事

刘博宇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地区为拉丁美洲

我们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檀森

游牧民（Nomad）原意是一个居无定所、流浪于浩瀚宇宙之中的某部落成员。与 20 世纪末追逐狩猎、采集的游牧民不同：当代游牧民追求自由、真实的人生，偶尔也需要独自面对一些刺骨的寒冷和黑暗。漆黑的夜空是一个辽阔的人生背景，我们生来孤独。尤其当两个或更多游牧民相遇，往往更容易感受到彼此的温暖。

电影《无依之地》的英文“Nomadland”是指游牧民的陆地。它讲述了当代游牧民在美国的纪实往事，费恩（Fern）由于生活所迫，离开家乡开始在房车里生活，她独自一人穿越寒冬冰冷的内华达州，遇见热心的游牧民朋友，也在深夜的停车场被保安驱赶。她对财产、职业生涯和社会阶级感到麻木和痛苦，但同时她具有率真和坦诚的性格，追求自由，能熟练背诵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一个人与一辆房车走遍天涯。这是一个坚强对抗生活、永不放弃的形象。

费恩坎坷而有趣的生活让我不禁想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碰到的两位年轻人。他们面对命运表现出与费恩（Fern）一样的倔强，使他们成为人生这场挑战中最独特的当代游牧民。



图1 星光之城：贫民窟的夜晚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一、漂泊在大城市的“游牧生活”

“我希望自己从未出生。”小J第一次这样对我说时，我瞪大了眼睛。小J的家乡来自巴西东北部某个不知名的小村庄，从里约出发需要坐超过20个小时的大巴、转三次车才能抵达。巴西没有铁路，国内交通主要依靠飞机和大巴，飞机的价格比较高，所以小J回家只能选择大巴。大巴分为多种，最舒适的可以完全躺平，当然价格也是最贵，次一点的是半躺的座位。小J每次坐车，都会买最普通、便宜的传统座位，每次回家都坐得腰酸背疼，不过他还是很高兴。小J家里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哥哥，他上大学开始就在里约生活。

“我的爸爸是个自私的人。”小J说道。

“为什么呢？”我问。

“他只想着他自己，从来不考虑家里，每个月只给一点吃饭的钱给我妈，然后把钱都花在喝啤酒上。我们家里很穷，我上大学来到里约，家里只出了路费和第一个月的生活费，然后就供不起了。里约的物价很高，我只能缩衣节食地生活。另外，我还找了两份临时的工作，补贴生活的开销。我几次想开口问我爸要点生活费，他都装聋作哑。我是家里最优秀的孩子，他不给我钱，更不会给我妹妹或哥哥钱，一切都需要我们自己。”

听到小J的描述，我不禁想到巴西社会中的传统男人形象。巴西是一个男权社会：男性在生活中掌握绝对的话语权。他们不做任何家务，因为那会有损他们“男性的威严”和“男子气”；巴西的女性处于绝对的弱势，不仅要面临抚养孩子的任务，还需承担生活的所有负担。由于花心，很多孩子出生后，只知道母亲，根本没见过父亲，甚至连父亲的名字都不知道，所以在巴西办理很多表格、文件时只需填写母亲的名字，父亲的名字不是必填项目，可以留白。

“我是我们小村庄鲜有的来里约读书的孩子，这一路太不容易了。”里约和圣保罗是巴西最大的两个城市，物价也是最高的，小J靠着自己的力量在里约落脚并顽强地生活下来，这中间的困难可想而知。

小J说：“我几乎不去酒吧，因为那里的啤酒很贵，我会去很远的Mundial超市买东西，因为那里的肉和蔬菜远远比南区的超市便宜。”里约南区是相对富裕的区域，这边的物价很高，Mundial据说是巴西最便宜的超市，那里不接受

信用卡，只能用储蓄卡或现金付款，我去过几次，商品价格真的比南区便宜很多，且日用品的价格也更低。

和美国梦相对应，很多巴西的年轻人也有巴西梦：他们从内陆的村庄、小城市来里约、圣保罗或巴西利亚这样的大城市，并渴望在这里站稳脚跟。和世界上所有大城市一样，巴西大城市也面临着高物价、高房价，以及疫情背景下的工作机会少和失业率高等问题，这些都困扰着巴西年轻人，他们在大城市无依无靠，想要留下来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中国的年轻人向往在北上广深安家落户，巴西也有类似的人群和梦想。



图2 里约贫民窟的生活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小J是就读于物理系的学生。他对学术有着极高的热情，从大学开始就一直潜心研究物理，现在已经是在读的博士候选人了。

“里约的生活很贵，但也很精彩，和物理一样精彩。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研究物理的大学教授，经常出去开会，

到哪里都有人接待我，尊重我。”小J说道。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在满足了温饱这些基本的需求后，人们就会转而寻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毫无疑问，小J离他的梦想已经很近了。

“在巴西做学术这条路你觉得难嘛？”我问道。

“难，非常难，巴西公校的教职很有限，私校虽然工资很高，但是不稳定，并不是永久的合同，所以这也会带来风险。另外，物理这门学科很难学，需要极大的热情与付出，才能有一点收获，文章也很难发。其实，我读上来这一路非常地不容易，希望能够尽快毕业并找到工作。”

“你以后想留在里约工作吗？”我问道。

“我非常喜欢里约，但留在里约生活不容易，且巴西也有很多治安问题。如果有机会能找到法国的教职，我希望去法国工作，并留在那里生活。”小J想去的法国是很多巴西人心中的梦想之地，由于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巴西很多城市都是按照欧洲风格建设的。很多巴西人由于通婚也同时持有欧洲国家的护照，他们更能理解、认同欧洲的价值观。但是对于大多数巴西人来说，欧洲梦实现的难度很高，很多人向往欧洲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却从没有踏上欧洲的土地。

小J正在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学术热情努力实现跨越阶级的巴西梦。这是一个原生家庭的不幸，他从内陆的小村庄游牧到里约，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艰难，却没有失去对生活的追求和执着。

二、特殊人群的“游牧生活”

“他最终还是离开了我，这太让人难过了。”W说。

W是我的朋友，他是同性恋（gay）。巴西是对性取向最开放的国家之一，所以W生活的大环境还算不错。

“做一个gay，太难了。”W说道。

“为什么呢？”我问道。

“主要是家人不理解，我向家人宣布出柜那天，我妈妈哭了整晚。我爸估计之前猜到了，这方面他没有问过我。”

“你妈妈后来有想明白嘛？”

“同性恋这方面家长的思维还是比较保守，这让我十分痛苦。”

“你妈妈这么伤心，主要是担心什么呀？”我问道。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担心我生不了孩子吧，或者是面对亲戚难为情之类的，具体这方面没和她细谈过。”

“你有兄弟姐妹嘛？”我问道。

“我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姐姐，他们都已经成家、有孩子了。”W回答。

“那你哥哥姐姐有孩子挺好的呀，你的压力可以小一些。”我说。

“是的，本该如此，可是我妈说，那不是你的孩子，你

也要有属于你的。这方面真的挺难的，我也很痛苦。家庭这方面只能暂时不去考虑，如果有长久的伴侣，看看以后能不能考虑代孕或者领养一个孩子吧。” W 说道。

“如果代孕的话，用谁的精子呢？” 我不禁有点好奇。

“都可以呀，用我的或者我爱人的都行。是我们两个的孩子就可以。同性恋这方面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很难收获一段长久稳定的关系。” W 说道。

“对了，你和 K 真的分手了嘛？也许还有挽回的可能呢。” K 是 W 的男朋友，一个地道的巴西人，家在里约郊区的小城市，在里约上班。W 一直很喜欢 K，说他身上有种独特的气质，让他情不自禁地想去追求 K，后来他们终于在一起了，W 就向家里表明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并为了 K 搬出来外面租房子住。

“我们没有机会了，K 有段时间找不到工作，他又是很要面子的人，经常无故和我发火、生气，这些我都忍着，因为我是很喜欢他的。但是后来他找到了圣保罗的工作，就搬走去圣保罗了，我却暂时去不了圣保罗，我的工作是在里约，我走不了。那段时间，我疯狂地找圣保罗的工作，希望能去陪他，可惜后来遭遇了疫情，我们慢慢就淡了，也许他没有那么喜欢我吧，这太让人难过了。” W 说道。

“没事的，你将来很快一定能遇到更合适的人。” 我尝试安慰他。

“gay 在很多国家都不被认可，巴西已经算很好了，但除了难获得健康、稳定的关系，还面临着很多风险。”

“具体有哪些风险呢？”我问道。

“主要是艾滋病和一些疾病吧，每次都需要做充分的保护措施，否则总是有点后怕，我有去查医院艾滋病的经历，还好没中招，像异性恋这种风险就小很多，你说上天对同性恋是多么地不公平啊？”W说道。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确，同性恋人群在中东某些国家是绝对被禁止的，甚至在很多年前被当作一种疾病进行强制治疗。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家庭尝试将同行恋的孩子送去接受“掰直”治疗，希望他们能重新喜欢上异性。

“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号称能治疗同性恋的机构，你对这方面怎么看？有可能成功嘛？”我问道。

“这是绝对没可能的，尽管这条路很难，但我是不会喜欢上异性的。这些诊所大部分都是骗人的。”W回答道。

“你还打算一个人住在外边嘛？也许回家住一段时间也挺好的。”

“是的，肯定的，我的家人都在这边，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去，现在和K分手了，也没有一个人住的必要，我打算过段时间搬回去家里和妈妈住一起，这样也可以节省一些生活开销。”W说道。

W是巴西同性恋人群的缩影，这个群体面临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困境与挣扎，常常在不被人发现的角落里独自面对生活的挑战，他们有时还会缺乏原生家庭的关爱和理解。巴西

的同性恋也是最幸福的，因为大环境整体比较宽松，但是在隐秘的角落里，仍然有很多和 W 一样的人存在。



图3 海滩小贩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三、小结

尽管大多数人无法像《无依之地》中的费恩一样，成为一个真正流浪的游牧民——以房车为家、追求最纯粹的自由。但生活中很多人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游牧民”。就像这两位巴西年轻人一样，面对不同的先天境遇，他们表现出和费恩一样的勇气和对生活的热爱，他们经历更加精彩。我们无法选择原生家庭、性取向和生活中无法改变的其他不可承受之轻，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保持面对世界的勇气，同时保持对周围人群痛苦缘由的敏感与同理心。

不论是原生家庭的不幸，还是不被主流价值观认可的焦虑，都有精神上的共性。这种共性与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遇

到的挫折、痛苦、迷茫等糟糕感受大体相同，就像在黑夜笼罩的大海里航行，生活总让我们品尝到酸甜苦辣等不同的味道。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浩瀚宇宙的游牧民？我们生来孤独。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道：“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在广阔无垠的宇宙进程中，个人的存在仅仅是片刻、瞬间，当遇到看似过不去的坎或困难，想到整个人类的渺小，情景似乎又远没那么绝望。漆黑的夜空下，我们在大海上相遇，不妨成为彼此的灯塔。就像莎翁曾经说过的那样：

“只要人类能够延续，只要人类还有眼睛，贫穷、死亡、孤独或苦难，都不是放弃热爱生活的理由，心灵从来都拥抱无依之地。”

责任编辑：郑楠 文字审校：董慧

疫情面前，马拉维人为何拒绝佩戴口罩

李加方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地区为东非

马拉维位于非洲东南部，是一个被坦桑尼亚、赞比亚和莫桑比克包夹的内陆国，其国土面积为 11.8 万平方公里，2018 年总人口为 1756 万，其中农业人口占 84%。马拉维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其 2016、2017 和 2018 年的人均 GDP 仅为 315、356 和 389 美元，其中 2018 年的人均 GDP 更是位列全球 217 个国家和地区中的倒数第三。

为了收集博士论文所需的一手资料，我于 2020 年 1 月初前往马拉维开展有关媒体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由于新冠疫情的暴发，时至今日（2021 年 3 月中旬），我依然滞留在马拉维。滞留期间，虽然我的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但也因祸得福，得以借此机会深入了解了马拉维当地的疫情情况及其采取的防疫措施等。

2020 年 2 月，新冠疫情刚刚暴发之时，马拉维人及当地华人华侨对疫情的态度似乎都比较乐观，他们认为新冠疫情会跟非典疫情一样，随着天气转暖而逐步消失。然而，到了 3 月份，新冠疫情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2020 年 4 月 2 日，马拉维首次发现新冠确诊

病例，当日共确诊3例。4月7日，马拉维又公布了首例新冠死亡病例。马拉维卫生部官网公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截止2021年3月14日，马拉维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32789例，累计死亡1082例。虽然官方公布的新冠确诊病例并不算多，但这主要是检测能力受限等原因造成的，其实际疫情要比官方公布的情况严重许多。以我熟悉的马拉维最好的中学之一——马拉维卡穆祖中学（Kamuzu Academy）为例，2021年1月22日全校师生进行了新冠病毒筛查，683名师生中确诊病例多达79例，占全校师生总人数的11%。另一方面，疫情以来卡穆祖中学教工共发布父母、叔伯、姐弟、兄妹等近亲去世的讣告30余例，比平时多出数倍。人们普遍猜测这些教工亲属去世的原因多为新冠肺炎，但据我了解，这些死亡病例均未进入政府的统计名单，因为家属并未主动向政府报告，政府也并未前来了解相关情况。

事实上，与卡穆祖中学的情况一样，只要在马拉维政府组织力量进行大规模筛查的地方，新冠确诊病例就会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疫情的真实情况远比已公布的情况严峻许多。马拉维政府对新冠疫情的严重程度也心中有数，因此多次宣布实施相应的管控措施以应对疫情。2020年4月14日晚，时任总统穆塔里卡（Mutharika）宣布马拉维将从2020年4月18日至5月9日实行全国封禁管控，具体措施包括全国所有地区进入封禁状态、任何人非必要不得离开住所、所有非必要业务或服务将依规中止、出入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等措施，马拉维各级各类学校也从2020年4月中旬一直停课至2020年9月初。

随着第二波疫情的暴发，2021年1月12日，马拉维新

任总统查克维拉 (Chakwera) 宣布马拉维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新冠疫情的防控举措, 特别是针对公共场所未佩戴口罩者的罚款已达到了 10000 克瓦查 (Kwacha, 约合 85 元人民币), 这几乎是马拉维普通村民半个月收入。然而, 不管疫情如何严重, 也不管马拉维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如何严厉, 这些措施也仅在首都利隆圭 (Lilongwe) 及布兰太尔 (Blantyre)、姆祖祖 (Muzuzu) 等管控比较规范和严格的个别城市得到一定落实。在马拉维的广大农村地区及中小城镇, 民众对政府的防疫措施基本置若罔闻, 就连最基本的防疫措施之一——佩戴口罩都难以贯彻执行。如图 1 所示, 2020 年 6 月 23 日总统大选当天, 前来投票的大部分选民并未佩戴口罩。再如图 2 所示, 我多次前往考察的马拉维中部卡松谷县 (Kasungu district) 目屯塔玛集市 (Mthuntama trading center) 里, 熙熙攘攘的赶集人均未佩戴口罩, 集市上的商贩虽然出于集市规定佩戴了口罩, 但最多只把嘴巴套上, 鼻子是绝对要露在外面透气的。



图 1 位于乔洛县 (Tyolo district) 的马拉维总统大选的一处投票站, 前来投票的选民均未佩戴口罩
图片来源: 新华社新闻报道



图 2 2021 年 2 月 10 日，于马拉维集市，熙熙攘攘的赶集人均未佩戴口罩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面对如此严重的疫情，尽管政府三令五申，但大部分马拉维人为何就是拒绝佩戴口罩以配合疫情防控？为何政府的防控要求与民众的实际做法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分歧？经过调查分析，我发现马拉维人之所以拒绝佩戴口罩，主要存在以下七个原因：

第一，有关新冠疫情的各种谣言混淆了马拉维民众对该疫情的认知，也进一步影响了他们的辨识能力。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各种谣言以及虚假信息也开始在全球流传开来，进而影响了马拉维人对新冠疫情的防控态度。例如，有的马拉维人认为新冠疫情是人为制造的谎言，事实上并没有新冠疫情这回事，他们并不认为身边人生病或死亡是因为感染了新冠这种新型病毒，而是其它常见疾病造成的；有的人受到了一些别有用心者的虚假视频的教唆，认为市面上的口罩都是发达国家废旧口罩的回收利用，而这些口罩正是传播新冠病毒的根源；也有的人则认为新冠病毒只传染老年

人，年轻人并不会被感染，甚至有人相信新冠病毒只影响那些怕死的富人，无畏的穷人则不会被感染。诸如此类的言论混淆了民众对新冠疫情的认知，也成为了他们拒绝佩戴口罩的原因之一。

第二，国际社会的负面典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拉维人对新冠疫情的态度。

面对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并非所有国家都采取了积极的防疫措施来遏制病毒的传播，例如，美国、英国、坦桑尼亚等国应对疫情的态度就始终比较消极。美国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然而前总统特朗普不仅不以身作则，呼吁民众通过佩戴口罩来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相反，他还一直拒绝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并且多次向公众重申自己拒绝佩戴口罩的“正当理由”。在英国也一直存在着一种声音，即通过“群体免疫”战胜疫情，因此，经常出现不戴口罩的民众辱骂佩戴口罩的民众的现象，控诉佩戴口罩者引起不必要的恐慌。而坦桑尼亚作为马拉维的邻国，早就于2020年4月29日停止更新本国的新冠确诊病例（坦桑尼亚新冠确诊病例就此停留在509例），刚刚身故的总统马古富力更是于2020年6月5日宣布坦桑尼亚已经成功战胜了新冠病毒，呼吁民众回归正常的工作与生活。毫无疑问，美国、英国、坦桑尼亚等国的“消极抗疫”给其他国家带来了一些负面暗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拉维人对新冠疫情的态度，同时也给了他们不佩戴口罩的理由。

第三，马拉维政府管理水平低且执法力量薄弱，无法有效执行新冠防控措施。

马拉维政府多次要求民众佩戴口罩以应对新冠疫情，但民众并不响应政府的号召，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管理水平低，同时执法力量比较薄弱。对于马拉维政府而言，警方是监督和落实疫情防控举措的主要执法力量，然而马拉维的警力本就有限，难以抽调额外的警力来应对疫情。例如，录像厅是马拉维人最主要的娱乐场所，属于人群聚集区域，但据我了解，在疫情暴发以来的一整年时间里，警察只到目屯塔玛集市的四家录像厅来检查过两次，每次也只是简单视察，做做样子，因此聚集在录像厅看电影的观众照样不戴口罩（如图3所示）。前文提到，84%的马拉维人属于农业人口，因此村庄理应成为疫情防控的重要一环，而我走访目屯塔玛集市周边的八个村落后发现，这些村落的酋长均未收到上级政府关于新冠疫情防控的任何指示或要求，因此他们也并未在村里实施过任何防控措施。被问及原因时，酋长们的回答是，因为上级知道即使他们要求了也没有用，这些政令肯定无法得到贯彻实施。酋长们同时还提到，警方倒是有执法权，但他们只到村里来转悠过一次，对村民根本没有威慑力。



图3 2020年10月15日，于目屯塔玛集市的录像厅内，观影人员无一佩戴口罩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第四，与艾滋病等疾病相比，新冠肺炎似乎不值一提。

非洲大陆是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战乱、贫困及各种疾病一直折磨着这里的人民。以马拉维为例，艾滋病感染人数约占其总人口的 15%，因艾滋病感染而死亡的病例屡见不鲜。除此之外，轻如疟疾、重如肺结核等各种疾病也较为常见，可以说，马拉维人从小就见惯了病痛与死亡。相对于艾滋病等致死率较高的恶性疾病而言，新冠肺炎这种致死率较低且能够被治愈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马拉维人来说似乎不值一提。当地的新冠确诊病人有一句口头禅：“我没有病，我只是新冠检测呈阳性罢了”（I am not sick. I am just positive），因此他们并不惧怕新冠肺炎。前文提到，2021 年 1 月 22 日卡穆祖中学确诊新冠肺炎 79 例，占全校师生总人数的 11%。然而，面对高达 11% 的新冠确诊病例，卡穆祖中学却呈现出“三不怕”的特点：一是家长不怕，自家孩子确诊新冠肺炎后，只有极个别家长将孩子接回去，其余绝大部分家长都把孩子留在学校接受治疗，而所谓的治疗，并没有专门的药物，最多服用一些维生素以增强抵抗力。二是学校不怕，面对高达 11% 的新冠确诊病例，学校并未关闭或停摆，教学活动也基本未受影响，唯一的变化是把感染的学生隔离在宿舍区进行授课，未感染的学生则一切如常。三是学生不怕，虽然确诊病例被隔离在学校专门腾出来的宿舍区，然而这种隔离并不彻底，放学后隔离区的学生与普通学生基本可以自由来往，普通学生也不惧怕确诊学生，他们像平时一样在一起打闹，仿佛没有新冠肺炎这回事。新冠肺炎对卡穆祖中学的师生及家长而言，就是这样不值一提。

第五，口罩价格昂贵，令马拉维人难以承担。

由于马拉维无力自行生产口罩，除了自制的布口罩以外，其它口罩均需要进口，导致口罩价格极其昂贵，比如，N95口罩约为15元一个，一次性医用口罩约为5元一个，一次性非医用口罩约为2.5元一个。前文提到，马拉维2018年的人均GDP仅为389美元，具体到农村而言，普通村民一个月的纯收入更是只有约200元人民币。这样的月收入，糊口都勉为其难，如果疾病等意外发生的话，生活更是难以为继。虽然马拉维有自制的、可以重复使用的、售价仅为约2.5元人民币每个的布口罩，但马拉维家庭有一个特点，即人口众多但劳力有限，以我在马拉维临时雇用的中年男性为例，他家共有9口人，父母、夫妻及5个孩子。在这9口人中，他是家里的主要劳力，其他人要么年纪大了，要么还在上学，至多只能偶尔打点零工帮衬。如果他要给家里每个人都购买一个布口罩的话，对他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他只买了3个布口罩，家里谁需要出入政府部门、医疗机构、学校等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的话，会轮流使用。

第六，马拉维人口结构比较年轻，自认为感染概率低且能痊愈。

与其他大洲相比，非洲人口的年龄结构非常年轻，马拉维亦如此。2018年的人口普查显示，马拉维人的平均年龄仅为17岁，65岁及以上人口只占总人口的4%。由此可见，马拉维是一个人口结构非常年轻化的国家。众所周知的是，新冠病毒主要影响的是老年人群体，患者年龄越大，受到的威胁就越严重，死亡率也越高，所以，平均年龄仅为17岁的马拉维人并不重视防护，他们认为自己年轻，一来不容易感染新冠病毒，二来即使感染了也能很快痊愈。例如，目屯

塔玛集市旁边的 French 村曾出现多例新冠确诊病例，一方面，这些病人并未出现明显的症状，另一方面，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这些确诊病人并未就医，也未服用专门的新冠药物，而只是居家服用了一些用以提高人体免疫力的维他命。居家隔离结束后，这些病人基本都痊愈了。这些病例使年轻的马拉维人相信，新冠肺炎其实跟普通感冒差不多，因此无需小心翼翼地佩戴口罩来防护。

第七，马拉维人宗教信仰虔诚，比起上帝的惩罚，他们更愿意承受新冠肺炎的风险。

据统计，97.9%的马拉维人拥有宗教信仰，其中13.8%为穆斯林，其余为基督教徒。教堂作为马拉维一种重要的公共场所，一直强调遵守政府疫情防控措施的重要性，要求教徒进教堂必须佩戴口罩。然而，在部分教徒看来，戴口罩进教堂是对上帝的不敬，因为这说明这些教徒不信任上帝，在他们看来，这些佩戴口罩进教堂的教徒总有一天会受到上帝的惩罚。因此，对这部分教徒而言，在上帝的惩罚与致死率极低且能够治愈的新冠肺炎之间，他们选择承受新冠肺炎。据了解，目屯塔玛集市周边分布着近二十家教堂，每家教堂都有许多做礼拜时拒绝佩戴口罩的教众，教堂对此无能为力，更为严重的是，有部分教徒自从教堂提出佩戴口罩的要求后再也没有进过教堂。这样的宗教观念或多或少也影响了部分马拉维人对于佩戴口罩的态度。

除了以上七个原因外，马拉维人之所以不愿意佩戴口罩，还有一个全人类一致的原因，那就是佩戴口罩会引发一些身体上的不适，例如呼吸不畅、有异味、长时间佩戴会导致耳

朵疼等，自认为新冠肺炎不是啥大事的马拉维人不愿意承受这些身体上的不适，因此拒绝佩戴口罩。最后，人都有从众心理，大部分人都不佩戴口罩的话，少部分佩戴口罩的人反而会成为被取笑的对象，因此久而久之佩戴口罩的马拉维人就越来越少。

以上就是我对疫情面前马拉维人拒绝佩戴口罩的原因所做的分析。虽然本文讨论的是马拉维的相关情况，事实上这些情况对整个非洲大陆而言也有一定启发，因为佩戴口罩的非洲人毕竟是少数。那么，虽然绝大部分非洲人没有佩戴口罩防控疫情，但为何新冠疫情在非洲大陆没有像美国或欧洲那样大规模暴发，或者至少在官方数据上比欧美少很多？关于这一点，我认为主要与非洲的以下几个特点有关：一是非洲检测能力有限，官方公布的确诊病例比实际病例少很多；二是人口低龄化，以年轻人为主，患病风险较低；三是非洲交通不便，人口流动少，病毒传播风险和速度受限。正因为这几点，虽然大部分非洲人拒绝佩戴口罩防控疫情，但疫情并未像某些专家预测的那样在非洲大陆“大暴发”。

责任编辑：李 音 文字审校：许 帅

基辅田野印象：俄罗斯和西方之间

周游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乌克兰

如果说俄罗斯位于东西方之间，那么乌克兰无疑就是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从2019年到2020年，一年田野更加深了我的这种印象。受困于疫情，我一直没能离开基辅，没来得及到东部、南部和西部多走走，体验乌克兰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好在即便在基辅，我也感受到了俄罗斯和西方的共同影响。这里说的西方主要是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欧洲。

基辅的区位特点就已经很有意味。这座城市位于乌克兰中部，地处黑土区的大平原和茂密的森林带，间杂着小丘陵，第聂伯河浩浩荡荡穿城而过。受自然环境滋养，东欧音乐有很多这样风格气质，如“伏尔加河长流水”、“伏尔塔瓦河”之类。基辅作为罗斯城市之母，历史上弗拉基米尔大公在这条大河上将古罗斯人洗礼为基督徒。然而源头位于西方的宗教文化在俄罗斯影响下与西方渐行渐远，形成独特的东正教文化。一种比较简化的观点认为，由于第聂伯河以东和以西分别受俄罗斯和西方牵引，东部亲俄，西部亲西方，政治和文化差异巨大。而基辅就不偏不倚，端端正正，坐落在河上，仿佛不可避免要融合这两种影响。基辅主要居住区分布在左岸，而政府机关、商业区多在右岸，人们每天乘地铁过河而过来回通勤，使整个城市人口钟摆式移动。

乌克兰位于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过渡地带，因此成为一个政治和文化面貌多元的国家。基辅不能代表整个乌克兰，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多元性。自 1654 年哥萨克首领赫梅利尼茨基与沙皇签署宣誓臣服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俄罗斯 3 个世纪有余的统治在基辅沉淀为一种俄式文化的底色。而本文探讨的基辅所呈现出的欧洲性，更多源自于独立以来，尤其是 2014 年乌克兰危机后脱俄入欧的政策取向。如今，俄式文化和入欧政策两者的影响并存于同一城市空间之中。



图 1 俯瞰第聂伯河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一、俄式文化底色

第一次独自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心情忐忑，我在狭窄的乌航飞机上一路都没怎么睡好。此前我去过俄罗斯，同乌克兰素未谋面。落地后，从机场到市中心的一路，车窗外一闪而过的大片针叶和阔叶林地、广告牌上的西里尔字母、东正教教堂、赫利夏蒂克街上的斯大林式高层，都让我觉得莫名熟悉，一下子就放松下来。

乌克兰朋友可能不乐意我这么说，但基辅和莫斯科实在是太多相似之处。在右岸市中心，苏联未来主义风格和沙俄时期的现代派建筑错落出现，令人产生时空错乱感；左岸的许多工厂和居民区几乎保留了苏联的原始风貌。苏联时建成的具有防空功能的地铁和莫斯科地铁一样深邃，地铁站里的电梯一眼望不到头，老车厢跑起来也有和莫斯科地铁同样的呼啸声。美术馆里挂着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也能看到的巡回展览画派和先锋派的画作，两国实在共享太多文化名人了。中小学的开学日延续了苏联时期的庆祝方式，小孩子穿着制服手捧鲜花，女孩儿头戴白花，打响第一声上课铃。而食物最容易保留记忆，超市里可以买到我在俄罗斯时就爱吃的奶渣和黑面包。不管米其林怎样罪该万死把红菜汤错当俄餐，乌克兰菜和俄餐实在也没有明显区别。当地人用“感性”（емоційний）、“顽强”（терплячий）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乌克兰的民族性格，和我大学时俄语课本中讲俄罗斯性格并无二致。我飞快地适应了在基辅的生活，某种程度上简直像是故地重游。



图2 乌克兰小学的开学日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出国前一直在追踪乌克兰的动态，我知道由于前总统波罗申科出台语言法巩固乌克兰语的国语地位，推广使用乌语，大街上是不可能看到俄文广告牌的。我以为按照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程度，在大街上讲俄语可能会被打。所以一开始总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不能说漏嘴。没想到基辅街头大多数时候听到的是俄语，俄语仍然是基辅人常用的日常交流语言。我的同事用乌克兰文撰写和发表文章，在学术会议上讲乌克兰语，但多数时候用俄语聊天。既然是政治学田野，独立广场和总统府门口要是有什么示威游行是一定要去看热闹的。支持欧洲大西洋主义政策的人们打着乌克兰文的牌子，用乌语喊口号，然后停下来可能就用俄文闲聊。尤其在非公共场合，绝大多数人还是两种语言并用。只有个别朋友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坚持只使用乌语。我在访谈中不止一次问过当地人语言问题，发现对于他们而言，这并不构成困惑，使用俄语和爱国主义并不矛盾。独立后，在政府政策的影响下，学校乌语教育逐步普及，乌克兰多数人口成为双语使用者。但由于历史文化原因，很多人在家庭和日常交往中都惯常使用俄语，习惯难以一下子改变。不过这不影响对于乌克兰语作为国语的认同。因此，如果单从使用俄语的频率和范围来判断乌克兰的社会民意和民族建构情况是不准确的，也只有田野能够提供最大限度理解他人的机会。

一般认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同属东斯拉夫族，因此理应文化接近。但自12世纪基辅罗斯陷入封建割据以来，基辅和莫斯科两个政治中心已走上了各自的发展道路，直到17世纪基辅和第聂伯河右岸地区被纳入沙俄的势力范围。本文认为，基辅体现出的俄罗斯性并非来自某种本质化的族裔和

血缘属性，而是更近的历史积淀的结果。而新的历史还在产生，继续改写城市的面貌和人们的记忆。

如今乌克兰人越来越不愿意承认两个民族同根同源这样的说法，设法要从这种相似性中剥离开，论证乌克兰的独特性和独立性。新的历史叙事体现在教科书、博物馆、纪念碑、节庆和仪式中，既遍布城市空间，又一年一度提醒人们曾经发生的事件。纪念切尔诺贝利事件和 1932-1933 大饥荒塑造的是乌克兰作为历史受害者的角色。宣传没有俄罗斯的基辅罗斯和哥萨克文化可以重新打造乌克兰历史的黄金年代。莫斯科大街更名为纪念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斯捷潘·班德拉大街。剥离俄罗斯历史文化的同时，得到强化的是一种全新的欧洲性。

二、心向欧洲

若说基辅的欧洲性，更像是覆盖在上述俄式文化表面的一层新皮肤。乌克兰追求融入西方的决定性转折发生在 2013-2014 年乌克兰危机期间，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拒绝签署欧盟联系国协定，导致民众走上街头。乌克兰方面称这一事件为尊严革命，寓意人民共同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当年基辅市中心示威运动的痕迹至今清晰可见。在政府支持下，由社会组织参与，在独立广场及周边搭建了一系列纪念设施。独立广场上的展板记录了事件全过程。广场一侧的林荫道专门命名为百人天堂英雄路，这是对示威中百余名牺牲者的敬称。林荫道上摆放牺牲者纪念碑，每逢纪念日人们会前来献上鲜花与蜡烛。一路上还可见主题展览馆和为支持示威建起

的一个希腊礼天主教小教堂。按照当年游行的路线，从广场到格鲁舍夫斯基大街沿街树立十字架，上面写着具有象征意味的耶稣受难的典故。在街头，象征乌克兰民族主义的黑红旗插在牺牲者纪念碑上。



图3 百人天堂英雄路上的希腊礼天主教堂和十字架，十字架上的文字是“我们能靠祈祷和斋戒停止战争”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出逃和下台后，其曾经居住的官邸麦日希里亚（Межигір'я）已成为国家公园。这座占地面积巨大的官邸位于基辅州的维什赫罗德区（Вишгород），独立广场上还有旅行社打起广告招揽游客。带我去游览的乌克兰同事戏称这里是乌克兰的“颐和园”。如今这里已经被划分为多个游览区：除了结合传统狩猎木屋和古典主义风格的豪华宅邸，曾经专门为前总统养殖家畜、珍禽异兽和猎物的畜栏被改造为动物园，种植花卉和蔬菜的温室变成植物园。此外

还有大片林地、饲养着天鹅的高尔夫球场和私人东正教教堂等等。同事讲起关于这座“宫殿”流传的轶事——亚努科维奇腐败的过去。比如他如何疯狂地热爱打猎，经常坐船经山下名为“基辅海”的水库“出海狩猎”，以及如何向媒体和公众隐瞒这座豪华宅邸的存在。

如今，基辅市中心树立起巨大的欧盟标志，欧盟旗帜和国旗一起飘扬在政府各部门口。2020年欧洲疫情爆发之初，乌克兰还派医疗队援助意大利，把意大利国旗用灯光投在议会大楼上表达支持。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大量乌克兰人前往欧洲务工，有条件的人出国接受完高等教育就留在当地。当然也有人前往俄罗斯，尤其在东部地区。身边的同事朋友说，有的人在欧洲打工游历多年，有的曾经严肃考虑过举家迁往欧洲。我的房东一家更加幸运，已经移民瑞士。而从欧洲返乡的打工者也成为乌克兰疫情爆发的重要源头。

对于乌克兰而言，欧洲意味着什么？为什么2013-2014年人们会走上街头？每次向基辅人发问，得到的都是差不多的答复。“因为乌克兰人想要加入欧盟和北约，不想和俄罗斯结盟。”“因为加入欧洲意味着经济繁荣和政府廉洁，而亲近俄罗斯则相反。”融入欧洲是当前乌克兰社会的主流观点，是绝大多数人的期待。人们似乎倾向于在结盟和政治、经济改革成效之间建立简单的因果。欧洲本身就是美好未来的代名词。除了政治领域，在乌克兰媒体和商业领域也是个高频词。欧洲的商品、学校、收入水平、制度设计，一切都应当向它们看齐。倘若西欧的核心国家目标太遥远，那么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至少是可参考的对象。他们是怎么反腐败，怎么实现经济腾飞，怎样加入欧盟的，都是学习的榜样。

基辅的欧洲性还未能积淀形成一种真正的文化特征。和西欧相比，乌克兰更多是东正教的，偏保守的，在反腐败、司法改革和市场化等诸多领域也未达到欧盟的要求。欧洲性主要表现为一种当代政治观念和朝向未来的诉求。这种新的观念和诉求一方面与旧有的俄式文化并存，一方面又驱逐俄罗斯性，使其仅仅固定在景观和工具性的层面，而不具有任何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比如人们居住在赫鲁晓夫式的居民楼里，讲着俄语，但并不认为苏联值得怀念。

三、结语

乌克兰国家独立和寻求欧洲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构的。当今乌克兰的历史教科书强调乌克兰民族历史、文化起源与欧洲文明的联系，而与俄罗斯的联系被最小化。2014年之后，乌克兰脱俄入欧的取向进一步得到强化，如今的乌克兰社会具有后尊严革命时代的特征。然而欧洲性和俄罗斯性在乌克兰的拉扯还未完全结束，比如亲俄政党的影响力依旧存在，甚至悄然上升。尽管我在田野中甚至未曾见过立场明确的亲俄人士，或许2014年之后他们开始选择沉默。总之，乌克兰心之所向在西方，在其转向过程中，俄罗斯性则仿佛一副沉重的肉身。

责任编辑：高良敏 文字审校：许 帅

西孟加拉问路故事

王令齐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缅甸

一、Adda：初入田野

“打扰一下，请问 Burma Nagar（缅甸村）怎么走？”

“什么？跋摩村？你找哪个跋摩？”这里用的“缅甸”一词（Burma）听起来与一个姓氏——跋摩（Varma）接近，加上本地不太区分辅音 b 与 v，很容易被听者混淆。

“我们这没有从比哈尔来的。”本地的“跋摩”确有不少来自比哈尔邦。

我赶紧澄清：“不是 Varma，是 Burma，现在叫 Myanmar，Ma-yan-ma-r。”

“哦哦，你沿大路直走，大概 10 分钟就能到。”

“您说的是 OC 办公室后面吗，我刚去过了，那里的 babu 说没有。”虽然“babu”一词被许多知识分子与殖民者的“教化”话语联系起来而受警惕与批判，但在孟加拉街头，若想与看起来体面的陌生人开启对话，这仍然是一个好用的称谓。

“就在那里啊，搭 auto（突突车）过去，很快就到了。”

在南亚街头问路，“10分钟”是回答中一个常见的虚指。地图告诉我 OC 办公室大约离此地 2.4 公里，而刚才的经历告诉我，这趟行程意味着十几分钟混杂着尘土和汗味的拥挤体验。虽然只要 7 卢比，手里攥着刚找的零钱，我实在不想再体验一把令人窒息的颠簸。

于是我打开提前存好的一篇报道，把手机递给看起来最年长的一位 babu：“您看，文章说这个 Burma Nagar 在 Ag 火车站附近，也就是这边上。”

这位 babu 接过手机，把眼镜架上了鼻梁，刚才正和他聊天的几位也凑了过来，五对目光一齐聚焦手机屏幕。“啊，那是在这个附近。”他们显然也不太清楚 Burma Nagar 的方位，我赶紧补了一句：“下面有照片，您看照片”。但照片似乎没能帮上什么忙，几位你一言我一语议论了起来，一如还没有被我打扰时的那番景象。

这是一幅南亚、东南亚的常见景象：三五伙伴（一般为男性）聚集在杂货铺、甜点铺或是茶铺闲聊，一聊就是数小时乃至一整天。孟加拉人将这种长时间的闲聊称作“adda”（在南亚的许多语言中，该词仅指聚集的场所，但当代孟加拉语中两义兼备），经由知识分子近百年的反复讨论与书写，这个词与孟加拉人及其生活方式，还有加尔各答这座城市的传统彼此联结，拥有了丰富的意涵。我在《将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一书中读到过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对这些讨论、书写的梳理与精彩反思；但在邂逅 adda 的当下，情境并不容许我去想那许多。我不得不抛开知识，专心感受：这是一种与陌生人轻松、友善的

互动。或许得益于 addadhari (adda 的主要参与者) 间固有的友谊, 善意是不难体会到的; 而长时间的驻留与陪伴则带来了耐心。在轻松的氛围中, 外来者的偶尔闯入并不会令人绷起神经; 对 addadhari 而言, 一次闯入或许只是长时间闲聊之外的一个新话题。如果闯入者是一个笨拙的、陷入困境的外国人, 行人和商贩多少会展露几分慌张; 但 Addadhari 们或向同伴展现能力, 或和同伴合作寻找解答; 田野工作者的贪心多半能在这样的情境中得到满足。找行人或是商贩问路未必能有如此体验。



图 1 常见的街头 adda

图片来源: qz.com

一番讨论过后, 一位 babu 转过头来对我说: “来, 来”, 随即大步向前走去。“他是专业向导哈哈”, 看起来最年长的那位 babu 挥了挥手: “跟他去吧”。于是我跟着“向导”拐进了一条巷子。

“您是导游吗?” 我问道。

“不是不是，我住在 Burma Nagar 附近，对那边比较熟悉而已。”

怎么突然知道 Burma Nagar 在哪了？我一边暗自疑惑，一边在心里为可能的无功而返作好了准备。要是在国内遇到一个陷入困境的外国人，我大概也会这样“逞逞能”吧。不过 babu 们为我安排“向导”的举动，让我意识到了理解“adda”的另一个维度：“adda”是参与者聚集的“地点”，addadhari 的移动的轨迹汇合于此，也将这一“地点”与社区不同部分联结起来。

同时，我也意识到“adda”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田野起点：一处正在发生“adda”的杂货铺、甜点铺或是茶铺，也是一处可供田野工作者参与短暂讨论的空间。由于这一空间联结着社区的不同部分，借助这种联系，进入田野或许会变得简单一些。在后来的田野调查中，无论是在投石问路还是寻找访谈对象时，addadhari 们都为我提供了诸多便利。没有他们的善意，我的田野调查将无法顺利开展。

二、寻找 N 村：地图以外

当然，要在每日不计其数的“adda”当中找出进入田野的钥匙并非易事，也不是所有 addadhari 都能给你想要的答案。

我曾以为，只要从新闻报道、在线讨论、学术文章中找出缅甸村的地理位置，到当地再问问路人，找到它们应该并非难事。但在抵印之后，等待我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出乎意

料：有的缅甸村因城市建设计划被整体搬迁，可供获取的信息却尚未更新；有的因多地同名，之前的访客混淆两处同名地点，分享了错误资讯；有的则经历了改名，当地年轻人只熟悉其“印度”名字而不了解村庄的来龙去脉，问路时不免也要费一番周章。当目的地周边人口密集且居住形态复杂时，怎样快速找到田野地点便成为了一项挑战。

这天要拜访的 N 村归属 Vm 镇管辖；但直到出发前，我也没能在任何地图上找到它的具体方位。唯一明确的是我需要先挤火车前往 Vm 车站。先前读过的几篇报道告诉我，N 村有一间颇具规模的缅寺；而寺庙在南亚、东南亚的许多地方往往是社区的多重中心，不论是宗教的、商贸的还是社交的。日常的参拜与节日庆典使社区成员时常汇集于此，市集、商铺也因此寺庙周边铺展开来。“那里说不定会有答案”，我心想。但在地图上搜索时，我发现这间缅寺的位置显得有些不同寻常：之前拜访的缅甸村，寺庙多建于村口或村中干道旁，但 N 村的缅寺却如孤岛悬于村外。这更激起了我的好奇，于是一下火车，我就径直向缅寺奔去。

这是缅寺？当突突车停下时，我不禁觉得讶异。在一片荒地中，一道气派的大门兀自耸立，与周遭的荒芜对比鲜明。门上的文字包括缅文、英文与孟加拉文。缅文告诉世人这是一间公益学校，其余二者声称此地是一所扫盲学校（shiksha/literacy mission），但地图告诉我，这是一间佛寺。穿过大门，微缩版的孟式（Mon）佛塔、缅甸风格的僧堂、精心维护的花圃占据了大院的一半，它确是一间佛寺；但同时，现代风格的教学楼、住宅楼和亭子则环绕着水池，矗立在另一半土地上：这也是一所学校。

院子里有不少人正在“adda”，但看起来既不像工作人员，也不像学生。我赶紧加入他们：“你们缅语说得好棒，是在这里学的吗？”原本期待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谁知三位 addadhari 一下子陷入了沉默，彼此交换着疑惑的眼神。

“是在缅甸学的。”

“我们是缅甸人……你的缅语又是在哪里学的？”

我赶紧解释了问题的来由，顺带介绍了一下自己。

“哈哈，我们是缅甸人，在缅甸出生。来印度朝圣，借住在这里。”

“那边还有汉语很好的，你要不要去跟他们说汉语。”

与 addadhari 们交谈后，我意识到在寺庙与学校之外，本方土地多身应化：驻寺的僧侣归属缅甸现行的僧伽体系，是僧伽网络的一部分；借助这种网络，朝圣者得以在此落脚。会说汉语的是赴印求医的一家人，来自中缅边境；同样是借助这种网络，他们在异国他乡寻得了庇护，也省下了一大笔开销。学校响应印度政府的号召致力扫盲，同时也为来自吉大港山区的佛教徒家庭提供服务……从缅甸的僧侣、求医或朝圣的百姓，到不同时代迁居周边村镇的吉大港山区移民，各种面孔背后，人们的生命轨迹在此紧紧交缠；作为佛寺，作为庇护所，作为扫盲学校与佛教中小学，各种化身（avatar）彰显不同人群对于这方空间的理解与实践。这让我想起了印度人类学家克雷（R.S. Khare）的研究，也让我想起自己在缅甸南部的田野工作：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从一个特定的空间开始循溯，探究不同人群对宗教的不同理解与实践。



图2 缅寺内的孟式佛塔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此时的我几乎被密集的信息震晕了，但我并未忘记 N 村。我向自己发问：“村庄与这个孤岛之间，会不会有一座车马不绝的桥？”出乎意料的是，前来就医和朝圣的缅甸朋友们无人知晓 N 村的存在。

“你们真的住在这间寺庙里吗？没有见过附近居民来拜佛吗？”

“见过有人来拜佛，但语言不通，就没多问。”

寺里的工作人员跟我解释道，来此参拜的多半是附近村里的 Barua（来自吉大港山区、信仰佛教的一支），他们主要讲孟加拉语。另外，由于缅寺地处偏僻，外出采购物资需请专人代劳；而 N 村有位 M 先生缅语流利，寺里的日常琐事多需仰赖他帮忙。除此之外，缅寺与 N 村并无太多往来，他

本人也只去过寥寥数次。工作人员告诉我 N 村的方位和前往 N 村的大致路径。“只有一公里，大概 10 分钟就能到。”但路径无比复杂，我只能记个大概，便再次踏上了寻访 N 村的路途。

按指引走出不远，我进入了一个村子。路边有几家店铺，为确认自己没有走错方向，我向店主问路。“跋摩村？”第一位店主满脸疑惑，“我不知道，你有电话号码吗？你给跋摩先生打个电话。”

我连忙解释，自己寻找的是缅甸村。“哦哦哦，你说缅甸人，附近有个学校，缅甸村就在那儿。”第二位、第三位店主的答案类似。“Vm 车站附近有个缅甸餐厅，你去那里找找？”第四位店主给出了建议。我有些茫然。工作人员告诉我，N 村比缅甸寺离车站更远，去车站附近寻找恐怕不是一个好办法。这时我已走到了大路边，“那索性去大路上看看吧。”

村口是一家餐馆，没抱太大希望的我进门点了一杯饮料。“老板，您知道这附近有从缅甸回来的人吗？”

“你说的是 Burma Nagar 吧。”

我猛地一激灵：“对对对，您知道怎么去 Burma Nagar 吗？”

“出门右拐往前走，大概 3 分钟就能看到一道门，上面写了 N 村。”

“谢谢！”

根据老板的说法，我向着火车站的反方向，沿着大路走了一段。“要不再问问吧”，我心想，于是我又分别找了三家

路旁的店铺问路，得到的回答一致而笃定：再往前走，不远就到了。终于，矗立在路口的 N 村大门出现在我眼前。

那天晚上回住处之前，我去火车站附近的缅甸餐厅点了一份椰奶面。我突然意识到，Vm 镇就像是一棵菠萝蜜，根植于车站，所有的流动或由此出发，或指向此地，所以餐厅舍近求远，开在车站附近；途经车站的大路是茎干，而路旁的村庄就像是菠萝蜜果。其内部的流动依靠枝桠完成，但不同果实之间的流通微乎其微。从地图上看，Vm 镇的不同村庄之间多以树林或田地隔开（这在其他地方的农村也并不罕见），但地图上相邻的两个村庄，来往竟如此有限，着实令人惊讶。由于之前不了解 Vm 镇的居住格局以及人员流动的路线，此次 N 村之行颇费了一番周章。看来，除了找到合适的起点，了解当地的居住格局以及人员流动情形，对于进入田野、理解田野也颇为重要。



图 3 卫星地图上的 N 村，图中橙线为其大致界限。可以看出 N 村连通国道，但与周边村落有明显的分隔。

图片来源：谷歌地图

*注：回国后几次被问到在印度是如何找到和进入田野的。分享的故事是我晚到的一点答复。文中所涉具体地名、人名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李 音 文字审校：董 慧

新冠疫情中的达累斯萨拉姆

李乖琼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坦桑尼亚

一年的志愿服务加上两年多的留学创业，我与坦桑尼亚相处已经三年有余，从原来的“我们中国”变成如今的“我们中国，咱们坦桑”，朋友笑称我是一个年轻的“老坦桑”。然而，只有我知道自己对坦桑的了解才刚起步，碰上百年不遇的全球疫情，虽说创业之路遭受挫折，却也以另一种方式加快加深了我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了解。以下是我个人在这次疫情中的经历和体会：

一、“中国加油”

2020年2月1日，在国内过完一个“封闭式”春节后，我按照原定返程计划回到坦桑。今年特殊，出远门之前妈妈除了给我准备特产以外，还得为我去找口罩。家里没有口罩，那时候国内口罩已经成了紧俏商品，市里、县里各大药店都买不到口罩。好不容易在小姨家找了几个，原是表妹很早以前买的一包，给我拿了几个应急用。

从广州起飞中转卡塔尔飞抵坦桑尼亚，国内机场的全员

戴口罩到卡达尔机场的部分人戴口罩，再到坦桑机场的几乎没人戴口罩。来机场接我的是埃尔费德（坦桑人）和贾巴里（中国人），二人刚见到我时还刻意跟我保持距离，不停抛出问题向我询问有关国内疫情的情况，言语间透露出对新冠病毒的好奇与恐惧。

那时坦桑还没有病例出现，当地生产生活未受影响。Breeze 餐厅的经营情况正慢慢步入正轨，厨师加服务员一共有 8 名员工。十几天不见，出于或礼节或好奇或关心，员工们会问我回家这段时间过的怎么样？我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回家之后每天只能呆在家里，没有什么机会外出。他们也会关切地询问：“这个病毒是不是很可怕？在中国这个疫情真的很严重吗？是不是死了很多人？”又说在网上看到很多有关中国新冠疫情的视频，还一副求证的样子把网上看到的视频翻给我看，视频内容大约就是广场上、公交上一些人突然就一个一个倒地不起，一看就是些无良媒体人胡乱拼凑的视频。我跟他们说视频是假的，中国的疫情没有严重到如此夸张的地步，但是这个病传染性强，又暂时没有治疗的特效药，所以我们只能尽力去预防。戴口罩、隔离这些基本的预防措施是必须的，我们呆在家里，不随意外出也是响应国家号召，降低病毒扩散几率，为科学家研究出疫苗或药物赢得时间。毕竟没有亲身体会，我说这些的时候，他们几乎都一副听故事的表情，听完后厨师老布还说：“希尔达，幸好你来坦桑了，我们这里没有病毒，你就呆在坦桑，先不要回去”，两个女服务员也说：“希尔达，你不要担心，一切会好起来的，我们去教堂的时候会帮中国祈祷，你平常也可以祈祷，我们一起祈祷”。对他们动不动就想用祷告来解决问题的方式我已

经习惯得差不多了，比如 Breeze 有一段时间生意不好，几个服务员也说以后要多祈祷，我还开启“讲道理”模式，跟他们说方向错了，祈祷没用，应该好好研究怎么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但是这一次我没有再“讲道理”，他们说要去教堂为中国祈祷，我觉得这跟迷信无关，而是一种善意。

那个时期，来自坦桑的善意还真不少。2月5日的时候，很多坦桑华人都在朋友圈转发一个短视频，视频是由名为 Silent Ocean Tanzania 的国际海运公司制作的，视频里好几位坦桑尼亚人一人一句，用斯语和英语轮换说着“中国加油、中国坚强”，在祖国抗击疫情的紧张时刻，这短短的视频给我们带来了温暖。此外，心系祖国的坦桑华人华侨也努力汇聚爱心，为祖国抗疫助力。2020年2月15日，坦桑尼亚爱心华人捐赠的钱款换来的抗疫物资从坦桑被运抵国内，物资包括14万个口罩、29万只医用手套，这些物资都是华助中心工作人员和爱国华人华侨从坦桑各个药店购买所得。



图1 坦桑华人支援祖国的抗疫物资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二、“China Corona”

2020年3月7日，我的车在马路上与别人的车发生刚

蹭，事故发生后，我赶紧联系了当地的朋友。在坦桑，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自己往往没法处理，还是要当地朋友出面。对方司机说要等交警来处理，我也没意见。在等待交警来的时候，围上来几个看热闹的当地人。天气热，加上又出了事故，我心情有些烦躁，哪知围观的一个小年轻跑来冲着我喊“China Corona”。之前有看到过发生在一些国家的针对华人新冠歧视之类的新闻，虽然也有一定心理准备，但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是感到很气愤。那家伙第一次这么叫，我刻意忽略了，并未理他。没想到他还来劲了，连续叫好几次。我没忍住，决定去跟他“讲道理”。尽管带着愤怒的情绪是不适合讲道理的，现在回忆起来我只是记得说过，“疫情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你们不要幸灾乐祸”，用的是英文，但是这种街头小混混大都未受过什么学校教育，估计他们也未听懂。交警到了，他们在事故现场勘察，拿着本子写写画画，把事故现场画下来，以备鉴定事故责任。我的朋友到了以后，我着把刚发生的“China Corona”的事情跟他做了还原。我问他，遇到这样的事情应该怎么办？他说：“那些人很蠢，但是 Hilda，我建议你在这个时候不要去跟这些人起冲突，如果他们只是说一些难听的话，甚至都不需要去搭理他们，你首先要保护自己，毕竟你是一个外国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又没有熟人在身边的時候更要提高警惕。如果你有当地朋友一起，他们会维护你，比如如果当时我在现场，作为一个坦桑尼亚人，我就会让他闭嘴，甚至还可以骂他，但是你不能这样做。当然，坦桑的法律对外国人也有保护的，他对你使用了辱骂、歧视的语言，你也可以去警察局报案，只不过这个是理论上的，实践起来是另一回事。”

三、老布失业了！

3月16号坦桑大陆第一个新冠阳性确诊，为坦桑籍；3月18日桑给巴尔首例阳性确诊，德国籍；当天，坦桑大陆还确诊了本国第三例阳性患者。首例确诊的都不是中国人，而这些人没有近期中国旅行史，这其实让在坦华人松了一口气。虽然说不论他们是什么国籍，对坦桑抗疫形势来说没什么区别，但对华人而言，影响结果可能大不一样。结合我3月7日的遭遇，在那样一个形势下，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部分坦桑人可能产生对当地华人的不理性言论和行为。不得不说这是中国驻坦使馆早早指导旅坦华人进行自觉隔离与防护的一大阶段性成果。在坦桑确诊首例新冠阳性之前，当地政府尚未出台针对外国入境旅客的管理措施，但中国驻坦使馆和华人从2月份开始就倡导国内到坦桑的华人进行14天的自我隔离，大多数华人也都自觉执行。

在坦桑尼亚还没有确诊病例时，大部分当地民众还没有任何危机感。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考虑疫情到达坦桑的可能性。尤其是当非洲大陆有国家出现病例时，我试图规划Breeze餐厅的前景，更多地是考虑一旦出现最坏的情况应该如何保证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只是似乎能改变的也不多，所做的仅仅是去当地药店买了两盒口罩，以备不时之需，记得那时候药店口罩才卖10000先令（约30人民币）一盒。

第一个新冠阳性病例的出现，让我悬着的心又咯噔了一下，该来的还是来了。后面陆续有新病例出现，而政府

从首例确诊到发布关闭学校、停止公共集会和体育赛事活动等的通知就用了 2 天时间。店里员工对疫情的态度开始有了变化，在傍晚休息的时候会聚在一起，守着保安伊赛亚的手机听新闻广播，等待有关疫情更多的消息。大家的表情越来越凝重……

怎么办？我首先想到的是让所有员工戴上口罩，按照国内经验，口罩要使用 N95 或者一次性医用口罩，不能用一般的防尘、防晒口罩取代，每个一次性口罩佩戴 4 小时更换一次，且需正确佩戴。3 月 17 日，我手里只有两盒口罩，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18 日再去药店时，口罩价格已经翻了好几番。最高的时候一盒一次性医用口罩可以卖到 100000 先令（约 300 人民币）。因坦桑市场的医用口罩均为进口，加上其他国家也都在抗疫，市场上仅有口罩都是之前的存货，所以数量非常有限。我有些后悔前几天没有多买一些，但转念一想，按照中国国内当时的防疫经验，光有口罩也不行啊，员工有口罩，客人也不一定有口罩，Breeze 员工上下班还都是坐公交，而坐过无数次坦桑公交的我很清楚其拥挤程度，由于坦桑的公交车大多是日本国内淘汰的小学或幼儿园校车，所以每个座位都很小，并排两个座位往往只能一个人坐，两人一前一后错开，也只能勉强坐下。一辆车大概 20 个座位，但是高峰时候能挤 40 人，大半人就只能站着，且人贴人。另外，有住宿较远的员工，回家需倒三趟车也是常事。此外，他们每天回家跟家人一起生活起居，他们家人的防护又是个什么样子？不敢想象……

在接下来的几天，Breeze 的客人明显减少了。虽心

有不甘，但综合考虑，Breeze 似乎只有暂停营业这一个选择。当我还在纠结的时候，附近大一些的餐饮同行已经陆续开始采取行动，贴出暂停堂食，仅提供外卖服务的通知。见状，我把所有人召集起来开了个会，也决定暂停营业。我给每个员工多结了半个月的工资，嘱咐大家做好防护，尽量呆在家里，不要到处跑，等疫情好了再开始工作。这个时候，因整个大环境都很紧张，大家对这个刚刚到达坦桑的病毒的恐惧要大过对失业的恐惧，抱着病毒会在短时间内消失的希望，怀着可以拿工资休假的心态，甚至没有做过多的感叹和纠结，大家就都回家了。对于什么时候重新开业，我没有他们那样乐观，觉得短时间内希望渺茫。

跟我一样不乐观的是厨师老布。老布是店里的烧烤师傅，三十岁的年纪，在坦桑已算中年人了。跟那些没有家室的小年轻不一样，老布身上有家庭的担子。他孩子两岁，妻子全职在家操持家务带孩子，老布的工作是家里唯一收入来源。好在他有一技之长，有一手好的厨艺。当初是我把老布从 Container Bar（一个当地烤肉吧）叫过来的，工资是每月 50 万坦先令（约人民币 1500 元），工资水平是普通服务员的两倍，基本够他们一家三口的开销。宣布停业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面露难色的员工，尽管手里握着一个半月的工资，他还是问了我好几次，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再上班？



图2 疫情以前的老布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两个星期之后，老布给我发信息说家里没钱了，孩子生病需去医院，问我可不可以先借他 20 万先令。考虑到是救急，能力范围之内，我转了 10 万先令给他。我跟他：“不好意思，我没有 20 万可借给你，但这 10 万是作为朋友帮助你的，这个钱不用你还。”朴实的老布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后来没有再问我借过钱，但是他有问我说如果暂时 Breeze 不开业，他可不可以去找找其他工作？我说当然可以，有任何的工作机会你都可以去。

疫情期间，餐饮是受到重创的行业之一，对一个失业的厨师来说，其影响可想而知。后来他又继续询问我什么时候重新开业？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上班？我知道老布还没有找到工作，便也帮他留心其他工作机会。偶然听到一个

中国工程公司的施工队在招工人，我就立马联系了老布，虽然不是老本行，但这个时候，有份工作可以糊口就应抓住机会。他也很开心地来了，然而对方公司要求所有员工在疫情期间实行封闭式管理，吃住统一在工地，不能擅自外出和回家。要是半个月前，老布可能还会因为不能回家而放弃这个工作，但现实已没有给他选择的机会。他想了想说：“好的，我让我老婆带孩子回老家。这样我就可以住在工地上班，不用担心家里了。”本来说好三天后跟其他几个应聘的工人一起去工地，结果第二天就出现了新情况。因为另一家在坦中资企业实施了封闭式管理之后，惹得当地员工不满，告到当地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对此提出了批评，强调说要禁止企业以疫情为借口剥夺员工回家的权利。另外，此事媒体也报道了，影响不太好。其他中资企业不得不吸取教训，既然封闭式管理得不到政府的支持，政府又要求不能以疫情为由随意辞退员工，对方公司也只能暂停新员工招收以降低风险，招聘计划取消。就这样，老布还是无法获得一个就业的机会。

除了老布，Breeze 的其他员工后来也都陆续跟我联系过，了解了一下大家的情况，有的找了其他工作，找不到其他工作的比如卡斯托就回了老家。对于他们，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是无法在达市继续呆下去的，仅房租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回老家至少不要房租，物价也低。疫情紧张的那段时间“撤回乡下老家”成了很多达市失业人员的选择。此外，作为一种防疫方式，一些人也选择把不需要上班又是高危感染群体的孩子和老人送回乡下老家。



图3 回到老家的卡斯托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四、一颗回家的心

尽管我们希望一切能尽快好起来，但全球疫情形势却日趋紧张，海外华人的回国之路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在2020年7月，有一个在肯尼亚的华人朋友凯文要通过陆路来坦桑，他说会自己坐车到边境，然后希望我安排车去边境接他。我隔离在家憋得太久，也对边境有一些好奇，便提出跟司机一起去。这个边关叫 Lungalunga Border，属于坦嘎省的地界。早晨6点，我们从达累斯萨拉姆出发一路狂奔，大约11点到坦嘎市区，跟司机在市区吃个早饭，再开车一小时左右到达 Lungalunga 边境。我联系了凯文，他还没到，原本说的是中午12点，结果多等了大概2小时。直到下午两点左右，

他才发信息说已到边境。我们开车进入两国边关区，区域内有两栋办公楼，是两个国家的出入境大厅。两栋楼之间相隔一公里左右，楼前分别挂了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国旗。

我们先走进坦桑的出入境大厅，询问应该在哪里等从肯尼亚过来的朋友。这个边关没有我想象中的繁忙，大厅内各个窗口前基本都空着，工作人员有的戴着口罩，有的没有，门口放置了洗手的水桶，但装洗手液的瓶子看上去已空了几天。我跟工作人员说朋友凯文不会语言，可能在出入境的时候需要我帮忙翻译，他建议我去另一个办公楼（肯尼亚出入境大厅）去询问。走到肯尼亚出入境大厅，门口同样有洗手装置，配了洗手液。我很自觉又洗了洗，司机没洗就想进去，结果被门口保安拦下，提示说要先洗手，司机说自己刚刚才洗过。肯尼亚保安指了指贴在门口的通知，强调进入大厅前必须戴口罩和洗手。进入以后发现，肯尼亚这大厅要比坦桑那个宽敞一些，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戴了口罩。司机过去询问，我看着司机和肯尼亚工作人员全程用斯瓦希里语打招呼、交流，心想如果没有那一纸护照，还真是没法区分他们的国籍。由于大厅不让等人，肯工作人员看了司机的坦桑身份证后要求我们去坦桑那边去等，并且跟我说：“不会语言不会影响他出关的，我们这里来来回回走过很多不懂语言的中国人，他们知道怎么做。”

从我朋友说自己抵达边境到真正过关出来，又过去了一个小时。他终于顺利办完手续，坐上了我们的车。这个华人朋友原本是年前到肯尼亚考察，后因疫情，肯尼亚封城，国际航班停航，只能“原地抗疫”，在肯尼亚的一个小镇上一呆就是小半年。听闻坦桑的国际航班开通，又是肯尼亚邻国，便想到陆路到坦桑，再从坦桑回国。我问了一下他机票的价

格，仅机票小三万人民币，而且之前已订过几次，但各种政策原因航班无法起航，仅改签、退票就已花了不少钱，总共算起来回国一趟得花五万人民币左右。但他倒没有抱怨，反而觉得挺幸运，说坦桑机场能走国际航班，为自己回国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到旅店时候已是晚上8点多，他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只要说起能回国，他就难掩兴奋和激动。所幸几天后他如愿回到中国。



图4 尼雷尔机场准备回国的中国人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五、美景寂寥

回国之难，无疑也就意味着国际往返之不易，作为坦桑尼亚重要支柱产业的旅游业也就自然陷入了困境。8月，有朋友约着去塞伦盖蒂公园游玩，因疫情原因，旅游业在世界各地都跌到谷底，坦桑也不例外。为了刺激境内游客消费，塞伦盖蒂大草原的团费用已到历史新低，约是高峰时的一半。8月的大草原是最适合看动物的，尽管草木枯黄，但一片片人

工焚烧过的草原上萌出绿芽，生机盎然之势。动物都没有了藏身之地，更不用费力寻找。我们的导游兼司机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经验的向导，萧条之下，他已好多天没有接到工作。我们的到来，使他终于可以再开起陆地巡洋舰在他熟悉的草原奔驰穿梭，心情大好。跟着司机在塞伦盖蒂追逐非洲大草原的美，得益于他对这片茫茫草原的熟悉和对生活于此的动物的了解，我们有幸在两天之内就看过了生活在这里的几乎所有的动物。一路上我们很少遇到其他游览车，同行的朋友已来过塞伦盖蒂很多次。据他们讲述，以前这个时间的草原上可见很多来往的车辆，一茬接一茬的游客，草原里的酒店在旺季都要提前很久预定，且价格不菲。现如今，入住率只有不到三分之一，酒店餐厅连自助餐都没法开，游客用餐只能单点。我想，“人气”比以往低了那么多，动物们可能也会有些不适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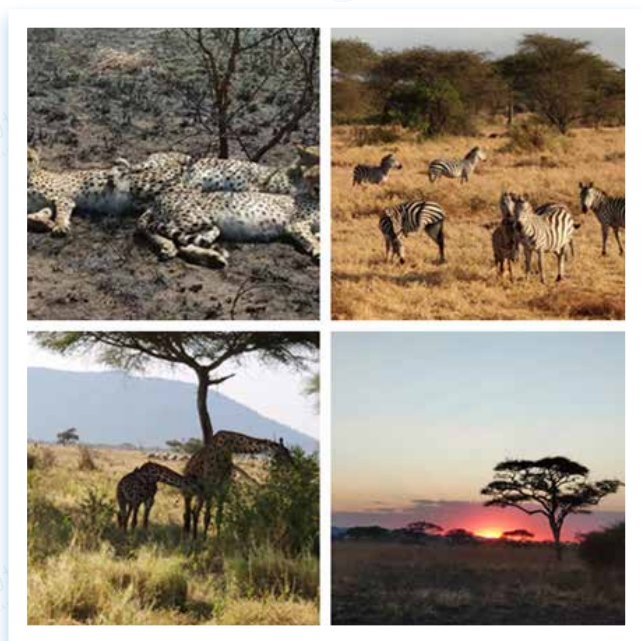


图 5 8 月份的塞伦盖蒂草原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9月份我还去了一趟桑岛，桑岛被称为“印度洋上的绿松石”，是东非旅游胜地之一，每年要接待几十万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作为桑岛经济支柱的旅游业遭到疫情冲击，游客人数大幅下降。在石头城的街道里，除了一些当地的孩子在嬉戏打闹外，看不到什么游客，步行街卖各种工艺品的商铺稀稀疏疏地开着。街面是那么的安静，偶尔走过一个游客，店主那“欢迎进来看看”的招呼声都快能在巷子里产生回音。海边的酒店入住率也很低，无需预约，直接到店订房，还可现场讲价。跟几个朋友以原价的三分之一的价格住了一个四星海边酒店，却发现整个酒店区竟然只有我们四个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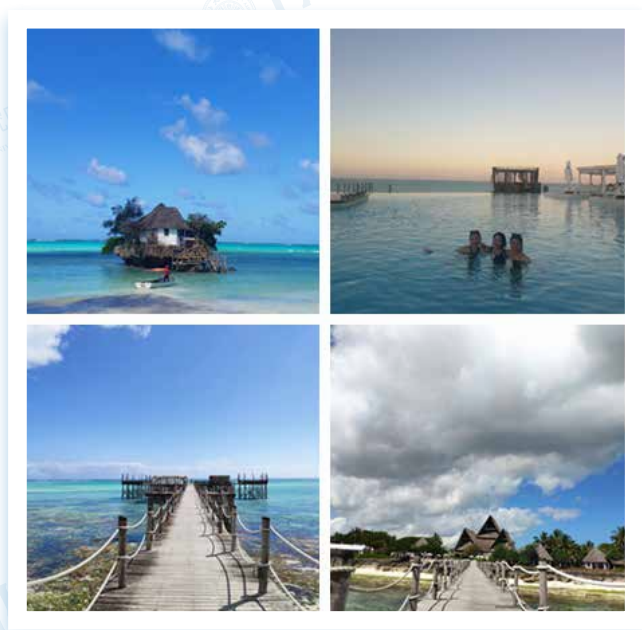


图6 9月份的桑给巴尔岛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疫情之下，除了基于自己的亲身体会对疫情下的达累斯萨拉姆有一个认知以外，我对当地朋友的防疫日常也颇有兴趣。在此选择几个我相对熟悉的当地朋友的经历以作分享。

六、自我熏蒸的警察朋友

在疫情形势最紧张的3月和4月，官方通报显示疫情形势越来越严峻。有几天，确诊的数据陡然上升。一个警察朋友跟我说自己感染新冠了。他是我认识的人中第一个说自己感染新冠的。

我：“你去医院做过检测了吗？”

他：“没有，只是觉得自己好像有那些症状。”

我：“那你要怎么办？”

他：“我已经去警察局医务室打过报告，然后请了假，可休息两星期。”

我：“那些跟你一起共事的同事，他们不需要隔离吗？”

他：“他们有症状的，不舒服的请假休息，没有症状的要继续工作呀！”

我：“那像关在警察局的犯人怎么办？会给他们分发口罩、消毒液吗？”

他：“我不知道怎么办，没什么办法，我们办案警察还要自己找口罩呢。而且口罩真的有用吗？有多大用呢？”

我：“但是这样很危险啊！”

他：“那也没办法，死了就死了，人总是要死的，但是我知道我会没事的，我是上帝的儿子。”

他比我想象的要淡定，跟我说这个病毒没有那么可怕，他一个朋友比他先感染，也是呆在家里，就用传统的熏蒸方法，每天熏两次，且那个朋友已慢慢好起来了。我很好奇，就问他具体怎么熏蒸？他还给我拍了一个视频。视频里，他把市场上买来的草药配方，放到锅里，熬煮两个小时，可闻到浓郁的草药味道之后，把还在沸腾的锅端到地上，自己围

着锅一坐，用一条被子或者毯子把人跟草药锅一起覆盖，也可只把头伸进去熏，到满头大汗为止。我只能祝他早日康复，建议他要自我隔离。大概一个月后，他说自己已痊愈，而且半个月前就开始工作了。我说你确定你得了新冠吗？他说：“我也不知道，但事实说明这个熏蒸方法真不错，就算不能治疗新冠，也可以治疗别的病，没事熏一下可以预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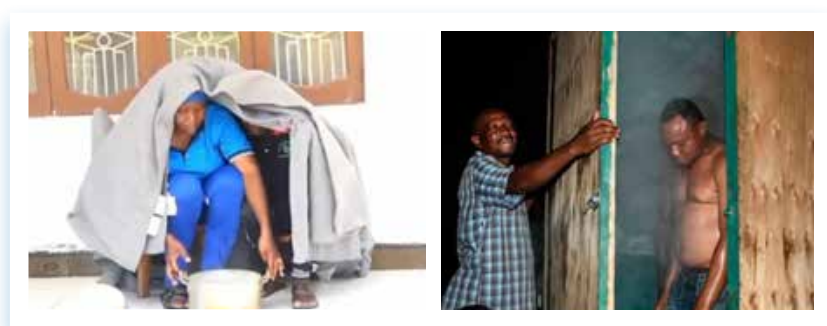


图7 坦桑传统熏蒸疗法

图片来源: images.google.com

七、戴口罩的公交售票员

4月20日的时候，时任达累斯萨拉姆省的省长马孔达发表讲话要求大家出门戴口罩，并强调任何形式的口罩都可以。出门采购的路上一看，口罩的普及率已经很高了，所见之处几乎每个人都戴了口罩，各种各样、五颜六色，戴法也是千奇百怪。

印象最深的要数那些公交司机售票员（负责收钱和揽客），在我印象中他们总是站在公交车门口，单手扶着车门，半个身子探在外面，不断招揽乘客，每到一个站台就上蹿下跳，身姿灵活。高峰时段，车内总是异常拥挤。争先恐后的乘客想着能挤上就挤上去，售票员也想多挤上一个是一个，

当挤到车门都关不上的时候，售票员就用力把最后一个客人往里一推，干脆用自己的身体当车门了。政府要求戴口罩那段时间，这些售票员脸上戴的口罩也跟他们自己一样跳脱，那个头巾口罩的位置总是在脖子和脸之间随意切换。政府有规定疫情期间公交不能再站人，而且每个站点要求设洗手装置，要求乘客先洗手后登车，所有人配戴口罩。这下好了，公交运营商开始抱怨，不能站人，意味着跟原来相比收入要减一半。此外，据说为保证防疫措施落实，路上的交警出勤率大大提高，这些公交被拦下检查的次数也随之多了起来。这些老旧公交车多少都有些问题，所以花小费的次数也多起来了。这样一来，有些公交干脆停了不跑。之所以如此，坦桑的公交是私人所有，私人负责经营，个人可以买车，雇一个司机，要跑哪一条路线就申请，然后给政府交申请的费用就可以运营，自负盈亏。



图8 达累斯萨拉姆街头戴口罩的人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八、活力四射的健身伙伴们

从坦桑官方4月底最后一次发布新冠疫情数据之后，再无数据更新。在疫情扑朔迷离的5月、6月，我没有怎么出门，每天主要就是自己锻炼身体，保证饮食和睡眠，看新闻了解疫情变化。外出采购生活物资时的几次外出让我看到变化在逐渐发生，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少，大家又把口罩都摘了，而且十字路口那些乞讨的大人、小孩又多了起来，原来很多公共场所设置的洗手装置有些已按不出水。

到7月份，达累斯萨拉姆这个城市似乎已经完全恢复成疫情之前的模样了。然而，疫情真的过去了吗？真实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好似雾里看花，总感觉看不太清。没有官方数据，我对当地疫情的判断只能基于自己所接触的人和事。原来经常在一起健身的小伙伴，有健身房老板奇尔、电视节目主持人塞巴和创业大学生莉莎。从2018年开始，我四人就组了个小团队一起健身，莉莎还是我拳击课的搭档。我们健身的地点是奇尔的健身房，健身房在4月1日因为疫情宣布暂停营业，6月1日重新营业。我对不明朗的疫情有些担忧便没再去健身房参加健身小组的活动。我问奇尔健身房的经营情况，他说开业是因为几个老顾客觉得疫情形势缓和，想回归健身房，所以一直建议他重新开业。没想到重新开业没多久，健身房就差不多恢复了以往的生机。塞巴除了电视节目主持的工作之外，还兼职婚礼司仪，经常在各大婚礼现场串场。6月末的时候，他那停更了几周的Ins动态里便又晒出自己在各种婚礼现场主持的图片。莉莎跟妈妈在市郊农场种的西红柿和秋葵也开始上市，她还做了鲜果果汁派送；此外，她每天坚持健身4小时以上，进步很快，11月份

的时候已开始在健身房当教练指导他人。看着他们一个个仿佛没事一样工作和生活，我是有点惊奇又有点羡慕。



图9 四人健身小队合影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九、激情的创业青年艾力

艾力是新媒体从业者，刚毕业的时候做过智库交流中心的媒体咨询顾问，担任过 Zoom 在坦桑的运营经理。辞职后自主创业，承包过农场，现在开了一个自己的工作室。疫情开始时，我问他的工作室有没有受到疫情影响，他说因为他的业务是广告策划，主要为客户提供方案，除了偶尔有客户提出面谈的要求，其他时候是可以实现线上办公。他听说我的餐厅因为疫情停业之后，曾建议我改成外卖服务，但是我根据餐厅的实际情况核算了成本收益之后，选择停业。倒是艾力 2019 年跟朋友一起创立的 Distro 线上酒水销售平台，在疫情的刺激下，迅速发展起来。Distro 作为酒水销售网站，服务内容是实现达市城区线上酒水配送服务。几乎所

有在当地酒吧里找得到的各类酒水，都能在 Distro 官网上订购，达市城区客户在下单后 10-30 分钟内就能完成配送。

坦桑人的“酒文化”和“酒吧文化”与中国人的“酒文化”大相径庭。“酒”在坦桑人民的生活中很少作为“社交工具”出现，坦桑人喝酒多是一种享受，工作太累买瓶酒解乏，放松休闲喝点酒助兴。当地的非穆斯林群众，不论男女，没事就喜欢喝点酒。达市大大小小、各种规模和档次的酒吧多如牛毛，分布在各个社区和街道。每逢周末、节假日或者有足球比赛的日子，大大小小的酒吧里挤满客人，他们举着手里的瓶子或杯子，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不自觉地踱起非洲舞步。平常的日子，哪怕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哪怕一粒花生米都没有，也能抱瓶酒喝得有滋有味。但是比起在家喝酒，更多人喜欢去酒吧喝酒，享受那个氛围。据艾力说，2019 年 Distro 推出以后，一直不温不火。而就在第一波疫情开始之后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内，Distro 的用户数量实现了一个小爆发。艾力认为背后原因可能是：大量酒吧暂停营业，喝酒的场地转到家中；很多人因为疫情刻意减少外出，自己去买酒的意愿降低；紧张疫情形势下心理紧张，加强了大家对喝酒的热衷程度。

到 6 月份，大部分实体酒吧重新开业。艾力的 Distro 网店又推出了线下迷你移动酒吧。移动迷你酒吧配备专业调酒师，他们去到各种活动、聚会现场提供酒水服务，艾力更新的动态图片不仅显示了他这个迷你吧做得“风生水起”，也说明达市民众的各种聚会活动又兴盛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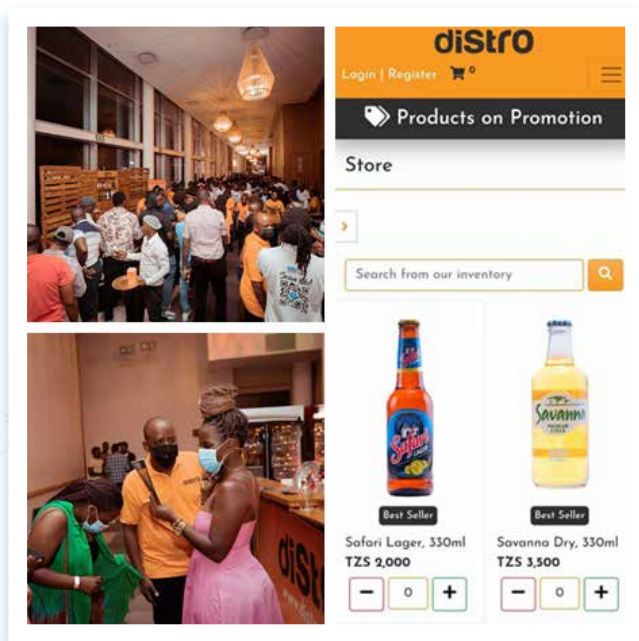


图 10 Distro 的线上和线下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十、大选中的苏勒曼和勒宁

苏勒曼是一名年轻的坦桑尼亚革命党（简称“CCM”）官员，是 CCM 党主席顾问团的成员。对于苏勒曼来说，他的新冠经历似乎更具“波澜”。因他有中国留学经历，结识了几个中国好友。就在 1 月份的时候苏勒曼还受朋友之邀去了一趟中国武汉。回到坦桑之后不久，就听说武汉疫情暴发了，他一度非常担心自己可能被传染，而当时坦桑甚至还没有检测能力，只能干着急，只不过前期一直没有什么症状。直到 3 月份，坦桑有确诊病例之后，他开始感到身体不适，出现一些新冠类似症状，在去医院做完检测后，结果显示新冠阳性。一起确诊的还有他的妻子，好在两人都为轻症，便选择在家自我隔离，隔离期间两人吃了一些苏勒曼之前从中

国带回来的感冒药，又尝试了坦桑传统的熏蒸疗法，后来身体也慢慢恢复了。

坦桑青年联盟是当地一个致力于推动青年发展的 NGO 组织。与以往一样，该组织今年依然在坦桑选举委员会安排出来的选举观察组织的名单中。这个 NGO 组织的负责人勒宁，是我认识的第三个说自己患过新冠后痊愈的坦桑人。因想了解当地非政府组织大选观察实践，我们 10 月见过一面，他看起来挺精神，充满活力、侃侃而谈。提起自己患新冠的经历，他倒是轻描淡写。他说自己年轻，加上平常都有锻炼的习惯，所以确诊新冠阳性之后，他个人也没有很大的情绪波动。医院医生也觉得他症状轻微，建议居家隔离恢复。他在家也用了熏蒸疗法，每天大量喝水，特别注意保证饮食规律和睡眠充足，慢慢症状也消失了。勒宁说：“我很庆幸自己能重获健康，上帝是好的。”

因为工作需要，在整个 9 月到 11 月中旬这段大选的关键时期，苏勒曼和勒宁都往返于达市和各大选区，马不停蹄，承担了大量的工作。各种开会、集会活动现场都是人员聚集的场所，与以往的大选年相比，这些集会活动不论是规模，还是频次均没有因为新冠而受到影响。



图 11 2020 坦桑大选集会

图片来源：Instagram

十一、穿上婚纱的克莉

律师克莉，律师家庭出身，在一家港资矿业公司做法务。她性格开朗，讲话幽默，我总能她身上可以看到一种“不卑不亢”的品质。她曾经感叹：“你们中国人真有智慧，什么东西都能造，最关键是可以根据不同顾客、不同消费能力提供不一样的产品。有些坦桑人总是抱怨中国产品质量不好，他们错了，‘一分钱一分货’。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也能享受高质量的中国制造。”有时候也跟我抱怨说有中国人不喜欢遵守规则，找她办签证，就扔给她一个护照，在官方需要的其他材料都没有的情况要求她必须在什么时间内办好。“还有部分中国客户，他们总是不分时间打电话和发消息给我，每次都是没有称呼，直接提出要求和命令。我觉得他们很不礼貌，对于那种粗鲁的客户，我干脆就不接待了”，她无奈地说。

3月份的时候我们有见过一面，因为知道我2月份刚从国内回来，她见了面第一句话先说：“哦，希尔达，我想你了，我想拥抱你，但是我害怕病毒，听说病毒很可怕，所以我们现在最好不要拥抱，哈哈！”她是我见的第一个戴了医用口罩的坦桑人，聊天时又从包里掏出了一瓶消毒液，挤挤在手上，连头发上都抹一抹，看得我想笑。她说，“我要爱惜我的生命，我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孩子，还要挣很多钱”。边说边笑，说话间还跟我抱怨自己花12000先令在超市买的100毫升装的消毒液价格过高，毕竟之前也就卖3000先令。克莉原计划在2020年7月结婚，婚期大半年前就定下了，还特意邀请我给她当伴娘。3月下旬坦桑出现疫情，政府宣布减少集会后，她通知我说婚期要延迟。5月份的时候

又告诉我说婚礼将如期举行，因为坦桑的疫情似乎没有想象中可怕。

7月4日，克莉结婚的日子。我第一次以伴娘角色去体验坦桑当地婚礼仪式，尤其是特殊时期疫情形势的不明朗让我对这次经历有了不一样的感触。坦桑传统婚礼程序非常复杂，单是伴娘团就有各种“会议”要开，要统一衣服、鞋子、首饰、美甲，还要练习开场舞，婚礼当天统一化妆、做头发……伴娘的行程都是有人统一安排的。克莉精心策划的婚礼，作为伴娘，我们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努力配合。白天又是去教堂，又是陪新人去拍照。婚礼晚宴安排在 Lugalo 高尔夫球场的草坪上，现场布置精美又大气，到场宾客近五六百人，大人小孩都着盛装。音乐声起，皎洁月光下，新郎新娘在一波又一波宾客的簇拥下，载歌载舞，空气中满是开心愉悦，丝毫看不到有新冠疫情的迹象。6个多月之后，到2021年1月21日，克莉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是一个女儿。



图 12 克莉的婚礼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十二、参加选美比赛的塔米

2020年8月到11月，关于新冠的话题似乎已经完全淡出了坦桑民众的生活。坦桑大选结束，马古富力总统成功连任。在再次提到疫情时，马古富力总统说：“希望世界各国领导可以像坦桑一样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将上帝放在第一位。”

12月5日，2020年坦桑尼亚小姐选拔赛决赛在尼雷尔会议中心举行。第一次参赛就顺利冲入决赛的塔米发邀请函让我作为亲友团成员去现场支持她。在进入决赛的20位选手中，18岁的塔米是年纪最小的。现场观众大概有500多人，整个观众席空置了一半。一起的坦桑朋友说：“50000先令（折合人民币150元）一张的票价将很多人拒之门外，如果不是入场门票贵的原因，你会看到走廊都能站满观众，因为我们坦桑人热衷于各种各样的聚会活动。”

当晚坦桑议会副议长作为政府官员代表出席了活动。统观整个活动现场，我是唯一戴口罩的人，一起的几个当地朋友不止一遍跟我强调：“哈哈！希尔达，坦桑没有新冠了，你不用戴口罩”，这也难免让我有些不自在，感觉自己仿佛与现场格格不入。比赛从晚上10点开始持续到凌晨2点才结束，除去独自戴口罩的尴尬以外，我倒是非常享受当晚的活动。整场活动从场景布置到比赛流程和比赛内容等各个环节都很有当地特色，展现了坦桑女性和坦桑文化别具一格的美。塔米最终没有如愿进入前三，但她很有志气地说：“感谢朋友们的支持，这只是旅程的开始，明年我还会再来的。”



图 13 2020 坦桑小姐决赛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十三、足球比赛现场的奥斯

2021 年 1 月份以来，有外媒报导来自南非的变种病毒开始在坦桑肆虐，2 月份时，坦卫生部也开始再次提醒民众采取新冠防疫措施。跟去年 4 月份的时候一样，我在开车外出时被交警拦下的频次变多了，没什么别的理由，就是想要几个口罩。

2021 年 2 月 23 日下午，坐在家里的我听到外面一阵阵此起彼伏的欢呼声，我心想 Simba 足球队今天应该是取得了不错的战绩。今天是坦桑顶级足球俱乐部 Simba 跟埃及冠军足球俱乐部 Al Ahly 比赛的日子，比赛场地是在姆卡帕国家

体育馆。作为半个 Simba 球迷的我，因为再次紧张的疫情形势宅家已有一段时间，看到朋友奥斯发来的现场视频，我有些震惊，不是为比赛结果或其他，而是惊诧奥斯竟然这个时候去了比赛现场。

30 多岁的奥斯在一家报社工作，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我还记得在去年 4、5 月坦桑遭遇第一波新冠疫情时，奥斯对坦桑疫情表现出格外的谨慎和担忧，甚至到 7、8 月坦桑各界普遍认为疫情已过去时，他依然小心翼翼。那时奥斯托我帮他买一台二手电脑，他说一直以来都是去单位用办公室的电脑工作，为了把感染新冠的风险降到最低，他想在家办公，而自己电脑失修已久，只能临时买一台。不仅如此，他还向我打听中国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药物，我给了他两盒莲花清瘟。

没想到曾经防疫工作做的那么努力的奥斯这个时候竟然跑去体育馆看球。看着他发来的视频，我很想问问他：“你不害怕病毒吗？还主动去人员如此密集的地方，而且视频里所有人没有戴口罩，没有社交距离”，担心这样说会扫了他当下激动的兴致。我便换了一种委婉的方式：

我：“恭喜 Simba 队获胜，大家看起来都如此开心，都在享受比赛。”

奥斯：“谢谢你，希尔达。我们太开心了，你可能不理解，因为我们今天终于打败了一支阿拉伯人的球队。”

我：“现场观众多吗？”

奥斯：“当然，现场观众至少 20000 到 30000 人，很多球迷是连夜坐大巴从其他省赶来的。哈哈！我知道你想问我们怎么都不害怕病毒？这次比赛入场的时候是要

求观众戴口罩的，只不过很多球迷在激动的时候把口罩都摘了。哈哈！就因为对足球的这份热情，我们已经把新冠病毒的事情抛掷脑后了。”

我：“可是最近我看新闻报道，坦桑好几位官员去世，疫情是不是有些严重啊？”

奥斯：“是的，非常令人悲痛。不过去世的几位年龄都比偏大，看起来新冠对年轻人并没有那么大的威胁。”

我：“那现场看比赛的应该都是年轻人，没有老年人吧？”

奥斯：“哈哈！当然不是，那些老年球迷，他们戴了两层口罩。”



图 14 23 日足球比赛现场激动的球迷

图片来源：Instagram

责任编辑：高良敏 文字审校：许 帅

从开罗到亚的斯亚贝巴：多元视角下的埃塞俄比亚复兴梦

段九州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国家为埃及和土耳其

埃及总统塞西在 2021 年 2 月 6 日接受 MBC 埃及台著名评论节目“讲述”（Al-Hekaya）的专访中谈到了埃及人最关心的问题——包括尼罗河复兴大坝、新冠病毒、利比亚问题、行政腐败、人口过多、道路工程。关于其中的两个国际问题，塞西认为，利比亚已经选出新的临时政府和总统委员会，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而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关于复兴大坝的谈判却依然陷在僵局。我曾经于 2009-2010 年在埃及留学，彼时的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随后发生的政治变局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地区。当我在 2017 年再次进入埃及进行田野调查时，虽然这个国家依然深深嵌入在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中，但它正在以非常明显的速度“非洲化”。埃及当前积极融入非洲事务，不仅是因其在中东失势而被迫转向，更重要的是，它认为埃塞俄比亚修建的复兴大坝威胁到了埃及人数千年来对尼罗河水的主导权。身在开罗的我，对埃及政府和社会日常挂在嘴边的“生存威胁”——埃塞复兴大坝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埃塞俄比亚，这个同样人口上亿的非洲大国，号称是非洲大陆唯一没有被殖民过的国家，如今也与中国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它的人民如何看待埃及和阿拉伯

世界，如何看待中国？带着这些问题，我临时起意在2018年4月购买了从开罗到亚的斯亚贝巴的机票，想对这个我心中的神秘国度做一次突击式的田野调查。



图1 2018年4月，埃塞境内的东非大裂谷起点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一、复兴大坝和崛起大国的新殖民叙事

作为东北非地区最重要的两个航空枢纽，开罗和亚的斯亚贝巴之间的直飞航班非常通畅。从开罗起飞后，不到五个小时我便顺利降落在亚的斯亚贝巴机场。巧合的是，一心想要探寻埃塞俄比亚和中东关系的我，在飞机上就收获了第一份素材。当与同机邻座的阿拉伯人开始攀谈后，我发现原来他是也门哈迪政府驻派开罗的官员，由于内战无法返回故国。他本次前往埃塞是专程去吸食也门的国民“口香糖”——卡特草，因为在也门之外只有在埃塞俄比亚可以种植且合法吸食卡特。这段小插曲更激发了我对埃塞俄比亚的好奇。如果说草药代表了东非与阿拉伯半岛的历史和自然联系，那么当代的埃塞人如何看待阿拉伯人呢？

降落亚的斯亚贝巴机场后，我一如既往地按照程序登记过海关。在正对海关出口的机场墙上，一副大型宣传画吸引了我的眼球，而它的内容正是我此行求解的主要问题——正在建设中的复兴大坝位列宣传画最下方，其上方是分别用英语、阿拉伯语和法语书写的标语（见图2）：

“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为（东）尼罗河流域带来了新的合作时代，它也被学者们冠名为“新的法律秩序”、“游戏规则改变者”和一个“公平”的体系。”



图2 2018年4月，亚的斯亚贝巴机场的复兴大坝广告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标语并没有用当地语言书写，而是用了在国际和地区较为通行的国际语言，这无疑是专门向外国旅客宣示埃塞复兴大坝的成就和它的法律、政治和历史意义。而出机场后与出

租车司机的一段对话让我更加明白这段标语的含义。

出机场，坐上提前预约好的酒店接送车，司机饶有兴趣地问起我来自何地。我说自己是中国人，但长期住在埃及，这次从开罗过来。没想到，“埃及”两个字打开了司机师傅的话匣子。他毫不避讳地表达了对埃及的敌对情绪，指责埃及在历史上扮演了对其他非洲国家的“次殖民者”的角色，它利用自己的文化、外交和军事优势欺骗和打压尼罗河沿岸国家的用水权利。而他的国家——埃塞俄比亚，作为非洲大陆唯一未被西方国家殖民过的国家，再次带领非洲国家抵制埃及的“殖民主义”，用复兴大坝打破埃及对尼罗河水的垄断。这一刻，即使没有亲眼目睹复兴大坝实体的雄伟，我已经体会到它背后代表的这个崛起大国壮阔的民族情绪了。

二、奥斯曼人和鸡蛋桥：埃塞俄比亚的历史孤立情节

虽然埃塞俄比亚的主流人口信仰埃塞俄比亚正教(Ethiopian Orthodoxy)，但当我走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街头，除了占地面积较大的教堂之外，我并未感受到这个国家浓厚的基督教氛围。正在思索前往何处体验文化时，当地向导建议驱车带我前往离首都 100 多公里之外的历史古迹“鸡蛋桥”参观。在向导看来，“鸡蛋桥”的卖点在于它位于东非大裂谷的起点，立于桥上可以俯瞰裂谷。而真正吸引我的却是这座桥的历史。相传在 400 多年前，已经在地中海地区崛起的奥斯曼帝国，曾派兵前往东非高原攻打埃塞俄比亚，导致后者陷入被穆斯林军队围攻的困境。埃塞俄比亚皇帝向同为基督教同胞的海洋强国葡萄牙求救，葡萄牙军队闻讯而来，在跨越大裂谷时修建了这座桥。为了建筑的稳固性，葡

葡萄牙人在桥体中加入了鸡蛋清，该桥因此而得名。

笔者曾经长期关注和研究埃及的宗教少数群体——科普特人，他们所信仰的科普特正教会与埃塞俄比亚的正教同宗同源，并且在尼罗河沿岸广泛传播。在开罗美利坚大学图书馆查询科普特相关论文资料时，我无意间找到了以色列历史学家哈加伊·埃尔利希（Haggai Erlich）的著作《埃塞俄比亚和中东》（Ethiopia and the Middle East）。令我至今难忘的是，他在书中形象地描述了埃塞俄比亚的地缘心态：“它是身处东非高原的中央王国，他的帝王和子民历代都信仰基督教，他们的信教历史长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这个中央王国的周边分布着各类穆斯林苏丹（Sultan）统治的诸侯国，他们和中央基督教王国之间相互征伐，互有输赢，领土互有消长。位于高原中央的埃塞俄比亚帝国学会了在穆斯林邻国之间合纵连横，并以自己是存续千年的基督教国度为傲。”在埃塞民间广为传颂的“鸡蛋桥”的故事似乎正印证了这位学者对埃塞基督徒心态的生动刻画。



图3 2018年4月历史古迹“鸡蛋桥”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三、一个“乞丐”眼中的发展主义

前往埃塞之前，我听说外界普遍称埃塞俄比亚是非洲的“小中国”。走在亚的斯亚贝巴街头，我确实发现了诸多与中国相似的地方。到电信商店办理手机卡可以找到会中文的员工，在街头经常能看到中文标识的商铺和参与城市建设的中国公司。埃塞俄比亚首都蓬勃发展，到处都是建筑、高架桥和轻轨工地的景象不禁让我联想到国内某些省会城市蓬勃发展的景象。甚至在离开首都前往邻省的道路上，我还发现了诸多因为政府拆迁征地而引发的抗议标语，这也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通过朋友的介绍，我也采访了几位在埃塞俄比亚常驻的中国记者和商人，他们普遍强调埃塞俄比亚与中国的相似性。然而最能让我亲身体会当地的发展主义精神的还是我在首都街上与一位“乞丐”的偶遇。



图 4 2018 年 4 月，亚的斯亚贝巴街头随处可见的中文标识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在从一位采访对象的办公室走出来后，我慢步朝酒店的方向走去。此时，一位衣衫褴褛的本地人一直同步在我身旁询问是否需要参观市内的名胜古迹。一开始，我并不想搭理这位胡搅蛮缠的“乞丐”，只是径直向前走。没想到的是，他锲而不舍地跟我唠叨他的“旅游计划”。最后让我停下来的是我对他英语水平的好奇，为何一名埃塞的街头“乞丐”可以把英语说得如此流利还通晓名胜古迹的历史典故。于是，我决定请这位陌生的埃塞朋友吃一顿午饭，去了解一名普通当地人眼中的埃塞。

原来这位 40 多岁的大哥来自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历史名城贡德尔，早年就读于国立本科院校的机械专业，并在大学期间学习了英文。然而在毕业后，埃塞俄比亚依然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他没能找到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便一直在家务农长达十多年。直到最近几个贡德尔老乡用亲身经历告诉他，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充满了打工赚钱的机会，并承诺让他和自己同吃同住。然而到首都两个月后，他依然没有找到工作，也被老乡从家里赶了出来，于是流落街头。在交谈过程中，大哥高度赞扬了中国的经济成就，认为自己的国家吸引中国投资和技术是明智的决策，未来有可能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一名因为失业而流落街头的“乞丐”没有丝毫抱怨政府，反而对自己的国家充满希望，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体现 2018 年我所见到的埃塞发展主义了。

四、非洲大国复兴需要“跨越”中东

转眼之间，我这次短暂的埃塞之行已经过去三年了。从

新闻报道来看，埃塞俄比亚似乎并没有朝着我当时看到的积极方向发展，而是陷入了中央政府和提格雷州地区的内战以及族群冲突风险，经济前景大打折扣。现在反思来看，作为一个不熟悉埃塞俄比亚国情的外来者，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见所闻其实已经暗示着这个国家的潜在危机了。我后来才明白，自己在首都外围省区偶遇的拆迁征地抗议背后是提格雷族主导政府的首都发展计划和首都周边奥罗莫族群的利益纠纷，这正是当前埃塞国内族群冲突的缘起之一。尽管如此，我认为埃塞俄比亚的非洲大国复兴梦仍在，他们对复兴大坝修建和蓄水的坚持就是明证。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埃塞俄比亚要做的可能是“跨越”中东，不仅仅是跨越与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的历史恩怨，更是要跨越后者的惨痛教训。

不管对于埃塞俄比亚的基督徒还是穆斯林来说，中东对他们来说并不遥远。从文化上来说，闪米特传统一直是埃塞各族的历史纽带之一，他们与红海对岸的闪族同胞拥有共同的历史故事。同样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埃塞境内都拥有数量庞大的信众，天启宗教的联系令埃塞俄比亚人对中东局势非常关心。我此行的当地向导就是来自埃塞俄比亚东部的穆斯林，他在谈话中对巴以问题以及叙利亚局势的见解和态度与我在中东所闻差别甚微，可见双方在文化和宗教上的紧密联系。从经济上来说，埃塞接受了大量的阿拉伯国家的投资，甚至其首富都同时拥有埃塞俄比亚和沙特双重国籍。我在亚的斯亚贝巴首都的电影院里观影都能看到阿拉伯语字幕，我入住的酒店也能收看多个阿拉伯国家的电视节目，阿拉伯资本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同时，据向导告知我，由于大量埃塞俄比亚侨民居住在迪拜，迪拜扮演着埃塞俄比

亚与全球进行贸易的枢纽作用，大部分埃塞俄比亚的货品贸易也会经过迪拜转运。我相信，随着经济的融合，埃塞和中东的宗教和历史的恩怨已经不是难以跨越的鸿沟了。

早在前往亚的斯亚贝巴之前，我在缅甸驻开罗使馆的一次国庆酒会上偶遇过一名埃塞俄比亚外交官，他悲观地认为自己的国家未来有可能会“叙利亚化”，我当时颇为震惊。由于长期研究中东的原因，我初入埃塞俄比亚时难免带有教派主义的视角，一度认为这个国家的主要矛盾也是宗教矛盾，不管是针对外部的“穆斯林包围”，还是内部的宗教少数民族。埃塞俄比亚虽然存在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宗教分野，然而他们都拥有高于宗教的族群认同，不管是阿姆哈拉族、奥罗莫族、锡达莫族、提格雷族还是索马里族。反观如今埃塞的内战格局，我不禁感叹那位外交官居然一语成讖。从中东的案例来看，深陷族群教派冲突的国家均难以发展本国经济，政治的统一和国内的和平是繁荣的基石，经历过“阿拉伯之春”的叙利亚、也门等国家对此有切肤之痛。未来，如果埃塞俄比亚能成功跨越这些阿拉伯国家的教训，它的复兴之梦应该会更加值得憧憬。

责任编辑：熊星翰 文字审校：董 慧



IIAS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海淀区清华园1号

清华大学中央主楼205室

中国 北京 100084

+86-10-62787747

<http://ias.tsinghua.edu.cn/>

主 编 张 静

责 编 组 高良敏

文 字 编 辑 许 帅

李宇晴

董 慧

熊星翰

李 音

郑 楠